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胡　绳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ISBN 7-80023-363-4
0 1>
9 787800 233630

ISBN 7-80023-363-4/K · 374
定价：48.00 元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

胡　绳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8(2005.4 重印)
ISBN 7—80023—363—4

Ⅰ.中… Ⅱ.①胡…②中… Ⅲ.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91 Ⅳ.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603 号

书　　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著　　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主　　编:胡　绳
责任编辑:肖淮苏　霍海丹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云胶印厂
开　　本:16
字　　数:480 千字
印　　张:31.75
印　　数:2001—4000 册
版　　次:199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023—363—4/K・374
定　　价:48.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题　记

胡　乔　木

在1990年3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尚昆、一波同志都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的希望（现行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1949年，少数写到1956年，个别写到改革开放）。在这之前，在1988年8月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领导小组的同志也曾提出这个任务；当时还考虑最好能写出一部篇幅不太大的党史简本，以便于广大干部、党员阅读。

恰好，建党七十周年的日子临近了，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0年5月就集中力量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工作，到去年年底，已写出全部初稿。今年1月，在胡绳同志主持下，约请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两位同志，6月又约请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同志一起，进行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初稿提供资料，设计轮廓，功不可没；但是改定稿的整个水平是大大提高了。经过先后参加编写的十多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在今年8月完稿；完稿原定的时间推迟了，是为了遵守质量第一的原则的缘故。

我接到这个书稿，很是高兴，觉得它虽然没有能赶在今年7月以前出版，仍然没有失去纪念的意义，而且它的作用本不限于节日的纪念。它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

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当然，中等篇幅的党史并不能代替更详细的党史(如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已成上卷)，但是我相信，它的内容也会给尚在编写中的更详细的党史许多帮助。

胡绳同志告诉我，如果因为时间太紧，不能看全部书稿，希望我务必把本书的第七、八、九三章和结束语看一下。我照办了。这三章确是比较难写好的部分。八大以后的十年曲折很多；“文革”十年是悲惨的十年，但这时期也并非只是漆黑一团；而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年中，却又出现了两任总书记的严重错误。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我读了这三章，认为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

当然，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党的七十年历史如此丰富，在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中不可能说得面面俱到，这是显而易见的。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至于编辑性的差错，恐怕更少不了。无论如何，写这样的书而能写成这样，是不容易的。虽然文出多人，稿经数易，终得集合众长，统一条理，成为一家之言。积年余之功，竟初创之业，尤属可贵。

说是初创，也许不完全对。写这部书，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非白手起家。中央作了两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大的是非有了准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文集先后出版，为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多年来许多老同志写了各种形式的回忆录，记载了历史上的许多细节；历史工作者编写了多种党史、军史、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

等等，又有国家保存的大量档案，可资查阅。但是在另一意义上，仍然不妨说本书是初创。真正的史书不是抄抄剪剪就可以“撰”成的。在这以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书，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批准本书出版时，希望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再版时修订得更加完善。我和本书的作者们一样，热切地希望读者、教学者、研究者和熟悉各个时期党史情况的老同志们对本书多加指正，提出种种要求和建议，使本书再版时能得到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还得作必要的增补），以便更好地完成它在九十年代作为一部好的党史读本的使命。进入下个世纪，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至少书名将改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了。但是，话何必说得这么远呢？

一九九一年八月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七十年的战斗历程。

七十年来，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并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七十年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在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贫穷而落后的国家里，夺取革命的胜利，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创造过使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也面对过许多棘手的难题，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它的前进，而只是使它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

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胜利，正在满怀信心地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勇迈进。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

回顾七十年的历史，使我们更加确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七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是先驱者们在缺乏先例的艰难条件下经过探索追求所得到的，是无数先烈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目　录

题　记 …… 胡乔木 1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 2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 2
二、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
开始传播 …… 6
三、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 …… 10
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 16
五、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 26

第二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 34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 34
二、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 38
三、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 42
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 49
五、四一二政变前后 …… 54
六、大革命的失败 …… 60

第三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 67
一、革命进入低潮和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 …… 67
二、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 …… 76
三、革命走向复兴时的“左”倾错误和红军
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 87
四、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和
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 98
五、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 109
六、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 115

第四章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126
一、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 126
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 134
三、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
独立自主 …… 140
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 143
五、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 150
六、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 158
七、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 164
八、整风运动 …… 170
九、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 176

第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 182
一、战后政治形势与党争取和平民主的
方针 …… 182
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 186
三、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 193

四、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 201
五、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 205
六、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
行动纲领 …… 210
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 215
八、伟大的战略决战 …… 219
九、将革命进行到底 …… 225
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 229

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 234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 234
二、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
民主改革 …… 241
三、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 249
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 255
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
起步 …… 262
六、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外交工作 …… 267
七、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 277
八、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第一个
五年建设计划的完成 …… 287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 293
一、八大和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 …… 293
二、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 304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 311
四、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 318
五、“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的错误 … 324
六、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 …… 330
七、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 …… 343
八、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经济上
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 …… 349
九、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
趋向 …… 358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 364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364
二、“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 375
三、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左”倾错误
努力的受挫 …… 383
四、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 396
五、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
结束 …… 401

**第九章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局面** …… 414
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 414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 420
三、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 …… 425
四、十二大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 …… 438

五、十三大、治理整顿的开始和 1989 年
风波的平息 …… 449
六、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继续前进 …… 459
七、对外关系的调整和统一大业的推进 …… 472
结束语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 …… 483
曲折的经历 …… 485
四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 …… 488
前进的道路和目标 …… 492
后　记 …… 496

第　一　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绝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生活。1902 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喊出了那时多少爱国者满腔悲愤的心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七十年的战斗历程。

七十年来，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并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七十年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在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贫穷而落后的国家里，夺取革命的胜利，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创造过使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也面对过许多棘手的难题，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它的前进，而只是使它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

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胜利，正在满怀信心地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勇迈进。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

回顾七十年的历史，使我们更加确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七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是先驱者们在缺乏先例的艰难条件下经过探索追求所得到的，是无数先烈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雄。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历史总是不停步地前进着，并且不断地呈现新的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深刻化，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主要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成长，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又开始了。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他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在1905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清朝政府，而这个政府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场革命号召推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以前，虽然已有人受欧风美雨的影响而提出怀疑君主政治的思想，但他们不敢设想在中国推翻君主制度和由它代表的社会制度。孙中山鼓吹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

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回顾辛亥革命时写道：“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醉心于学习西方的时候，孙中山已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其将不远”[①]。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展开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主要是南方几个省的三合会等江湖帮会组织）和新军（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建立的、采用新式军械和新式训练的军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的失败都在全国民众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恶。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

1911 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它取得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被推翻的清皇朝既是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的专制政府，就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它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

---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88、289 页。

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 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失败了。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业绩，而辛亥革命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如果脱离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观察问题，也许会把辛亥革命看作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②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③ 因此，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

①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页。

②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

③ 林伯渠：《茬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二、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来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的机会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这些活剧一幕紧接一幕地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概括地描述出当时的情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

现实有时是残酷的：人们在作出那样大的奋斗和牺牲以后，换得的竟不是当初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实行过，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说来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着，将要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来。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1915 年 9 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 年1 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0 页。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他们由此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这时的思想家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如果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维新派还是披着孔学的外衣去干那“离经叛道”的事业，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也没有从正面去触动孔学的思想统制，那么，这时的思想家确是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光荣战士。尽管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如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的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也没有对人数最多的工农劳动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革命发动表示应有的期待；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但在当时说来，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这就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据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①]；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心目中也

①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

被认为是科学[①]。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②]。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他们强调“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仍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这时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暴露。陈独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就说过，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西方近世文明的这种缺点是无庸讳言的[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引起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李大钊在大战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④]。他在1916年5月就已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⑤] 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⑥]。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产生的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为什么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当中国人民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给他们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

①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4月1日。

②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

③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9月15日。

④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

⑤ 同上书，第168页。

⑥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合理的解答。

这以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有一些讲社会主义的人讲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空谈和现实生活有多少关联。有一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只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有现实意义，他们以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也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但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为人们重视。那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学说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①；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②。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发动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总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就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十月革命后，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在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以深

①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1921年1月。

②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页。

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深刻的变动。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只有日本、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仍有所扩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间，新设厂矿379个，平均每年增设63个。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二百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种种社会问题，包括劳动和资本间的矛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各种新式学校里的学生也迅速增加，还出现一大批新式学校的教师和记者等，形成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三、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这次和会是在战争中取胜的几个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

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决议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和约，一个学生当场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曹、章、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示威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因为遍寻曹汝霖不见，就放火烧曹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学生被捕者三十二人。学生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他们还到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等。在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第一天，学生被捕者一百七十余人；第二天，又有七百余人被捕；第三天，二千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受到军警马队的冲击。

正在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学生“沿街跪求”上海商人罢市之际，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章、陆。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 “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②。

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的是学生群众，他们起了先锋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则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了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③。由于在斗争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④。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主要原因。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⑤。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他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⑥。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9页。

②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③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

④ 同上书，第431页。

⑤ 《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⑥ 同上书，第35页。

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新青年》出了一期由他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他在这个专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比较确切的阐明。

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在国内发表。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很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向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原本是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这时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后来说，这样做“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①]，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

①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民国丛书》第一编第96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645页。

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当时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在各地方出版的刊物上，有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3、4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宣称，军国主义、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逐步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五四运动中一批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这时也开始了思想方向的转变。湖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第

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其他著名的学生领袖如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走上这条道路。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有如前面所说，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②。吴玉章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③。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任何其他人所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才作出的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④。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民主不再是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民主。为此，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

---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②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

③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110、112页。

④ 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呢？》，1920年9月28日。

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①]。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但是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取消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相反，给了反封建以更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社会根源。他们把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方式，从由少数人进行的宣传工作，发展到主要由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实践，从而推动中国人的思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解放。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 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初主要还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这是一种客观的趋势。1920 年1 月，就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

---

① 陈独秀：《答柯庆施（劳动专政）》，1920 年11 月1 日。

一个大政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曾同北京大学的革命分子讨论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然后他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五四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被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他把《新青年》迁往上海继续出版），并具体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7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小组拟定过一个类似党纲党章的文件。“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① 关于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1920年11月，上海小组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②。上海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1920年秋至

① 《李达自传》。

② “Chang”1921年12月10日在宣言前面所加的按语。

1921 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小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一律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他们的主要活动是：

（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 年9 月起，《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11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推动建党工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利用已有的或自己创办的公开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通过这些报刊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

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 年8 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第一版印千把册，还有很多地方翻印。同月，出版了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以及《社会主义史》等也陆续翻译出版。这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特别的重视，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些共产主义小组还利用原有的或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党造就最初的骨干。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指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起了这种作用。国内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青年中，不少是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或通讯会员。

（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派别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时，并不是所有正在探索中的先进分子都能够认清马克思主义同这些思想派别的本质区别。为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争取那些有着爱国、进步要求而一时接受了其他思想派别影响的人站过来，扩展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共产主义小组不得不同这些思想派别展开斗争。

1920 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虽然在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实际上强调的是，由于中国产业落后，中国没有条件成立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主张“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以便“在现行经济制度下，徐图健实的发展”。他们表示信奉英国学者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主张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们指出，不能离开时代条件来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从当前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情况来看，不可能在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需要发展教育及工业，但应当“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以便“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而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

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有深远影响的。他们在宣传自己的主张时，不仅从理论上来说明，并且用中国的实际社会情况来论证。这也说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是有现实土壤的。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曾占着优势。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强权，也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私有财产制度，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无政府主义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看起来又似乎十分激烈和彻底的主张，很适合那些不满社会现实的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些对旧社会不满、理论准备不足、正处在探索过程中的青年人也接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师复等人就在中国鼓吹无政府主义。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流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书籍多达七十余种，在广东的影响更大。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便越来越多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黄凌霜等人写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揭露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派别的本质，便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强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并使国家走向消亡。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只能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战斗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在现实生活里，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那样尖锐，要推翻旧势力的统治特别需要有强大的团结力量和坚持不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强权的同时提倡不要任何集体和纪律的约束，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不管他们讲得如何动听，最后只能流入空谈，在组织上也只能形成一些人数很少而且内部极度松散的小团体，无法在政治生活中产生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受到马克

思主义者的有力批判后，它的影响很快便消失了。

马克思主义者还驳斥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针对有人鼓吹中国“劳动者地位之增进与政权之转移，当取议会政略”，他们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他们并且揭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于中国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由于中国的议会早已变成军阀手中的玩具，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市场。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思潮的批判，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命的方向。

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实际上也是一场同它们争夺群众的斗争。这些论战，帮助当时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不少原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先进青年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便以相当大的力量直接投身到工人中去，从事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这在中国其他政党中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在五四运动后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力量，但它还很年轻，很多人来自破产农民和城镇游民，缺乏阶级的自觉。原来在他们中间只有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后来又有过一些由流氓或雇主把持的只是挂了招牌的“工会”组织。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小组邓中夏等在长辛店、上海小组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①]。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主

① 《邓中夏文集》，第436页。

义小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最初会员有三百七十余人；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一千三百余人。192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有一千余工人参加庆祝游行，并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还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

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①；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湖南第一师范——引者注）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②。也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四）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青年是社会上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自然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青年一般又缺乏实际的社会经验，需要加强对他们的领导。1920 年8 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书记。其后，北京、天津、武昌、汉口、长沙等地也成立团的组织。各地青年团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初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一部分工人则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形成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 年3 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

① 俞秀松：《给骆致襄的信》，1920 年 4 月 4 日。

② 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 年 11 月 26 日。

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 派（指共产主义派——引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① 同月，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②。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 号（今兴业路76 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 名党员的12 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选择，并且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但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于这些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 444 页。

② 《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1921 年春，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 页。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成立时就不是单单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它的一个重大优点。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十分注意党员的质量。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可是，在党只是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成员的状况难免还比较复杂。就拿党的一大的12个代表来说，后来也有分化：多数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业，有的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有的甚至背叛革命。这种现象，不仅对一个初生的党说来是并不奇怪的，而且在党后来发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其主体是由健全的坚强的分子组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杂有或产生某些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和异己分子。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等3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或稍后一点的时间，同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①]1921年夏，利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9页。

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①]。1923 年冬吴玉章、杨闇公等二十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以后，中国青年共产党也自动取消，要它的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②]。这些事实表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最觉悟的革命者的共同要求，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成立，决不是偶然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从前还是小生产者，但是它身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革命要求极其强烈；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缺乏改良主义的深厚的经济基础；中国也没有经过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产生幻想。所以，党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以往其他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去做群众工作，所以，尽管最初人数很少，却立刻使旧社会一切腐朽势力深感恐慌。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在萌芽状态时，就被斥为“过激主义”而遭到中

---

① 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始末》，1953 年。

② 《吴玉章回忆录》，第 156、160 页。

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1920年4月，北洋政府根据美国芝加哥宪报访员“关于防止过激主义说帖”致电各省区督军、省长、都统，饬令他们对所谓“过激主义”严密防范①。12月，北洋政府国务院根据步兵统领王怀庆呈文致函内务部，命令他们拟定惩治“过激党人”专条。王在呈文中惊呼共产主义的传播“其祸甚于洪水猛兽”，应“严加防范，以遏乱萌”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长期受到反动军警的严密搜捕和血腥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它由于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逐步地而又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需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五、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

---

①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07》，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20页。

②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95》，见同上书，第623页。

行过长时期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有两个根本性的弱点：第一，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义和团采用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和在这口号下的行动，说明农民既没有认清外国侵略者的实质、也没有认清本国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在推翻清朝帝制时就以为大功告成，出现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现象。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间只以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为口号（所谓护法运动），既无反对帝国主义的明确立场，又联合地方军阀对抗北洋军阀，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没有能力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这是以往的革命斗争所以成效甚少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深入到下层的工农群众中去，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持久的群众运动。同盟会的活动只是依靠少数革命分子，联络一些会党或新军开展活动。他们在农村没有同农民结合，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农民的自发斗争是互相脱节的；他们在城市也没有同工人结合。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虽然进行过反袁世凯的斗争，并同北洋军阀政府对立，但极少做群众工作。一般工人和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并“没有深刻印象”①。这是以往的革命斗争所以成效甚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在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有了根本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922 年1 月，《先驱》的发刊词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

1921 年底至1922 年初帝国主义列强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从反面给予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以实际的教育。这次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以遏制日本独占中国的势头，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混乱。这些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

①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1946 年9 月。

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派遣代表出席1922年1月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阐明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了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创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些思想，对于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制定的。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其中工人党员21人)。

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大会指出，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无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也“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在中国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不可超越的一个阶段。

大会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初步分析后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因遭受极大痛苦，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势力，这种势力“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这样，党的二大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革命，长时间里没有明确地弄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没有正面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

和封建势力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党的二大宣言发表后，胡适在《努力》周刊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嘲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封建军阀背后站着帝国主义这个科学论断“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政治走上轨道，也就是他所鼓吹的由“好人”组成“好政府”，“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但是，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的统治，任何真正的好政府是建立不起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语言揭示的，正是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朦胧地感觉到了的事实，因此，它所提出的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为人们所接受。“打倒列强、除军阀”逐渐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

不过，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也还有缺点。它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将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发展公式而得出这种看法，但这个公式对中国革命是不适用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分清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还不懂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应当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除了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开始采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所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全新的革命方法，即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

和其他党派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因此，它敢于相信和依靠群众。党的二大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建党初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勃兴，初步显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威力。

工人运动的高潮

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原设在上海，后来迁往北京，张国焘、邓中夏曾先后担任主任；下设北京、武汉、湖南、广东、上海等地方分部。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举办工人学校，组织产业工会，开展上海英美烟厂、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等罢工斗争。党在工人中和整个社会上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讨论加强全国工人团结等问题。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政治派别的工会代表162人。“因为共产党在大会中有极大的威望”，对于会场上布置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三大口号，“各派均未提出异义”。“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领袖”。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确认。这次大会的成功，“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①。

在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前后，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一百余次，参加人数在三十万以上。

香港海员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它开始于香港，波及于长江，前后约经四个月。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他们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克服港英当局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将罢工坚持了五十六天，使香港的海上航运、市内交通和生产事业全部陷入瘫痪，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②。这次罢工由于它的反帝性质，得

① 《邓中夏文集》，第481、485页。

② 同上书，第476页。

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对长江海员罢工给予援助。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安源路矿（江西省萍乡县的安源煤矿和由煤矿通到株洲的铁路）工人罢工，是这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南方工人举行的主要罢工之一。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余人。毛泽东曾来安源调查，随后由李立三来此开辟工作。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宣告成立，9月初，毛泽东来安源对罢工进行部署。接着，刘少奇也来此工作。为了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和增加工资，9月14日，罢工开始。罢工工人提出要求保障工人政治权利、改良工人待遇等十七项条件。路矿当局在收买工人领袖、刺杀李立三等阴谋遭到破产后，竟电请当地军阀在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当刘少奇前往谈判时，数千名工人为保护自己的代表，一度将戒严司令部包围。共产党在罢工中采取了恰当的斗争策略。刘少奇说过："要事先告诉干部和党员：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工人是不能得到完全解放的。所以，罢工中所提出的条件，只能是有限的。谈判的结果，也一定是有限的。只要达到增加工资和承认工人俱乐部，就宣布罢工胜利，结束罢工。"① 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被迫承认工人所提的大部分条件，坚持了三天的安源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工人俱乐部成员迅速由罢工前的七百人发展到一万余人。

开滦煤矿（在河北省唐山一带）工人罢工，是这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北方工人举行的主要罢工之一。1922年10月23日开始，开滦矿工为增加工资和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等举行罢工。拥有五万矿工的开滦煤矿罢工坚持了二十多天，矿工还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等指挥了这场斗争。罢工中，在矿局门前示威的工人被前来镇压的军警打死数人，打伤五十人。但罢工工人并不因喋血而气馁，他们中没有一人私自复工；只是考虑到罢工旷日持久、难以坚持，才在矿局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后，接受有关方面的调停，忍痛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目的是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主要领导人是张

---

① 转引自《〈陆定一文集〉自序》，《人民日报》1991年3月13日。

国焘、罗章龙等共产党人。京汉铁路是重要的交通命脉，它的收入是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京汉铁路总工会原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曾经通电“保护劳工”的吴佩孚立刻翻下脸来，下令军方“制止开会”。2月1日，郑州全城戒严。工人代表冲破军警封锁线，拥入会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等口号。由于总工会会所被捣毁，代表寓所被包围，会议无法举行，总工会号召全路工人举行罢工，“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2月4日，在长达二千余里的京汉铁路上，三万名工人在三小时内有条不紊地举行了总同盟罢工。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反动派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共产党员）捆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复工令。林祥谦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前来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京汉铁路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共产党员）随后也在武昌被杀害。施洋牺牲前，身中三弹仍引吭三呼“劳工万岁”。在这次惨案中，前后牺牲者五十二人，受伤者三百余人，被捕入狱者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者一千余人。

由于遭到军阀的残酷镇压，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各地的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外都遭封闭，工人情绪一时趋于消沉，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

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起来的。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建立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通过这个时期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加强。1922年6月，中共中央计划多收工人党员。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工人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物，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他们先后参加了党的队伍。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如安源路矿在1922年2月建立了党支部，到1924年5月已有党员六十多人。

这个时期的斗争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中国，工人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二七惨案以后发表的文告中指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①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①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1923年2月27日，见《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第　二　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宗旨表现为当时群众中普遍流传的一首歌曲中所说的“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列强，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当然中国革命无论怎样胜利都不可能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列强，这个口号的含义实际上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宰割中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帝国主义是通过中国的封建军阀来间接地统治中国的。中国的军阀，当时以北洋军阀为主，因此，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是一场民族民主的大革命。

这一场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长期以来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集中爆发。这场大革命所以会在二十年代中期爆发，是因为这时候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原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还很小，但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并且为这目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曾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燃起过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长夜漫漫，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已成为人们不能不苦心焦虑地寻求解决的问题。

到二十年代初，两个突出的问题又摆在人们面前：第一，欧美列强在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严重危机以后，在远东又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掠

夺。它们在中国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较顺利发展的条件又完全丧失了。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直接感受到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激起了反帝情绪的普遍高涨。第二，在列强操纵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成为国内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那时，控制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主要是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它们处于分裂状态。1920 年发生直皖战争，1922 年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 年又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各派都有帝国主义做后台，南方的一些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或有联系的地方军阀同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之间的战火也一直没有停息。卷入内战的军队，1917 年约五万五千人，到1924 年增加到四十五万人。军费的激增，使人民担负的各种苛捐杂税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连年处于战乱中的省份，人民连生命财产的起码保障也无法得到。

一场变革现状的大革命，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广泛阶层的强烈的共同需要。

但是，要实现这种愿望是异常艰难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少数人的孤军奋斗或分散的各自为战都难以把它们打倒。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广大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参加这个统一战线，因为它们也深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痛苦。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特点。正是从这种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在几经挫折后，那时并没有多少实力，并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第一，这个党在中国社会上还是有威信的。因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创立了民国；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为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军阀势力奋斗。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第二，这个党已经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块可贵的革命根据地。1923 年2 月，拥护孙中山

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将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逐出广州，孙中山重新回到广东，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控制了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并且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尽管这些军队多半是地方军阀的力量，但在孙中山的政府所控制的地区还是举着国民革命的大旗，允许各种革命力量公开地进行活动。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仅有的。第三，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党内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考虑同国民党合作，是很自然的。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本来是：实行"党外合作"。另一种合作方式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倡议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这一年8月，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杭州开会，马林提出了这个建议，开始时遭到多数人反对，但会议最后接受了马林的建议。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形式。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①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进，都

①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9页。

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使中共有可能更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这样做还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从而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新的生命；也有利于共产党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中共三大的决定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

党的三大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且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遗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规定是正确的。

可是，三大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后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子。这反映了党还处在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

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那时，把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称为国民革命运动。

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苏联政府还给予广州政府军事和物资援助。鲍罗廷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组织才能的人。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不久后，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讲话时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① 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二、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这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工作大多停留在狭小的上层社会中，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一些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他们对下层的群众工作并不熟悉，而这方面的工作是共产党员所注重并且已经积累了初步经验的。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在许多处在军阀统治下的地区，对群众进行了艰苦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把他们吸引到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来。周恩来说过，“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

① 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

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①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国民党已经建立起正式省党部十二处，特别市党部四处，临时省党部九处。许多省市党部的实际负责人，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湖北省党部的董用威（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河北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等，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运动，如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等，有些也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做的。所以，国民党内部情况虽依然相当复杂，但确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这主要是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工农运动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24年7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华人警察也参加罢岗。斗争持续一个多月，终于取得胜利。党的早期职工运动著名领袖邓中夏对这次罢工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自‘二七’失败后，消沉状态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还未改变，七月广州沙面发生大罢工，才表示着这种消沉状态应该中止了。”“此次罢工确哄动了广州与香港，并且影响还及于中部与北方。”② 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早在1922年，彭湃已开始在广东海丰地区组织农会，发动农民进行减租斗争。这时，广东各县农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开展斗争。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自1924年7月起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13页。

② 《邓中夏文集》，第526页。

在国共合作下，还着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过去，孙中山在长时期内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而屡遭失败，这给他留下痛苦的教训。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所以通常被称为黄埔军校。1924 年5 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被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布留赫尔（在中国化名加伦）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这年11 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有徐象谦（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等。这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 人，占学生总数的1/10。

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这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中去。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说过："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①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1924 年10 月，北方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冯玉祥发动政变后，内外处境仍很困难，又请北洋军阀元老段祺瑞出山主持大计。段祺瑞和准备从东北入关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也分别致电孙中山，欢迎他北上。11 月，孙中山离广州北行，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先后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0 页。

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各地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国民会议，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那时候，国内的政治气象是好的。到处热气腾腾，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

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在它内部，也有一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1924 年6 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首先发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借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也就是要同共产党人分手。为了反击这种进攻，中共中央在7 月21 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坚决维护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痛斥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言行。孙中山在北上以前，于8 月20 日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个决议案，明确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①。由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享有崇高威望，他这种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态度，使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一时不能不有所收敛。

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对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以回答。1925 年1 月11 日至22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它有党员994 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1924 年8 月。“匡”字疑有误。

“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四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因肝病逝世。他在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按他的遗嘱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自然首先要联俄；要“唤起民众”，自然要联共和扶助农工。这是孙中山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在总结自己毕生的政治经验之后得出的两条根本结论。孙中山去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各地更加高涨起来。

三、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罢工开始的。

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那时有工人八十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这里有主要由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租界，日、英等国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民族矛盾一直异常尖锐。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是有工作基础的。那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共产党人以上海大学为重要据点，深入到工人中去工作，先后在七个地区创办了工人夜校。1924年夏，在邓中夏、项英等领导下，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会员发展到近二千人，是推动上海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涨的群众性团体。1925年2月，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为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而罢工，

迅速导致二十一家日本纱厂的三万五千多名工人总罢工。这次斗争取得胜利，给了全国工人很大的鼓舞。5月1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共产党员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

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研究对策。蔡和森提出：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到了30日那天，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十三人，伤者不计其数。当场牺牲的烈士中有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等。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这些事件，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二十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一千七百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即增加到三千人，年底更达到一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对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各界群众在6月3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罢工宣言中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十五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二十五万人，其中十多万人离开香

港回到广州。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十万人在广州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周恩来等率领黄埔军校师生和校军二千人参加。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当场被打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刻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下设武装、纠察、审判等办事机构，处理罢工工人的一切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广州革命政府对这次罢工采取支持态度，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一万元。共产党员徐成章、陈赓等分别担任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纠察队总教练、教练等职务。省港大罢工前后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十多万集中在广州的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那时，广州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了两年，但一直没有能控制广东全省，内部也不巩固。对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盘踞东江、敌视广州政府的陈炯明部。在广州政府内部，还有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他们把持着广州市区，横征暴敛，为非作歹。孙中山曾沉痛地对他们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蹂躏我的家乡。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的机会，举兵进犯广州。广州政府组织东征军，分三路讨伐陈炯明。但北路和中路的杨希闵、刘震寰两部按兵不动。在国共合作下刚刚组成的黄埔军校校军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在南路以破竹之势击溃陈炯明部主力，控制东江地区，到4月间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5月，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在广州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杨、刘两部虽拥有不少兵力，但长期在广州进行搜刮，腐败不堪，极端不得人心，早已丧失战斗力。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平息了叛乱。

平定杨、刘叛乱之后，进行了改组广州政府和改编军队的工作。7月1

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当时被看作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但中共对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采取了不参加政府而只是监督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其中，黄埔校军扩编为第一军），共八万五千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担任第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但这些军队的指挥权仍掌握在蒋介石和其他旧军人手中。对掌握军队指挥权的忽视，是当时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失误。1926 年年初才建立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它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但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所占比重很小。

1925 年 8 月 20 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这对国共合作的事业是一个重大打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在这次事件中被蒋介石逼走，他所指挥的粤军被蒋收编，这又扩大了蒋在军队中的实力和影响。

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又在 1925 年 9 月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取得东江一带农民协会会员的支持，东征军迅速地在 11 月底全歼陈炯明余部，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势力邓本殷部。广东全省终于获得统一，从而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国民党新右派的崛起和共产党的对策

革命的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但一股反动的逆流也在迅速滋长。国民党内部早就出现了分化。一向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越来越公开化了。对于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内部的各派由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所抱的目的也不同。左派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在推倒北洋军阀之后，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

家;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力图利用工农的力量,由自己取代北洋军阀建立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左、中、右三派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1925 年6、7 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同年11月,国民党内的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更严重的是,在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壮大起来、在革命阵营内部已有举足轻重力量的蒋介石,这时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利用国民党新右派所控制的群众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活动。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但一定时期内他在表面上曾表示赞成联俄容共,目的是发展个人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但同时,他又害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的发展,将妨碍他达到取代北洋军阀的目的。所以他即使在同共产党合作时,也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使人民力量不能独立地充分发展。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这就是说,他在一个时期内所执行的是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掀起。看到群众力量起来了,他的反共活动便逐步加紧。

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尖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面对国民党内部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怎么办?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当时不少共产党人认为,既然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新右派)已在公开进行分裂活动,那就必须进行恰当而有力的反击,遏制这种活动,来维护国共合作。毛泽东在1925 年12 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首先强调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接着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着重指出中国无产阶

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他并且提醒人们注意：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他们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面前，总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陷于孤立以至失败，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共产国际代表所持的也是这种意见。这样，这种意见在党内就占了上风。

1926 年1 月1 日至19 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因此，这次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这是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方面。大会召开时，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影响下，对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这次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次要地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原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国民党一大时还没有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内，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这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他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退让，丝毫没有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相反却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他们得寸进尺地步步进逼。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在3 月20 日突然采取严重的反共行动：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22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原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为蒋介石在国

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对这种突然事变的到来，中共中央既缺乏精神准备，也没有应付的经验。其实，蒋介石那时羽翼尚未丰满，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在采取行动后，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进行反击。由于在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一个军由蒋介石指挥，而且这个军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力量，蒋介石的地位并未完全巩固，这个主张是可行的。可是，陈独秀和在广东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等却被蒋介石气势汹汹的行动所吓倒，害怕造成分裂，以为只有继续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结果，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限共活动。

一个多月后，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清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交出等。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都投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却认为国共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是因为共产党“包办”太多，继续主张退让，《整理党务决议案》又获得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南方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三件大事都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不到半年的短时间内发生的。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接连发动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逐个夺取阵地，把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为日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

从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却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不懂得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会变化的。当蒋介石已经公开地逐步地实行反共的步骤时，他们仍然不敢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会导致破裂。

但蒋介石那时的实力依然有限。为了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一时并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

甚至到1926年5月，他还继续宣称："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①]。国共合作的关系暂时继续保持着。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了。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

从表面上看，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有着比北伐军大得多的优势。他们十多年来一直控制着受到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七十万人，而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时除广东原有的六个军外，又加上新归附的广西李宗仁的第七军和湖南唐生智的第八军）只有十万人左右。但是北洋军阀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渴望早日结束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渴望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民心的向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第二，北洋军阀内部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主要分为三支势力：已经大大衰落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还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大约有兵力二十万人，它的主力一时还在北方的南口一带进攻已退守西北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号称"五省联帅"，有军队二十万人，形成一支独立势力，战斗力比吴佩孚部强；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三十万人。这三支势力间勾心斗角，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他们各个击破。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

---

① 蒋介石：《关于中山舰对全体党代表演讲词》，1926年5月。

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 年5 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7 月9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 月11 日胜利进入长沙；8 月22 日，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

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取得战区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支持。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当时，两湖地区因遭受灾荒而严重缺粮，粤汉铁路还没有完全修通，怎样保证军需运输是一个大问题。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三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中共湖南区委的组织历来比较健全，据1926 年8 月统计，全区党员有2699 人，仅次于粤区而居全国第二位。党领导下的湖南农民有四十万人，工人有十一万人。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这种热烈的场面，在中国以往的战争中是罕见的。

吴佩孚看到北伐军已直逼武汉，才匆忙地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回，在武汉外围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要地势设防固守。吴佩孚亲率卫队，并组织执法队，到前线督战。双方在这里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经过浴血苦战，终于在8 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主力，直指武汉。叶挺独立团在这场恶战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接着，第八军主力渡过长江，在9 月6 日、7 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 月10 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抱中立态度的孙传芳部改变态度，在8 月底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 月间，原来担负监视孙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

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猛烈反扑，重新夺回南昌，使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于是，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江西战事的局面根本改观。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

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原来从南口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刚从苏联回国并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到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

这样，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以后，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取得惊人的进展：到1926年底，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全国大多数人都能看到：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北洋军阀统治的最终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还在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下的那些省份，人民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到处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在北伐的最初阶段，国共两党之间虽已存在矛盾，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国民党内反共势力的活动暂时有所收敛，两党基本上仍能保持团结。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北伐战争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湘鄂赣的工农群众运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这些省份，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同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农民运动为重点。拿湖南来说，从北伐军进入那里到第二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在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平江、衡阳等县，几乎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中。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攻击的形势简直如急风暴雨，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1月间激增到二十万人。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0月间也有五万多人。在这两个省也开始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形势。这样的农村大革命，在过去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广大农民的这种革命发动有着十分巨大的意义。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①

在农村出现大革命形势的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9、10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的工会会员发展到七十万人。武汉参加工会的人数从北伐前的万余人猛增到十万人。许多县也陆续成立县工会。不久，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工头和包身工制等要求。这些斗争大多取得了胜利。但这些城市特别是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一些“左”的倾向，有些工人、店员的工资增加过快，工时减少过多，使部分中小工商业者无利可图，对有些中小工商业者还进行了过火的斗争。

在湘鄂赣等省掀起革命风暴的同时，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继续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奉倒段斗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1月，由于英国水手在汉口和九江登陆打死打伤中国人，武汉工人和其他市民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也接管了九江英租界。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党中央落后于形势

当工农群众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迅速高涨的时刻，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仍远离革命风暴的中心地区而留在上海。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大大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当时，发动群众运动以支持北伐固然很重要，但战争的主体毕竟是军队。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①。

还在北伐出师前，苏联顾问加伦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陈独秀让张国焘主持开会商量，但开会时并没有真正讨论，只由张国焘说了一句话：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很长时间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客观上就帮助了蒋介石，助成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那时候，共产党人本来应该也有可能利用有利形势，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到来。可是，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却不许这样做。他们写信给湖北区委，叮嘱他们：“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②。以后，又批评湖北区委不应该让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要求已参加江西临时省政府的李富春、林祖涵等退出，还限令已担任江西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辞职，否则将开除党籍。并写信给担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要求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4页。

② 《中局给鄂区的信》，1926年9月27日。

军事行政上事”[①]。陈独秀以为采取这样的退让的方针，就可以表明共产党人没有夺取权力的企图，使蒋介石放心，使国共合作不致破裂。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而放松分裂的部署。结果，当他把一切准备好了而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力上也难以组织有力的反抗。这是惨痛的教训。

五、四一二政变前后

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趋势，从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开始明朗化了。

这以前，北伐军虽在两湖地区取得了胜利，但仍受到孙传芳势力来自侧翼的严重威胁。孙传芳部的兵力比吴佩孚部强大。如果他们从江西攻入湖南，北伐军就可能处于被切断同后方联系的危险境地。同时，两湖的军事实权已落在唐生智控制之下，这里的工农运动又十分高涨，蒋介石要是在江西遭受失败，将难以立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时，只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敢采取重大行动。到孙传芳部主力在江西被击破后，局面顿时发生变化。身在南昌的蒋介石明白：这不仅是江西局部的胜利而是整个东南半壁的胜利已经在望，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已全然改观。

国内外反动势力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集合

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北洋军阀的势力会崩溃得那么快，帝国主义列强是没有预料到的。它们那时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积极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英国在富庶的长江流域享有的特殊权益最多。当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不久，英国军舰一再寻衅，制造事端，借故炮轰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万县县城，造成伤亡军民一千多人的万县惨案。接着，驻泊长江的外国军舰达到六十三艘，在上海集结的外国军队增加到二万多人，连同万国商团和巡捕，总数达三万

---

① 《西北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人以上。它们企图以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它们看到北洋军阀的垮台已难避免，更着重对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分化工作，扶植它们的新的代理人。在这方面，走在前头的是日本。1926年底，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武汉、南昌并会见蒋介石后，回国报告：在南昌和武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今后裂痕将难免日益明显。1927年1月，蒋介石会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时，向他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保证承认外国对华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在华的特权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这样，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对他进行拉拢，认为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旧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一批批政客、官僚也从北方来到蒋的身边，其中包括同蒋私人关系极深的黄郛。黄郛南下途经上海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答应蒋介石可透支一百万元。所以，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突然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下。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的演讲公开反共，自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他开始公开镇压工农革命力量。在3月6日指使国民革命军驻赣新编第一师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开会。由于国民党在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不愿意由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所以这次全会否决了关于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且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把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实际上撤销了。但由于蒋介石这时掌握着主要的军事权力，单靠通过“提高党权”一类的决议，已经无济于事。蒋介石仍然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他在16日从南昌到九江，指使青洪帮流氓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在市党部打死3人，在总工会打死1人，打伤6人。接着，他乘军舰东下安庆。3月23日，他指使

的暴徒就在安庆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并打伤多人。流氓暴徒们得意地说："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在九江、安庆直接了解暴行真相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于4月9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长文，在列举事实后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①] 事实表明，蒋介石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

面对着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中共广东区委较早地察觉到这种危险的来临。他们在1926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不能希望新军阀能长期同我们合作，因此，"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我们应该尽力避去无味的斗争，应当竭力防止大的斗争之发生（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斗争）；同时亦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要能有此伟大的力量"。这样，一旦爆发大斗争时"我们才有胜利希望"[②]。12月11日，周恩来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也明确指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③] 他警告人们对新右派的分裂活动应当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有所准备。但中共中央却认为这类看法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④]，要求加以纠正。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

①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

② 《粤区政治报告》（二），1926年11月23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656、657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页。

④ 《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472、473页。

秀在政治报告中一开始便说："此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主要点还是关于国民党问题。因为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会议根据陈独秀报告所作的议决案说："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就是说，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但前一方面只是一句空话，并没有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剧烈向右转的蒋介石势力；在实际上做的只是防止民众运动的所谓"日渐向'左'"，也就是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离开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不仅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难以克服。中共中央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会后，这个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妥协的投降主义方针即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陈独秀本人还直接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谈话，指令他一定要制止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行动。

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这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三十二天考察。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3月间，他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战士》周报发表。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领导农民运动的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瞿秋白在这年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比

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这时，孙传芳的势力已陷入崩溃，蒋介石已经把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富庶地区看作自己口中的肥肉。3月21日，当北伐军从浙江推进到上海近郊时，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在这以前，上海工人曾发动两次武装起义，都因准备不充分和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了）。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战斗，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次壮举。

当起义胜利工人占领上海后，原来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进上海。三天后，也就是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二军由安徽东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遭到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四一二反共政变

蒋介石反共的决心已经定了。为了采取反共的重大行动，除他自身的准备外，还需要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也要利用上海流氓势力充当打手。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他派员到同南京事件有关的五国驻沪领事馆道歉，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在上海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保证用青洪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还把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离，而让由他支配的部队驻扎在上海、南京一带。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

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①]。4月1日，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后，曾同蒋介石等密谈。蒋介石主张立刻分共，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介石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蒋提议的分共事项；并表示可在会前由他通知陈独秀，让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此后，陈独秀和汪精卫立即一起前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至武汉办公。

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声称进行调解，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他们的欺骗，打开了大门，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强迫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进行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已在前一天被杜月笙骗去，遭到秘密杀害。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用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二千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举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

① 1927年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

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表明，蒋介石已经成了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势力的中心，虽然他在表面上仍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通电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职，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的点缀品。

人民群众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了愤怒的声讨。4月14日，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七人联名写信，强烈谴责军方的暴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①]。

那时，在武汉还保持着国共合作，那里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不愿看到一切权力为蒋介石独吞。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4月17日发布命令，开除蒋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六、大革命的失败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都是反革命政府，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仍是革命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只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它面对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和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张作霖在

---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被击溃后，调兵南下。其主力部队沿京汉铁路向南，抢占河南，对武汉政府构成巨大威胁。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情况也很复杂。刚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当时的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但骨子里认为当时分共虽“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①。他同掌握这个地区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开始限制工农运动，力图控制武汉局势，观望风向，随时可能从动摇到背叛。

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继续在武汉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所面临的斗争任务比前一时期更加复杂。怎样对付武汉政权外的敌人，怎样对付这个政权内的很不可靠的同盟者，要不要和能不能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新的突然事变作好应付的准备，这都是考验党的问题。

危急形势下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时，党内发生了两个尖锐的争论问题：一个是所谓深入和广出之争，一个是东征和北伐之争。所谓深入，就是以为现在革命应该深入，立刻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有的革命根据地，再图发展。所谓广出，就是继续对外发展，土地革命应该等打到北京后再实行。所谓东征，就是讨蒋。所谓北伐，就是进兵河南，讨伐奉军。

争论的结果，鲍罗廷和陈独秀等坚持的北伐讨奉的主张占了上风。这种主张，正同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决策相一致。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之所以提出这种主张，是因为：第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对正准备从陕西东出河南的冯玉祥部国民军联军抱有极大的幻想，认为冯是可靠的同盟者，只要同他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能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再图东向。第二，认为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害怕立刻东征会同帝国主义势力直接发生冲突，造成失败。第三，认为武汉地区已被四面包围，商业、金融、物资都遇到严重困难，不打出去，经济上难以维持。只有向外发展，才是出路。第四，认为武汉国民政府领袖们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已处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

在严重动摇中，如果实行土地革命，会促使他们脱离革命而同蒋介石妥协。这种主张，当时被称为“西北学说”。

“西北学说”的实质，是不敢采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广泛武装工农的果断措施来挽救革命，而是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汪精卫等允许的范围内，以此来稳定武汉国民党。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①。持有这种主张的人，表现了对于人民力量的悲观和对敌人力量的恐惧。他们不是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而是寄托在同冯玉祥的会师上。

4月19日，在武汉举行继续北伐的誓师大会，武汉国民政府所属主力部队陆续向河南进发。深入土地革命和东征讨蒋这两种主张都没有得到实行。

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这时，党员人数比北伐战争前有了很大增长，已近5.8万人。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可是，这次大会没有能满足全党的期望。它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这些在当时都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它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已叛变，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在以后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它又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好像这是很可靠的联盟，这就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且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觉，不去作好相应的准备。大会提出“土地革命”的要求是正确的，但由于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是先取得汪精卫等的同意，又使这个主张成为一句无法实行的空话。对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大会连谈也没有谈。在局势如此危迫、全党正期待着采取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时，谈论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0页。

行”，更是空泛而不切实际的。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任何办法，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却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中共中央的右倾投降主义

五大闭幕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由于反动势力的包围和封锁，商业停滞，工厂企业纷纷倒闭，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财政亏空严重，工人、店员大量失业，土豪劣绅、反动军官们乘机捣乱。汪精卫等攻击和破坏工农运动的言行越来越多。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通电攻击武汉政府。17日，他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被武昌卫戍司令叶挺部击退。5月21日，原由军阀部队收编而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使长沙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下。这在当时称为马日事变[①]。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6月6日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

鲍罗廷和陈独秀等在这种情况下，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同冯玉祥部的会师上。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经过浴血奋战，以伤亡一万四千多人的巨大代价（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伤亡最大，优秀指挥员、共产党员蒋先云在作战中牺牲），击溃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使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得以在5月31日占领郑州。6月10日至12日，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在郑州同冯玉祥开了两天会议，决定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独揽，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这时，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已发生很大变化，提出停止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对立等主张。6月20日，他到徐州同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随后，他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将鲍罗廷解职回国，并将国民军联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和大批

① 当时电报中以韵目代日，“马”即21日。

政治工作人员解职。

这一来，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西北学说”完全破产，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步伐大大加快。

局势越来越危急了，陈独秀和苏联顾问等依然一筹莫展，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一味害怕刺激汪精卫、唐生智等，继续执行退让政策，以为这样才可以使汪、唐等找不到分裂的借口。他们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这一切并没有起到稳定武汉国民党的作用，只是更加助长反动势力的气焰。一位苏联顾问在日记中说：“武汉越来越像南京了。”[①]武汉的反革命政变随时可能发生。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共中央发来相应的指示（即“五月指示”）。其要点是：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两万共产党员；没收地主土地。虽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但这个指示是把当时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提出来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革命当时有可能轻易取胜；而是说，采取这种果断措施之后，党将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也可以在早有戒备的状态中给反动派以有力的反击，而不致遭受过分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共中央认为，“五月指示”提出的任务是难以实行的，仍然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最后拉住汪精卫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陈独秀当面将意见书撕毁。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他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现在已处在“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

① 〔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因此，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7月14日，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随后在汉口公开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引者注）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她严肃地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了三年多的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

这一次国共合作下发动的大革命，在中国的国土上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基本上推翻了遭受全国人民痛恨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人们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相当普遍的革命洗礼。尽管这次大革命最后失败了，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消除的，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新的起点。

这次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从客观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暂时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巨大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缺乏斗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而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革命措施，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使革命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

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出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出了些错误的主意，这对酿成中共领导人的投降主义错误是有影响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

这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第　三　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一、革命进入低潮和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

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气蓬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它成立以后从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二万六千多人。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党的组织只能转入秘密状态，在这过程中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了。不少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内和团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党、团，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宣布脱党、向敌人忏悔，有的甚至领着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急遽减少到一万多人。党内思想一时异常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原来蓬勃发展的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走向低沉。

中间派人数众多，在政治上往往摇摆不定。当革命形势胜利发展时，中间派往往大批地向左转；当革命形势遭受挫折或低落时，许多中间派便向右转。这时，虽然仍有一些共产党外的政治活动家和正直人士坚持革命立场，不和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同流合污，但相当多的中间派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他们或者被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吓得目瞪口呆，趋向消沉；或者因为国民党过去是一个有着革命历史的政党，这时仍打着孙中山的旗帜，继续

进行北伐，所以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事实无情地说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要始终如一地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并不是容易的。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这种可贵的大无畏品格。有如毛泽东在十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和那些在危难时刻脱离党的不坚定分子相反，党外一些坚定的革命者恰恰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如彭德怀、贺龙、徐特立等。许多工农群众在党的旗帜下重新集合起来战斗。当反动派把郭亮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城门口示众时，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朋友鲁迅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①

面对着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不这样做，就无异于坐以待毙，听任整个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问题是：在这样无比艰难的条件下，如何继续高举革命大旗，如何进行武装抵抗。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声响亮回答。

由于中共中央在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忽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那时候南方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人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其中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他们正分驻在江西北部。这是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共同注目的力量。7月15日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后，立刻调动军队对这个地区采取包围之势。张发奎也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

①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的表示。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再不当机立断而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完全断送。

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在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起义部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南昌，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9月下旬，起义军占领潮安、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由于部队在盛夏烈日下连续长途行军，过于疲劳，加上作战中伤亡和中途的逃散，部队已严重减员。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终于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周恩来后来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

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周恩来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出现这种错误也不奇怪。在这以前，中国共产党只有过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的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的力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先夺取农村的先例。人们总是容易根据自己原有的经验来处理新遇到的问题。这种错误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难以完全避免的。

当时，全党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

线和政策。南昌起义后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八七会议。新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着重指出：它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而且“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像八七会议那样对过去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的结论。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党内“左”倾情绪在这次会议上虽然只居于次要地位，但其发展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已在8月3日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

①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记录。

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省委会议上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暴动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对暴动问题，他主张："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对土地问题，他认为："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① 接着，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个县发动，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这支军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共计约五千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这次起义同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它最初仍以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计划的要点是：由各团分路出发，同当地农民暴动结合，对长沙取包围态势；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人暴动为内应，一举夺取长沙。起义在9月9日发动，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反动军队的力量远比起义军强大，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

这时，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他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当这支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

---

①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8页。

的三湾改编。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还派人同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取得联系。10月7日，他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广州起义。

那时，张发奎部已南下进驻广州。在他的部队中，保留有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广州和它周围地区的工农运动在大革命高潮时又有较好的基础。11月间，张发奎同李济深、黄绍竑部为了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爆发了战争。张部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作战，广州市内兵力空虚。留驻广州的教导团等革命力量已引起敌人的怀疑，如不迅速采取行动就有被解散或消灭的危险。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12月11日发动了起义。

这次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广东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还有市郊的部分农民武装。经过十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苏维埃”这个名词是从苏联搬来的，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这时，张发奎部主力急忙回师广州。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叶挺主张趁张部主力尚未开到前把革命武装撤出广州。这个正确主张却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结果，起义军失去及早避开优势敌人打击的时机，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战士英勇牺牲。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的反击。起义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内部发生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但实践又一次证明：在国民党新军阀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

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在广东，有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起义，还有琼崖起义。在江西，有以吉安县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起义和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赣东北起义，还有万安起义。在湖南南部，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由广东进入后，取得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发动了占领宜章、郴县等七个县的湘南起义。在湖北的洪湖地区和湖南的桑植地区，有周逸群、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起义。在鄂豫边，有中共黄麻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在福建，有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起义。在河南，有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确山起义。在陕西，有刘志丹等领导的渭南、华县起义。

这些起义表明，革命的火种是反革命军事镇压扑灭不了的。因为这是正义的、符合广大人民要求的。这些起义不少是在大革命风暴中受过锻炼并坚持革命信念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散回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家乡，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发动受压迫的工农群众，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起义，一部分因为实行了错误政策或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很快失败，但一部分仍坚持下来。这些能坚持下来的地区，大多是处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山区。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

革命已处在低潮，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主要的中心城市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所控制。那些没有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地方，革命起义也比较难以发生或难以长期存在下去。而在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特别是在那些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仍有着共产党人活动的余地。这时的活动不可能再采取北伐战争的那种形式，不可能是夺取中心城市和冲要地区，一下子在全国造成革命声势。这时需要的是退却到比较不显眼的农村地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火种。农民是有革命要求的，但他们通常习惯地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又比较分散，要把他们发

动并组织起来并不容易。但只要紧紧依靠当地的劳苦群众，并执行正确的政策，革命力量在许多地方是能够生存并逐步发展的。如果不坚决地走这一条路，革命就会失败。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恰当地规定斗争任务。他们坚持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只会处在“一直高涨”中。他们不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区别哪些地方有条件发动武装起义，哪些地方只能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而是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以为这样可以震动全国。并且声言：如果认为不可“轻举盲动”，想多“保存”党的力量，“那就又是机会主义毒发作，势必至于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①，还采用惩办主义的手段，对干部进行错误的纪律制裁。对中国实际国情了解不多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许多这种性质的错误指导，还提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无间断的革命”的主张。

通过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在一段时间内对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的决议案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并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等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分别给以政治纪律处分。

这次会议前后，在一些党组织力量十分单薄而敌人拥有强大武力的地区，也发生不顾一切的蛮干，盲目举行武装暴动，如无锡暴动、宜兴暴动等。这类暴动大多很快被镇压下去。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的损失。

事实证明，尽管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反动势力不可能建立长期的稳定统治，人民也不可能放弃斗争；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加强了，而革命势力却遭到严重的削弱。从全国

---

①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7年11月，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41页。

范围看，革命已进入低潮时期，革命潮流并不是在“一直高涨”中。

为什么明明革命已进入低潮而中国共产党内却会出现这种“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许多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斗争坚持了下来，这是了不起的。但他们还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恶，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他们容易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事情的另一个方面，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容易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革命者内部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历史现象。

但是，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毕竟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 年2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又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盲动主义和罗米那兹的错误。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通告，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 年6 月18 日至7 月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针对当时不少党员认为资产阶级既然已经退出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大会指出：应该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判断在当时是解答了党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大会作了正确的结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且指明：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

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大会的决议，在全党传达贯彻后，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作用。

六大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推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把向忠发选为党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受到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事实上，向忠发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六大也有缺点，主要是：第一，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这就不能把更多的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争取过来，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处于历史大变动的年代，面对着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要在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初期就对所有这些问题一下子作出准确的判断是不可能的。拿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过去总是把革命活动的重点放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可是，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普遍地牢牢控制全国极为广大的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党只能把革命活动的重点首先转到农村中去。对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多次的反复摸索和检验，人们才能认识清楚，从而使许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二、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为什么在周围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井冈山的斗争不仅能坚持下来，并且能得到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分

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①

井冈山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原在这里的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部队虽然大体还属于旧式农民武装的性质，但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

当毛泽东率部到达这里时，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在中国南部，李宗仁部同唐生智部之间的战争正在进行，当地的军阀部队纷纷北调，湘赣边界空虚。毛泽东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他在1927 年11 月上旬主持召开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指示各县尽快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因为自马日事变后，边界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只剩下一些避难散居的党员，而没有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开创革命根据地的。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使边界党的组织逐步健全起来。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毛泽东又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7 页。

的本质。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工农革命军还对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边界各县和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工农革命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剿”，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正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一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

这次会师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大革命时期战功卓著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有较强的战斗力。参加这次会师的谭震林回忆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① 接着，又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反动统治在南方相对稳定下来。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进剿”。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边界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中的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散兵力，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由于这些策略适当，加上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又不尽一致，所以，尽管前来“进剿”的军队至少有八九个

---

① 谭震林在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1981年8月20日，见《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第21期。

团，多的时候达到十八个团，但红军以少数兵力，经过四个月的周旋，却接连击破敌军三次“进剿”。最大的一次胜利是6月23日的龙源口战斗，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军两个团。这次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县各一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前敌委员会特别重视革命军队的建设。红四军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一是旧军队。为了把他们教育训练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四军首先从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着手。党的组织分军委、团委、营委、连支部四级，班有小组，党员人数发展到约占全军的四分之一。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有了阶级觉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项常识，知道自己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作战的，而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群众服务，因此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并为革命而英勇献身。

红军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实行部队内的民主主义。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①

在作战方面，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同土地革命是不能分开的。井冈山根据地所在地是交通阻绝的农业区域，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农民们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湘赣边界的土地状况，大体说来60％以上在少数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页。

主手里，只有不到40%在农民手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把全年收获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缴给地主，还要无偿地为地主服各种劳役，并受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这种土地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所在。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分田的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内部的逐步稳定，从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

当时分田的办法是：在县、区、乡各级分别成立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土地委员会，主持分田工作，并抽调红军干部下乡进行帮助。土地的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只有在极少数山多田少的地方才以三四个乡作为一个单位。男女老幼一律按人口平分，以原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土地分配完毕后，组织复查，把地主原有的地契当众焚毁，并在各户土地的边界插上写有名字的竹牌，再征收土地税。1928年12月，在总结分田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有着重大的意义。但这个初次规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尽管如此，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地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为了长期进行斗争，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八七会议对乡村提出的口号还是“政权属于农民协会”，后来有些文件上有了建立革命委员会、工农苏维埃政权等提法。广东陆丰、海丰先后成立过县苏维埃政府。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1927年11月28日，在茶陵县成立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担任主席。1928年5月，在宁冈县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湘赣边界，县级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最多时达到六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当时给省委

的报告中写道："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出现过一次曲折。1928年6月间，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对这种主张力持异议。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主要由湘南宜章农民组成。他们参加湘南暴动是坚决的，但身上依然保存着不少农民小生产者的弱点，家乡观念浓厚，又不习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听到湖南省委指示后，强烈要求返回湘南，甚至不顾朱德、陈毅的再三劝阻，开始自由行动。朱、陈担心他们单独行动会招致失败，不得不率第二十八团同他们一起向湘南开进。湘南这时已是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红军攻下郴县后，敌军反扑，第二十九团士兵便自行散回家乡。朱德、陈毅率余部向桂东转移，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一部前来迎接，一同返回井冈山根据地。在这次行动中，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都受到很大损失，通常称为"八月失败"。这个沉重的教训说明：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人民军队建立的初期，出现八月失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

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边界大部分失地，粉碎了敌军"会剿"，使根据地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恢复。中共中央又决定重新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工作。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它的第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又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可见红四军的领导人是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同旧式的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的。

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的时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并且在广大革命者中燃

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65页。

起了新的希望。

可是，井冈山这个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山区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这个地区的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连军民的日常衣食用品也难以保持必要的供应。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向南和向北也不易发展，因此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在红军力量逐渐扩大时，便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

1928年7月间，在湖南平江，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举行起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这支红军在平江以东的湘鄂赣边界地区与敌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战斗。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工农红军第五军七百多人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不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

向赣南、闽西进军和古田会议

赣南地区的条件更便于红四军发展。这里山峦起伏，林木繁茂，物产比较丰富，并同闽西、粤北山区连接，回旋余地宽广，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后已组成由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并在吉安的东固建立起小块的秘密苏区；反动驻军力量薄弱，战斗力不强，而且主要是外省军队，同本地地主豪绅的关系不那么密切。这里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敌军往来聚集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下井冈山。他们最初的经历是很艰难的：由于脱离了原有的根据地，又受着敌军重兵的尾追和袭击，屡次陷入险境。2月11日，他们在赣南瑞金的大柏地伏击，一举歼灭紧紧追来的敌军刘士毅旅大部。这次大捷，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随后，他们挥师北上，到达东固，同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开

始在赣南站住脚跟。

红四军分析周围的实际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他们先利用闽西敌军兵力空虚的机会，向闽西急进。3月14日，在长岭寨全歼国民党福建省防军郭凤鸣旅，乘胜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城，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给养。接着，又回师赣南，4月1日在瑞金同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主力会合。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部队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又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赣西南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两处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这时，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之间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① 这些争论的产生，根源仍在红军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要改变他们原有的观念和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能在这些问题上统一认识，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改选时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的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中共中央在8月21日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这次大会提出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②。不久，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红四军的工作。9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信规

① 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第38、39页。

② 《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第41页。

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以有战斗力,在于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是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作保证的。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样,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它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它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它尖锐地批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指出它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性,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来做。它是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有二万余人,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在赣南和闽西的革命根据地内，土地革命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订了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修改。同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原则。会后，在闽西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进行了分田，使六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在江西吉安召开的地方和军队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决定深入土地革命。会后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也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次年2月，毛泽东按中央决定又指示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样，又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摸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土地制度改革后，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农村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认为“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他在《兴国调查》中写道：贫农在十二个方面得到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他还写道：土地革命中，中农在经济上，“多数于平田时是平进了的”；政治上，“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现时，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这样，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普遍高涨，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前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先后开展起来。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不改变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在中国，不存在单纯代表农民的政党，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代表人物，或者根本不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或者只是说了一些空话。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坚决地脚踏实地地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向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猛烈开火。

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自然是有弱点的，目光比较狭窄，行动比较散漫，因而有一个需要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但他们中间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是许多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比拟的。过分地强调农民的消极方面，而不首先充分肯定它的积极方面，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中国革命仍然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是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了坚持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完整的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说明。他批评了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

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① 几年后，毛泽东又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

在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以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便成为摆在党面前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党一直仍以城市为工作重点。大革命失败后最初的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都没有达到预期占领中心城市的目标。片面重视城市的观点固然在党内并不是很快完全消失，而是如下文所说，还继续出现，造成对革命的危害，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人都只是死守某些书本上的教条，只是硬搬别国的模式，只把眼睛看着城市，而不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下定决心向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的广大农村进军，中国革命早就会被葬送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从实际出发，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从而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三、革命走向复兴时的“左”倾错误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在大革命失败后似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了。

这种局面的出现，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时期，但自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起，重又陷入连年不断的新军阀混战之中，许多原来“清剿”工农红军的军队纷纷调往军阀混战的战场，后方空虚，给了各地工农红军以发展机会。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8—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2页。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根本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更加激化。南京政府日益法西斯化，全国工农平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解放。就是原来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人们，不满也日益增长起来。从主观方面说，六大后中共中央在这个时期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比较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做了大量很有成效的工作。

1929 年和*1930* 年初的革命复兴

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写道："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失败的关系。工作的方向，必须坚决的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并且明确地规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以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的转变。

在国民党统治区，党所面对的局势是严峻的。1927 年11 月开始的"左"倾盲动主义，使经过大革命失败而艰难地保存下来的力量又遭受新的沉重损失。中共中央曾把湖南、湖北和广东当作重新发动斗争的中心，这些地区遭受的破坏最为惨重。对如此险恶的环境，各地党组织很不能适应。它们大多是在大革命风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过去往往只有两种经历：大革命时期那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方式，或者按照"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只依靠少数人拼命，不顾一切地蛮干。六大前后，情况虽已在变化，但还没有根本改观。党的骨干大多集中在省委、特委和一些重要城镇中，形成庞大的秘密机关。党同群众处于严重的隔离状态。许多支部陷于涣散，甚至名存实亡。

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党的许多优秀分子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六大后的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了以下原则：第一，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只有在下层组织已经健全起来、工作有了开展以后，才能建立上层组织。第二，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求各地党组织设法从各方面（包括采取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接近工农群众，实际考察他们的生活痛苦和要求何在，艰苦耐心地去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一点一滴做起，日积月累地聚集力量，实现"争取群众"的目标。第三，坚持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充分利用职业和社会关系的掩护来开展工作。

在努力克服“左”倾错误的同时，党又坚决地同右倾的主张和行为作斗争。那时，陈独秀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取消主义者。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取得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前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他们取消革命运动，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所谓“流寇运动”。在党提出批评后，他们不但拒不接受，而且秘密成立反党的小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屠杀下，要把广大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党的组织保存下来是极不容易的，要使它得到巩固和发展更不容易。这不仅需要有勇气和毅力，而且需要有智慧和比较正确的指导。

经过一年的工作，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对党的状况作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① 据会议统计，全国的党员人数，在六大时是四万多人，六届二中全会时增加到六万九千人，到1930年3月发展到十万人。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地区内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尽管中间经历过严重的曲折，这些经验对此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更加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在这时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使工作获得巨大的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十三个军，六万二千多人。除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贺龙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并利用他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

---

①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2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9年3月，中共中央给他们写信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① 1930年7月，他们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一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三块：一块是在黄(安)麻(城)起义基础上形成的鄂豫边根据地，一块是在商(城)南起义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块是在六(安)霍(山)起义基础上形成的皖西根据地。中央军委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指挥工作。1930年1月，由于这三块根据地的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有统一起来的必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派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赣南返回这一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这样，中国革命运动的面貌和六大时相比，大大不同了。周恩来在1930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六大后近两年的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结论。

---

① 《中央给贺龙及前委诸同志的信》，1929年3月19日。

② 周恩来：《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德国共产党《红旗报》1930年4月27日。

“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

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新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重新抬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1929年内接连写来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0月26日的信。它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并且认为：“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一“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当1928年革命浪潮低落，革命遭到严重挫败的时候，党内虽然一度出现“左”的错误倾向，大家还比较容易清醒过来，从而较快地纠正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一到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明显走向复兴时，党内不少同志又对革命形势作出脱离实际的过高的估计，“左”的急性病发展得更为迅猛而持久。

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这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新军阀大战。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它写道：“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

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它还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并且“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7月下旬，红三军团一度乘敌军防守空虚的机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8月5日退出)。李立三更加兴高采烈，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8月初，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1930年6月到9月)，但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脱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愿望或想象，急于求成。它必然受到那些了解并尊重实际情况的党内干部的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因在一次会议上尖锐地批评李立三忽视主客观实际情况的错误，遭到压制和打击。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6月间接到党中央要他们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他们在将到南昌时，根据敌我实际力

量对比，改变原有部署，决定不攻南昌。这时，红三军团已从长沙撤出。红一、三军团会师后，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共三万多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他们奉命再取长沙，猛攻不克。毛泽东因势利导，决定撤离长沙，转入江西。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错误表示怀疑或作了抵制。因此，“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红军和各根据地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作出《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认为“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他们回国后，立即开始纠正“左”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中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指出“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并批评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总结。

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会后李立三离开了原有的领导地位。城市暴动的计划已经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行动在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后已不再进行，中央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组织已经撤销，党、团、工会的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三中全会也有不足之处，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并错误地批评了曾经正确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但总的说来，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整个工作正在逐步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王明还散发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以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们夸大资本主

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他们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他们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他们的言论和活动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这时，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和干部也纷纷起来要求改组党中央。控制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等乘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这种混乱状况下，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已难以正常工作。

1931年1月7日，在来到中国的米夫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二十六岁的王明，由于得到米夫的支持，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原因在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准备都不足。当王明等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

王明一派人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倒是“右倾”，是“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王明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说：“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因此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他们要求继续打击中间营垒，强调推行“进攻路线”。

整个说来，这派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更多理论的装饰，所以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1931年的这次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组织第二党的分裂活动，因而被开除出党。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获悉，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党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沉着果断地采取措施，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一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6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又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很快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前往贯彻“反右倾”的斗争。但在四中全会各项“左”倾政策还没有来得及贯彻执行到许多革命根据地、特别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根据地时，这些根据地仍然取得了多次粉碎敌军“围剿”的巨大胜利。

当时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立三路线”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双方动员兵力达一百多万人的蒋、阎、冯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刻掉过头来，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这时红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十多万人，开始有可能实行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重大转变；红军所到之处已普遍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受

到群众拥护，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了广阔的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这些条件，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不曾有过的。因此，红军在这个时期的反“围剿”战争无论在规模和战果上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军队十万多人，在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下，发动第一次“围剿”。他们对红军的估计十分不足，因而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以为可以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这时，红一方面军约有四万多人。10月30日，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根据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寻找战机，等敌军疲惫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国民党军队深入革命根据地后，果然因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12月30日，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入龙冈地区的狭窄山路，突然遭到预先设伏的红军猛烈袭击。经过一天激战，红军全歼敌军近一万人，活捉了张辉瓒；乘胜东击，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打破了。

不久，国民党当局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二十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们鉴于上次失败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中央局举行多次会议研究对策，反对“分兵退敌”和退出中央苏区两种错误主张，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红一方面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主力，选择敌军薄弱环节，保证每战拥有优势兵力，先打弱敌，然后由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富田开始，连打五个胜仗，横扫七百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三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这次反“围剿”战争刚结束，蒋介石便在6月间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军队三十万人，立刻发动第三次“围剿”。他们倚仗这次有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又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企图把红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区“清剿”，以消灭全部红军。毛泽东、朱德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率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这时，各路

敌军纷纷逼近，红军突然从敌军中间的空隙穿出，在敌军主力背后三战皆胜，歼敌一万多人。蒋介石立刻命令所有部队掉头东追，红军以一小部分兵力伪装主力吸引国民党军队一直向东北开去，主力部队再度穿越敌军重兵之间的大山，回到兴国境内隐蔽休整。到敌方发觉时，红军已休整半个月。敌军饥疲沮丧，只好下决心退却。红军乘势再歼敌三万多人。这样，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这次战役后，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居民达二百五十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部西北军）一万七千多人在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率领下，于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像这样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还是第一次。它说明国民党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的不得人心，也反映出红军的力量已有很大的发展。

这时，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

工农红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原因在于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没有广大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持，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胜利也同毛泽东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分不开。它主要是：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个异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它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此作了系统的总结。

四、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和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1931年9月18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轻易地侵占了沈阳、长春等二十多座城市。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第二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3月9日，日方在中国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觉醒浪潮的高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以往，中国曾多次痛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威胁；这次，亡国惨祸真已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1931年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几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南京政府在日本的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一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七万人外，仍有十六万五千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在这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①。南京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和破裂。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给了日军沉重打击。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它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在5月5日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第二年，南京政府在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利后又同日军签订出让华北主权的《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南京政府的阻挠和破坏。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形势摆到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那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不能

① 《民国日报》1931年9月27日。

正确地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作出的一系列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

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主要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①。中共临时中央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说法完全脱离实际情况，自然难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对日本侵略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共临时中央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也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因而“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②。这样做，只能把一些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去。

他们没有在新的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③。

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要求上海等处“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拒绝采用合法形式来组织工人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

他们在作出这些武断的规定后还十分自信地写道：“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

---

① 《反对日本侵占满洲》，《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②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③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来！”①

这样完全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一味夸夸其谈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受到有实际经验的重要干部的批评和抵制，如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和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铁夫等。刘少奇主张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聚积和加强力量，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他们的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被无理指责为犯有“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他们被撤销了领导职务。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活动本来极为困难。“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这种主观的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变得更加困难。从1931 年初到1932 年底，中共河北省委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全国赤色工会的会员，到1932 年1 月只剩下三千人。临时中央难以再在上海立足，不得不在1933 年初迁入中央苏区。这以后，党成立上海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 年3 月到1935 年2 月间接连遭到六次大破坏，到1935 年7 月停止活动。到这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仍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坚持斗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却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是极端不得人心的，不能不激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并促使中间派乃至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化。尽管中共临时中央当时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但许多要求

---

①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 年9 月20 日，见同上书，第415 页。

进步的人仍能从事实中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并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从而一步步地向党靠拢。

第二，中共临时中央那套“左”的指导思想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行得通的。它虽在许多地方用强制的手段加以贯彻，但不少共产党员以至有些党的组织，为了坚持并发展革命斗争，在客观现实的教育下，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左”的指导思想的某些束缚，在实际工作中逐步作出调整，采取了一些灵活而有效的做法。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和上海局屡遭破坏后，同中央失去联系的一些在上海的党组织（如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后来成立的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等），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独立地进行探索，工作中有不少新的创造，实际上突破了少数领导人的主观主义错误指导。

对“左”的指导思想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开始注意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和尽量利用各种合法阵地开展工作。虽然当时这样做的人未必已从根本上分清路线是非，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在临时中央有些领导人中，也多少出现这种变化的征兆。张闻天1932年10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他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并且强调：“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坚决的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①

宋庆龄在1931年6月因母亲病重而从欧洲归国。她回国后，立刻投入营救被捕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牛兰的活动。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她悲愤地发表宣言，公开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② 她先后发起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宋庆龄、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12—13页。

② 宋庆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见《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5、27页。

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后来杨杏佛因此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任主要领导人，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反响。有一些共产党员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同党一直有着亲密关系的鲁迅，所写的大量杂文，无情地揭穿了大地主大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貌、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他也尖锐地批评当时文化界存在的种种“左”的倾向。1930年3月，他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团结广大爱国者、发展进步力量方面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是共产党人对《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帮助。《生活周刊》原来的内容主要是谈论个人修养问题，进行一些“职业指导”，其政治思想倾向属于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九一八事变使邹韬奋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党。《生活周刊》从此办得有声有色，发行数量达到十多万份。邹韬奋的言论在青年中产生极大的影响。1932年7月，他又创办生活书店，出版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个书店工作。

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利用合法阵地开展工作。1929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在六年时间内，他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等的一些文章，分别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

傅东华等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1933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通过明星、联华等影片公司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夏衍编剧)中的主题歌。这首歌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对动员人民奋起救亡起了巨大的作用。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最早的中文全译本都是在三十年代前期问世的。他们参加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愈来愈注意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具体实际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用青年群众易于接受的多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

当时的左联、社联等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他文化工作者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以这些组织为核心的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做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骨干力量。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在三十年代初还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的“左”倾错误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同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

后，选出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当时各个苏区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部分红军的统一指挥。然而，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片面地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近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规定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对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的。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苏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曾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当作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他们的战略部署是分两步走：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首先调集三十多万军队，在1932年7月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攻，自任总司令。那里的红军主力是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经过长期的艰苦战斗，已发展到约四万五千人，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如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主动诱敌，避强击弱，包围迂回，围点打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特殊条件下，主动进攻作战，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但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边区，就从个人野心出发，排除异己，撤销原边区领导人曾中生的职务，不久又在肃反斗争中杀害了忠实于革命的红军优秀将领许继慎和大批干部与战士（曾中生后来也被杀害），造成严重的混乱。当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时，张国焘又盲目轻敌，不作对付“围剿”的准备，反而命令红军远道向南出击。红四方面军英勇作战，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但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并在连续作战中打得十分疲劳。这时，国民党军队已重兵压境，使红军一开始就处在被动地位，数战不利。张国焘张皇失措，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多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历时两个多月后，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同一个月，国民党军队十万多人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湘鄂西的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邓中夏相继任政治委员），从1930年冬起，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多次胜利。洪湖地区的红军，利用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人重大杀伤。但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红二军团在1931年3月改编为红军第三军）政委的夏曦同样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斗争中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将领，在作战中，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到重大伤亡，只得退出湘鄂西（夏曦后来在行军中牺牲）。经过长期转战后，开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随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前来会合。红三军也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使他们的力量得到很大增强，共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还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提出要求：“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下，连克乐安、宜黄，取得歼敌三个旅的胜利。这时，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的负责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方负责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军大举进攻前主动出击，攻城打援，取得速胜。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周、毛、朱、王在9月下旬连电苏区中央局表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严厉批评前线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朱、王坚持将毛留在前方，但多数人不同意。会后，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以陈诚指挥的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红一方面军兵力约七万余人。苏区中央局连电前线，

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南丰、南城。周恩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复电说明目前条件不利于攻城，红军应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个正确的意见遭到苏区中央局的拒绝。周恩来、朱德在率部强攻南丰不克后，迅速下决心将主力秘密转移，寻机歼敌。在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歼灭前来追击的陈诚部精锐主力近三个师，缴枪一万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正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时，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早在一年多前便已提出：“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这一任务已经不是将来革命发展的前途，而是目前所要实现的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斗争任务。一切我们工作的布置，就要拿这一任务的完成为中心！”① 临时中央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执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为了排除障碍，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等，根据实际情况，反对这种“左”倾的“进攻路线”，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对不同意见的压制，造成人心惶惶，使中央苏区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1933 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自任总司令。他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他先后调集一百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五十万军队从 9 月下旬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

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力已有八万多人，比过去有很大增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和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军事指挥。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的阵地战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 年12 月11 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 547 页。

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是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就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当时出现过一次对红军粉碎“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等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在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愿意在下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是个有重要意义的宣言。但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很快失败。由于红军坐失了这次良机，蒋介石便得以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当强大敌人进攻时，在土地问题上，进一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结果是扩大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并且导致只能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并亲赴前线指挥。经过十八天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八万六千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这年7月，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他们同方志敏部红十军会合后，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分两路北上抗日。但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终因众寡悬殊，在1935年1月失败。方志敏被俘，英勇牺牲。

在大革命失败后那样极端严酷的形势下，由于党吸取了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曾经使革命重新走上复兴的道路。当国民党政府最初对苏区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时，尽管敌我力量那样悬殊，由于党和红军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依然取得多次反“围剿”战争的巨大胜利。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情况本来十分有利于党和红军去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可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几乎导致革命的失败。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

五、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中央红军长征在开始时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进行的。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全军八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由粤军、湘军、桂军分别堵截。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但也遭到惨重的损失。突

破最后一道湘江封锁线时，由于湘、桂军阀间的矛盾，敌方防线曾出现一个缺口。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如果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迅速抢渡湘江的。但由于随携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中央机关在两天后才赶到渡口。这时，湘、桂两军已在飞机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固守渡口的红军为了掩护其他部队渡江，付出巨大牺牲。直到12月1日，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东岸而全部损失外，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事实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

遵 义 会 议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入，准备将它一网打尽。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部队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二天的休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忽然获得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增援。毛泽东早就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① 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地奔袭云南，先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在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休整五天，继续北上。这里已是四川境内。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红军一部分由十七勇士领头，强渡成功。但大部队仍不可能在这里迅速过河。大部队乘敌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以两天时间赶完三百四十里行程，直取泸定桥。以二十二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缘桥上铁索，冲过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过河后，他们又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这座山位于懋功以南，海拔四千多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里路，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有些人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6月1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在此迎接的红四方面

① 刘伯承：《回忆长征》，见《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红四方面军是在4月嘉陵江战役胜利后,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的)。接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都出席了大会。

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会师大会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这时,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具有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较好。结论是应该去"川陕甘"。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通过这个战略方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

本来,在两大主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加,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三万人左右,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两河口会议时,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后却处处作梗,借以要挟,取得红军总政委的职位,但暗中仍酝酿南下四川、西康边境地区。8月3日,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已改称红一、三、五、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大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一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吃,冻馁交加,体质已十分虚弱,很多人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8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

牺牲在草地中。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可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又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他仍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红军北上和三大主力的会师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月17日，先锋部队攀登悬崖陡壁，袭击国民党守军侧背，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的开阔地带。随即占领哈达铺。在这里，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27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10月19日，北上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他们在甘泉同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

坚持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的张国焘，在9月下旬指挥原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分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10月5日，他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斗争，并同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徐向前等一起，耐心地对受欺骗的指战员做工作。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22日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重新南下的部队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四万多人，减员过半。这时，中共中央仍一再来电，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红二、六军团即将到来。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在这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也经历千难万险，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支持，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八个省的十五个地区独立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失去同中共中央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重重艰险，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先后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六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长征的传奇性故事传遍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由于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革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人数已大大减

少。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他们在长征途中，还到处播下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六、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侵略者从九一八事变后，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 年 2 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①。但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意愿相反，造成全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热潮。

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 年 6 月初的何梅协定（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间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0 月间，日本的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 月6 日，土肥原贤二甚至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20 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五个师的兵力取河北，六个师的兵力取山东。这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蓟密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割据冀东二十二个县，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 月，在北平成立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

① 蒋介石 1935 年 2 月 14 日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谈话。

实行华北特殊化。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反应自然最为强烈。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三十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 年春夏之交，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当群众抗日情绪日趋激昂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学生在 12 月 9 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城内一二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前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三千人。军警突然用水龙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游行队伍被打散了。学生有四十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一二九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增强了他们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这个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11 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2 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并。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些情况说明：1935 年冬季的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国民党统治者不愿意也不能够领导人民的抗日力量，他们仍然站在人民抗日

力量的对立面。国民党政权也不能实现全国的统一，它内部派系林立，各实力派互争雄长，多次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在国民党政权下，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没有变化。他们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那时中国的重工业根本谈不上(1933 年钢产量只有 3.5 万吨)，在轻工业中棉纺织业最称发达。但拿1936 年同1927 年比较：在全国的纱锭总数中，外国资本拥有的份额由42.9%增加到46.2%，民族资本拥有的却由57.1%下降到53.8%；外国资本拥有的布机由54.8%增加到58.1%，民族工业拥有的却由45.2%下降到41.9%。在国民党开始取得全国政权时，中产阶级曾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却得到濒于亡国的局面。如何使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任务就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能否实现这个任务，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开拓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瓦窑堡会议

1935 年 7 月 25 日起，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

结束万里转战的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便在同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他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他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同日军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同时,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积极地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1936 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当时平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下,暂时处于低潮。刘少奇到天津后,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先后发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文章,对党的路线、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强调要把着眼点放在蓄积力量、准备决战上,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存并加强自己的力量和阵地;针对平津学生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着重提出要正确地对待教师和学校当局,正确地对待二十九军和宋哲元,鼓励他们向好的方面走。他用很大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中共中央和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接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的爱国救亡运动。

第二，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周恩来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发出大量信件。这个工作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东北军广大将士，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东北籍的进步人士杜重远等也对张学良做了不少工作。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1936年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对许多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达成协议。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同一些共产党员有过友好的关系。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等去见他，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这样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重大胜利。

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巨大成绩。1936年10月，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五人（后陆续增加到十六人），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以个人身分接受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邀请，到太原协助阎锡山从事抗战准备。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这个委员会专门领导公开合法的活动，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它同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严格分开，不发生横的关系，直属北方局。当时山西有一个重要的抗日团体叫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牺盟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薄一波到山西后，在11月上旬担任牺盟会秘书，实际上负责牺盟会工作。此后，牺盟会便发展成为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的组织，从太原

发展到全省各县。在它的推动下，山西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从1937年年初起，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以主要力量投入培训军政干部的工作，为在山西组建革命武装作准备。

国共合作的酝酿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议案。蒋介石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虽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轻言牺牲"；但又是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次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他后来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①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②

这以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国民党领导人在宋庆龄帮助下，找到以牧师身分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秘密来到瓦窑堡，同博古见面。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

①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1981年版，第69页。

② 同上书，第72页。

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具体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董健吾把这个密件带回南京。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接通了。

为了表明诚意，5月初，原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国共两党的高层接触，包括周恩来外出谈判，也开始在酝酿和商议中。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那样一帆风顺。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他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其实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编，特别是必须解除武装，才能“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仍然企图用武力来解决。当1936年秋陈济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被解决后，蒋介石腾出手来，又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使蒋感到坐立不安。这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随后移解苏州关押，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接着，国民党政府又在南京逮捕了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

晓村、曹孟君。救国会领导人的被捕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义愤，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正在这时，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拒绝。当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后，蒋又在12月4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领全部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连续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蒋的严词训斥。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到蒋介石所住的临潼华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陈利害。两人争论了二三小时，张学良讲得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① 这样，就逼得张、杨感到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他路可走。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便是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使南京政府极大震惊。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主张。倾向于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向西安进攻。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在17日到达西安。对

---

①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用意和主张，中共中央抱着充分肯定的态度。对西安事变应该怎样解决，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并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敌对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欢迎的前途。现在，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欢迎的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①。

第二天，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发展。西安事变显示出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要求已何等强烈。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决，也充分表明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②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又在1937年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

① 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致中共中央电，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② 毛泽东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等，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5月，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接着，又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7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是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曾经两次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的削弱，几乎濒临覆灭的危险。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张皇失措，灰心丧气，甚至向反动势力屈服。国内外敌人曾认定中国共产党要彻底失败。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

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付，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那种脱离实际，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者只凭主观愿望和热情而急于求成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左”倾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因而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第　四　章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这次战争是中国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三十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8月13日，日军为了求得“速战速决”，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又把战火烧到上海。他们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以为能够在短期内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三个月①。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事情清楚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应当以民族利益为重，使自身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只有这样，各个阶

---

① 〔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资料》第9卷，东京1964年版，第17—18页。

级和政治派别才有自己的前途。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共同认识。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①]同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②]。接着，派叶剑英在西安代表中共中央于7月14日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③] 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④]。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想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继续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国民政府外交部于7月19日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② 同上书，第278页。

③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6—77页。

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这一提议遭到日本外务省的拒绝。日军侵占北平、天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也使原来进行的谈判难以继续下去。日军进攻上海，更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在全国要求抗战洪流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外交部于8月14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①

国民党当局原来曾希望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也曾为他们“共同防共”的说法所打动。但事实表明：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吞并整个中国。这既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也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的打击。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这时不能不改弦更张，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民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

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同意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1937年8月，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②，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编制四万五千多人。接着，八路军总部率各师先后出师抗日，同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杀敌。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二十三个县，人口约一百五十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这次合作首先是实现军事上的合作。周恩来说：“国

---

① 《国民党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1937年8月14日。

②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随之，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副指挥改称总、副司令。

共实际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在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国民党当时的政策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

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在1937年11月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① 国民党内的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一度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进一步投入抗日的洪流。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也踊跃购买救国公债，为前线捐赠钱物，积极组织厂商内迁。在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它的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各国。欧美等洲的华侨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筹集现款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这样就使日本侵略者突然发现，它面对的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整个中华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两条路线的对立

围绕着抗日战争，国内外形势仍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在国际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力量和态度。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一举吞并中国，并以准备袭击苏联的姿态来引诱反苏的英、美帝国主义对它让步。德、意法西斯支持日本侵华。苏联明确地支持中国抗战，但它更看重的是国民党的力量，把它看作抗日战争的主力。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国国民政府

① 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见《为新中国奋斗》，第109页。

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表示：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决不坐视”。苏联派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先后来华，并在财政上、物资上给中国政府以援助。英、美采取两面政策：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损害了它们在中国和东方的利益，同日本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但它们当时正忙于应付由德、意引起的西方紧张局势，又害怕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因此，它们一方面主张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给中国以一定的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寻求妥协，企图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来缓和它们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并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在国内，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力量和态度。人民大众坚决主张抗战，决心保卫祖国。在亡国的危机面前，不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由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也站在抗日方面，不愿做亡国奴。但不少人对如何开展抗日战争还不清楚，对共产党一时也不了解。特别是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要求抗日，但对局势还没有全面的认识。鉴于国民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国际上承认的合法政府，又有二百万军队，它的“正统”地位是多数中间群众所承认的，许多人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但对它的腐败和不民主又有不满。在国民党内，有赞成抗日的民主分子，也有暗藏的汉奸，掌握实权的主体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他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全面进攻使中国面临亡国危险，如果他们不起来抗日，势必为全国人民所不容，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本身和英美同日本之间的矛盾也促使他们起来抗日，并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们还在继续压迫人民，不愿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甚至企图在对日作战中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而不是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政府。由于国民党当权派存在这样的两面性，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虽然形成，却很难巩固和顺利发展，不可能不经历波折。

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

国民党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它们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继续它们的统治，因而实行

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日方面表现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对发展民众运动加了不少限制。

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共产党指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的最深厚的根源是在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因而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①，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两条路线，两个前途。采取全面抗战路线，必将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不能取得抗战胜利，而可能得到一个日本占领中国的前途。

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在抗战刚开始时，就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毫不含糊地作出结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② 以后事实的发展，充分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4—356页。

② 同上书，第391、394页。

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为着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七七事变前，中共中央就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七七事变后，在1937年8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消灭日军。可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实际上没有听取这些意见。不久，共产党的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再次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① 如何开展持久战？红军在这场持久战中应该担负怎样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彭德怀、周恩来等相继发表文章，根据抗战开始后的实践经验，向党内外广泛宣传持久战的方针。

但是，"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仍有着相当大的市场。在国民党营垒中，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在南京丢失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他赶快出兵。在共产党内，一些人又有轻敌思想，以为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就可使抗战速胜。党内党外都有人轻视游击战争，而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以为靠正规战就能速胜，游击战无助于取得胜利。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5月，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战争的实践已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错误的。然而，中日战争的过程究竟将怎样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6页。

利？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明确解决。为了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了《论持久战》这篇重要论文。

《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① 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这个阶段中，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速胜论者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②

《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7页。

② 同上书，第465页。

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当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还不甚明了的时候，《论持久战》在人们面前那样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一篇论文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论持久战》中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这个阶段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二是中国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并迅速壮大起来。

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也未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被动局面。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领土，中国人民遭到深重的灾难。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了长达六周的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的达三十多万人。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并规定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阻击进犯山西之敌，以打击日军的锐气并掩护友军退却；另一方面伺机深入敌人占领区，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两次向阎锡山建议，组织山西新军，扩大抗日武装。阎同意先试组建一个团，后又授权薄一波再组建五个旅。山西新军全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实际上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山西新军在党的领导下，后来发展到五十个团。这支部队密切协同八路军作战，起了很大作用。第一一五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朱德和彭德怀在23日电令林彪：第一一五师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接着，八路军三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忻口会战历时二十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太原失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根据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这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就形成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的开辟

那时在山西战场上出现了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当日军倚仗优势兵力，气势汹汹地向前猛进时，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而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

洛川会议作出的开辟敌后战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第一，由于敌强我弱，入侵的日本军队很快就占领中国大片土地。如果让日军安稳地占领这些地方，他们就可以把这些占领区作为战争基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其他地区进攻。实行敌后抗战，可以缩小敌占区，使日军在占领区不得安宁，捆住敌人的手脚。这对兵力不足的日本来说，是极其严重的威胁。第二，敌后抗战能有效地积聚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沦陷区人民在饱受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的烧杀掳掠的暴行后，国仇家恨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但他们原来是分散的，缺乏组织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常常只能进行一些自发的难以持久的反抗。所以迫切需要八路军这样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成为凝聚各种抗日力量的中心。只有经过长期的敌后抗战，人民的觉悟水平和组织程度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力量才会逐步壮大。如果没有敌后如此广泛的人民战争，是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实行并坚持敌后抗战也是可能的。日军兵力不足，在大片沦陷区中实际上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而敌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国民党政府在这些地区原有的统治机构当日军进攻时已经瓦解，一时形成无政府状态。沦陷区的广大群众是坚决要求抗日的，除少数汉奸外，各个阶级包括地主阶级在内都要求抗日，所以敌后抗战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敌后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状态成为不怕敌人严密封锁的有利条件。由于有这些条件，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人民武装进入敌后地区后，便成为抗战的火种和骨干力量，能够动员和组织强大的人民武装，创建起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深入敌人后方以后，八路军应该怎样作战，怎样打击敌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战略上实行了重大转变，就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这是弱民族反击强敌侵略战争的好

形式。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所以是无后方作战。如果不在敌后地区建立起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抗日根据地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支抗日武装，使用这支武装发动和组织民众，战胜敌人的进攻；二是要发动并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在斗争中发动民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1937年11月中旬，八路军三大主力和山西新军按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他们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组织工作团，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大批旧县长逃跑或不安于职守，薄一波等利用牺盟会的合法权力，从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出任县长。山西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绝大多数是牺盟会的县特派员。牺盟会在山西成了准政权组织。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①]。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过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于1937年10月在南京达成协议，将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军部于同年12月在湖北汉口组建，并于1938年1月6日迁到江西南昌，后又移驻皖南岩寺。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第一、二、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第四支队由长江以北鄂豫皖、豫南、鄂东北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全军共一万零三百人。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成立后，陈毅、粟裕等部相继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

---

① 初称临时行政委员会，1月下旬，先后得到阎锡山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的正式批准，去掉“临时”二字。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最初是依托山区进行的。他们经过一年多在敌后坚持抗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且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一千六百余次，毙伤俘敌五万四千余人。由于敌后要求抗日的人民踊跃参军，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先后创建了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他们在短时间内，能够在敌后迅速地打开这样的局面，是出乎许多人（包括蒋介石）意料之外的。

1938年冬，中共中央又作出重要的战略决策：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这年11月下旬，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在这些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个重要的战略性行动，大大加强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等领导的坚持在白山黑水之间长期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加活跃起来，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是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为了巩固内部，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了肃清匪患，打击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豪绅的斗争。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卫生学校等，培训了大批干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向往延安，奔赴延安，经过学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涌现出大批坚持抗战的革命骨干力量。这个总后方的巩固和建设，使中共中央能够顺利地指挥敌后战场，并指挥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他们面对着强大的日军，只有极简陋的武器装备，没有来自后方的枪支弹药的接济。他们在敌人的包围中创建抗日根据地，那里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其恶劣。例如，1937年11月聂荣臻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向晋察冀进军时，五台山已开始飞雪，部队还着单衣草鞋，在破庙中过夜。

然而，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终于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这里的关键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① 如果不是人民的军队，不能和当地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在如此艰苦的敌后环境中长期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敌军。这是抗日战争能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加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很大的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在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和封锁，很难同社会各界广泛地直接接触。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除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外，对共产党的了解比较少。一些中间分子对党还心存疑虑。如何使各方人士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建立起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先后成立了驻南京和武汉等地的办事处。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相继在汉口公开出版。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党主办的报刊，这还是第一次。共产党的声音能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直接听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37 年12 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抗战中心的武汉成立。中共代表团继续同国民党保持接触，并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气氛是较融洽的。接着，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人从原来被迫所处的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重新得以同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公开接触，同各类政治态度很不相同的抗日人士广交朋友，开诚合作。也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向他们广泛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有关团结抗日的主张，争取得到他们的了解和同情。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便是在这时经武汉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72 页。

有文化界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参加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举行“抗战宣传周”和其他各种活动，建立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及一个孩子剧团，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工作。

在长江局领导下，南方各省逐步恢复和发展在十年内战后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这一年间，在中国南部先后建立共产党省委或省工作委员会的，有河南、湖北、江苏（这三省是在1937年11月以前建立的）、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安徽、广东、云南、浙江、江西、福建十三个省；党员人数到1938年9月已发展到六万七千多人（军队中的党员未计算在内）。

总的说来，党在武汉时期进行的这些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党如何正确处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

抗战一开始时，中共中央就已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原则，最初并没有为全党所充分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内右的错误倾向便开始出现。如在群众救亡运动工作中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迁就让步；个别地区红军改编时对国民党的

反共阴谋丧失警惕[①]；过分相信国民党，因而倾向于把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一切党的活动公开化；军队中个别人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继续过艰苦生活和严格接受党的领导；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等。这种右的倾向违反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不利于保持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其实，法共的这个经验并不是成功的经验。如果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立场，看不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是处处迁就资产阶级，那样，似乎是为了保持统一战线，实际上只是使无产阶级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让统一战线的命运听凭资产阶级去摆布，最后导致失败。

王明到达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政策”。他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

---

① 1937年7月，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在红军改编时，因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武装在福建漳浦县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

1937年12月下旬，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到武汉。他在武汉工作期间，不经中共中央同意，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并在武汉大学作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虽然承认他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让步太多，但仍坚持错误，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所谓“统一武装”和“统一待遇”，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不会这样办；而如果承认“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却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利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会后，王明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顾毛泽东、张闻天等的不同意见，写了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为什么王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什么他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的错误转到抗日战争初期的右的错误？原因在于：王明始终不能正确地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国民党军事“剿共”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只知道斗争，不知道团结，不承认团结各种中间势力的必要性。到了国民党转向团结抗日时，他眼中又只有国民党，好像为了抗日，就只能一切听从国民党，唯恐得罪国民党就会造成破裂，于是只强调团结不讲斗争。这种看法使他从“左”到右，这种右的错误重复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

王明的右倾错误，还由于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并且一味追随苏联的外交政策。苏联当时在外交上只同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这就对王明这样的人起了强烈的影响。

王明在促进国共合作和开展抗日宣传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总是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所容许的范围内，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使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抗日根

据地。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由于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虽然有着王明的干扰，中共中央长江局总的说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仍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作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和地方党的工作，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注意发展华中武装力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总结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理论概括，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由于党坚决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因而把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

党的三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任弼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申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有了较多的了解。他们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也有利于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许多同志围绕总结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作了报告或发言。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这次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能在抗日战争初期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便很难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艰巨任务。

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为什么抗日战争能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是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经过十六个月的战争，日军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和富饶地区。从战役上看，日本是胜利了，但从战略上看，它并没有胜

利。日军的全面进攻，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武汉战役进行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就表示，即使攻占了武汉、广州，中国也不会屈服，日军被拖到中国内地去，对日本非常不利[①]。随着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本的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已经暴露出来，它的困难日益增加，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所谓“治安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②] 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着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在敌后形成敌我互相包围、犬牙交错的局面。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日本侵略者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就中国方面来说，经过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后退，人民抗日力量虽有发展，但仍远没有达到足以进行战略反攻的程度。为了准备战略反攻的条件，中国人民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这样，抗日战争便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从占领武汉到1944年初，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这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正在促使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欧洲大陆的上空，战云密布。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英、美为了应付德、意在欧洲挑起的战争，在东方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使日本不至于和希特勒站在一起来反对英、美，因此，也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过劝降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

---

① 〔日〕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第8卷，东京1952年版，第103页。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第一章(三)事变的扩大化及1938年的治安状况。

长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在1938年12月公开投降。后来，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经过汪精卫同南方、北方傀儡头目商谈后，于1940年凑成日本占领区内的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接连发生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

面对着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① 这个口号的提出，使全党步调一致，也帮助党外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出现的严重危机，分清大是大非。

当武汉即将沦陷时，国民党政府移往重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无论在党的建设（秘密的和公开的）、统一战线（上层的和下层的）、宣传文化和群众工作（合法的和非法的）等方面，都做出出色的成绩。主要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工农群众和团结各阶级、阶层，支援敌后抗战；对反对抗战、团结、进步的投降派和顽固派，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维护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南方局特别重视加强对中间派的工作。周恩来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物、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的知识分子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这三大口号后来改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广泛接触，共商国是，逐步取得他们的了解和信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在日本侵略军逐渐将它的主力用于进攻敌后抗日力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的重点是华北。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提出“牛刀子战术”①。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一百零九次，使用兵力总计在五十万人以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军民还一起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利用道沟，在广阔的平原上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部队同群众结合，分散到各地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地进行伏击歼灭战，取胜后迅速转移，再寻战机，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〇师的配合下，进行伏击，歼灭日伪军九百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山西新军在战斗中发展到五万人。

为了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1939年2月到皖南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此后，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有较大的发展。1940年5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一部一万二千人南下，同新四军一起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1940年11月，为了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由陈毅代总指挥。

在华南，1938年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也开展抗日游击战，后来发展为琼崖纵队。

---

① 日军的“牛刀子战术”，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小”，但需要用很大力量来进攻。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在广大地区内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五万多人发展到五十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十六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一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不仅需要根据地的扩大，更重要的还在于根据地的巩固。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首先是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选出边区政府委员，由林伯渠为主席。这个《施政纲领》是十分重要的文件，事实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的基本政策。

此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指示，阐明党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政策：（一）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二）实行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容纳多方，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三）共产党在政府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政策的正确、党员的模范作用和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四）在政权工作中，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党员必须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倾听他们的意见，遇事共同商量，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五）政权的施政方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8月公布《施政纲领》，并于同年秋在全边区进行普选。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建立“三三制”政权。基层政权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基层政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敌后抗战，主要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抗日战争的主体，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已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发动农民群众并适当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同时也适当地保证佃权。执行这个政策，虽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仍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政策。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经过减租减息，农民不仅得到了经济实惠，而且增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在提高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工业生产和各项经济事业也有了发展。

抗日根据地还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中共中央提出要尽力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根据地政府组织知识分子发展国民教育，克服物资匮乏、人民贫困、敌人不断干扰的困难，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和开展社会教育，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同时，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创办一些干部学校，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培养大量骨干力量。中共中央还很重视在根据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1940年2月，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8月，创办自然科学院，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阵地。

通过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使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人民军队，这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根据地建设，党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对以后建设新中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东北，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抗日联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到1939年5月分别编成第一、二、三路军。1940年，日军再次向东北增兵，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险恶。2月23日，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濛江县境内壮烈殉国。同年冬起，抗日联军相继转移到中苏边境整训，并继续给日、伪军以打击。

1939、1940年间，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发动了一些规模较小的进攻战役如南昌战役、随枣（湖北的随县、枣阳）战役、第一次长沙战役、桂南（广西南部）战役、枣宜（湖北的枣阳、宜昌）战役等。国民党军节节抵抗，日军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这期间，在正面战场上只是在日本侵略军发动局部进攻时，才发生比较激烈的战役。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进行了英勇的作战，但这些战役只是起了牵制一部分日军的作用，一般都以日军停止进攻而结束。

百团大战

在敌后战场上，随着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一百多个团，约二十余万人，被称为百团大战。

为什么八路军总部要发动这次进攻战？主要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①。1939年9月，希特勒出兵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德国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侵略者。他们一方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逼降和诱降：在1940年5、6月间发动襄宜（湖北的襄阳、宜昌）战役，占领宜昌，控制入川门户；接着又封锁滇（云南）越（越南）国际交通线；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政府代表于1940年3月和6月先后在香港和澳门秘密进行两次关于停战条件的谈判（日方称它为“桐工作”计划）。另一方面，日本侵略军在1940年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推行“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把抗日根据地分成若干小块，构成对根据地的网状包围圈，然后分别进行“扫荡”、“蚕食”和“清乡”。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认为，为着坚决反对投降，振奋抗战军民，锻炼自身的力量，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是“非常必要的”②。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是交通破袭战。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同时向日、伪军发起攻击，破坏正太、同蒲、平汉、石德、平绥、北

---

① 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第412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宁、津浦、白晋等铁路交通线，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一度攻占了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日、伪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顾此失彼，损失严重。9月20日，延安各界召开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并致电八路军，鼓励他们“再接再厉，继续奋战”。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日、伪军，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并发动榆社、辽县、涞源和灵丘等地区的攻城战斗。由于日军已有准备，八路军在连续作战中过于疲劳，牺牲较大，除榆社一度攻占外，都未攻克，没有达到预期的拔除据点的目的。从10月上旬起，日军调集华北境内所有能够调遣的兵力二万余人加上大批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根据地军民展开英勇的反“扫荡”作战。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指战员英勇杀敌，到12月初，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多人、伪军一万八千人，缴获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共产党坚持长期敌后抗战和进行百团大战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谬论。

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不仅坚持了下来，并且吸引大量的日、伪军队在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上的军民进行了无数次规模较小的战斗，但也能在适当时机进行百团大战这样规模的战斗。百团大战中，蒋介石于1940年9月11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可见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正式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战绩。

五、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

系的。

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一直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他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磨擦事件①，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战场吸引了众多的日本兵力，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受到的压力减轻，是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的重要因素。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共产党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使它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记取了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教训，又接受了十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教训，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行这个政策，使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胜利地驾驭整个局势的发展。

---

① 1938年秋，国民党陆续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或游击武装返回敌后，主要是为了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磨擦，连续制造了陕西旬邑事件、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和河南确山惨案等。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1月，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边区五座县城，并阴谋进攻延安，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回击。在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动用他在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的全部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和八路军。蒋介石在中条山的几个军也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奋起抵抗，打退了阎锡山和蒋介石的进攻；1940年1月整个晋西北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2、3月间，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的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受着日本和国民党夹击的八路军，坚决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压住他们的反动气焰后，中共中央立刻派朱德、萧劲光、王若飞分别到洛阳和宜川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

在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还迎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在这期间，国民党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肆贩卖反共理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反动文人叶青说什么“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在国民党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广大人民十分忧虑，许多人尖锐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幻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在严重的斗争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39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毛泽东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做了系统的回答，明确地阐述共产党的观点。

（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特殊条件下还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并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纲领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才可能去进行后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从社会制度来说，必须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但是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不能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否则，就不能保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过去，党内常常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托陈取消派又认为既然还处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共产国际提出过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但含义并不很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就把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理论只有在党经历了近二十年艰难曲折的斗争后，特别是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的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有抗日战争的几年经验后，才可能提出来。

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国内政治情况，明确地指出：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共产党的任务仍应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期内，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创造性地确定了几条重要的策略原则：(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这三件事互相联系、而发展进步势力是中心一环，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立脚点。中间势力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势力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争取中间势力是统一战线工作中极严重的任务。(二)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应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就能使这种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赞助，“有利、有节”就是要使这种斗争取得成效，分寸适度，不要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达到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目的。(三)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四)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会再犯1927 年的错误。这些重要的策略原则，不仅对当时的工作而且对此后长期的革命斗争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使党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够更加成熟而恰当地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不断取得成功。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并没有收起反共活动。1940年9月，德、意、日正式结成三国同盟。英、美也加紧拉拢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反共活动更加活跃起来，而把反共武装进攻的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故意制造磨擦，调动主力向位于苏北的南端的新四军重要基地黄桥进逼，企图将在苏北的新四军歼灭于黄桥附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出于自卫，在10月4日至6日反击韩部的进攻，消灭韩军一万一千人。这次战役是新四军在遭受无理进攻时被迫进行的。

黄桥战役后，蒋介石集团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他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布置陷阱，消灭异己。17日，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它的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很大的弱点：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军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造成的严重损失。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外一些人感到，形势又将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扩大。的确，蒋介石国民党一手造

成的皖南事变近似于四一二政变，但这时有一个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全国上下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也不同于1927年，更重要的是，这时共产党已有了能够总结历史经验的成熟的领导，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形势，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8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①]。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亲笔题词，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世界各方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②]。

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坚持敌后抗战的事实，是许多人都承认的。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失去了全国的人心。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

① 先后提出两个"十二条"解决办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75、780页。

② 《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员会，反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①。黄炎培说，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全国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中间派的同情大多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要求中国继续抗战。1941 年2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路过香港时对宋庆龄说，他将警告蒋介石，如继续同中共军队对立、玩弄手腕是不成的。居里到重庆后，会见周恩来并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意料之外。共产党态度之坚决和国内外反应之强烈，是他们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在极端孤立的狼狈处境下，他们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 年3 月6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并没有达到摧毁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教育了许多原来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们，使蒋介石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在这年5 月8 日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荫蔽精干，要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2 年1 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提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在这些正确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依然荫蔽精干地保存下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共产党连续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的事实，表现出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正像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由此，使更多的人看清中国共产党确实

---

① 《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 年版，第65 页。

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私利的，使国民党完全输了理。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使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这就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放下抗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为提高，更证明它是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

六、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1940年的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本中国派遣军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并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陆相东条英机宣称：日军要消灭一切华北不屈服的人，要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是，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大量屠杀中国军民的惨剧。如1月下旬，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一千三百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苏联人民开始进行英勇的卫国战争。在这以前，苏联同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中立条约”。签订这个条约，苏联是为了应付欧洲的紧张局势，避免两线作战；日本是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10月，日本东条英机组阁，加快了扩大侵略战争的步伐。1941年12月8日凌晨（东京时间），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和美英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空前地扩大了，先后卷入战争的有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宣言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将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日军的“扫荡”，牵制大量敌人。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四国为首的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二十六个国家，在华

盛顿签署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这是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利条件。

这时，中国仍然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1941 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二百四十余万人（海军三十万人，陆军二百一十余万人）。日本陆军用于南进的约四十万人，留驻本土的约四十万人，其余一百三十万人（包括关东军）都压在中国战场上。如果这些占日本总兵力一半以上的陆军主力部队移用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战场上，势必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把日军主力陷在中国战场上，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

敌后的反“扫荡”斗争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占领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 年至1942 年，在“扫荡”华北的根据地时，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一百三十二次，万人以上至七万人的达二十七次。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

日军对华中敌后军民也发动大规模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日军总兵力仍有二十九万人。日、伪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周围设立封锁线，以求巩固其占领区，确保对主要交通线的占领和掠夺战略物资。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空前残酷的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重大，部队减员较多。到1942 年，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人减为约四十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一亿人减少到五千万人以下。敌后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日军又大肆抢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以破坏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来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对日军在晋南中条山、湖南长沙和浙赣等地的进攻也进行了抵抗，并组织中国远征军进军缅甸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作战。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可以依靠英美力量来进行抗日战争，因

而继续加紧反共磨擦。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遇到了严重困难，但是困难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人民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强调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这种革命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和统一的精神。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延安精神。

日军总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战经验，认为："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采取"多元的、综合的措施"①。他们以"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式，又实行"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多种形式的进攻。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五次推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分别采取不同政策。在占领区，普遍建立汉奸组织，强化保甲制度，筑寨并村，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实行"十户连坐法"（一户抗日，十户皆杀），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反日运动；统制钢、铁和锌等战略物资，垄断、吞并工商业，勒令种植鸦片，大量掠夺粮食，推行口粮配给制度；组编"勤劳奉公队"，大肆压榨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对抗日根据地，则不断进行"蚕食"，并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

针对日军对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这就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实行统一领导，协同

---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第四章（二）1941年初期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四）1941年夏季的各项重要施策。

各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①] 的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的三结合的武装体制。主力兵团是骨干，地方兵团和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施行主力兵团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和便于发展时，地方兵团、民兵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合起来，配合主力兵团或转化为主力兵团去完成较大的作战和发展任务。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坚决打击“清剿”之敌，挫败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在华中敌后，斗争的紧张场面和华北达到同等程度。1942 年春到 1943 年末，新四军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实行武装斗争同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办法。主力兵团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坚持和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对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它安全回到原地。日、伪军集中在某一地区“清乡”时，各友邻区同时出击，使日、伪军顾此失彼。由于这些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打破了日、伪的“清乡”计划，根据地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山区地势复杂，道路崎岖，人民自卫武装(民兵)熟悉当地情况。当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他们像麻雀一样满天飞翔，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而日、伪军则因人地生疏，只能在大道上盘旋挨打，对他们无可奈何。

在平原，则展开地道战和破袭战。华北平原地区军民首先在道路上挖沟，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行进，而根据地军民的转移却有了掩护。随着环境的恶化，敌后军民在一家一户所挖的土洞、地窖的基础上，建成户户相通的地道。后来，地道由村内相通，发展成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

---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 年 9 月 1 日。

的巨大地道网，日军用烟熏水灌，或施放毒气，都无济于事。军民依托地道，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无论山区和平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群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利用废铁、废瓶和石头、瓦罐，制成各式各样的铁雷、磁雷、石雷、瓦雷，埋在村口、路口、门庭院落，使日、伪军进村入户就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敌后军民还一直把地雷埋到敌人的碉堡下，常常把出发的日、伪军炸得血肉横飞，使他们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华中水网地带进行。千万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等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敌后军民的小木船则可以在广阔水域里出没自如，寻找机会狠狠打击日、伪军。

武装工作队是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而创造出来的。1942 年春季，在华北反“扫荡”作战中首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就是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时，根据地军民也以一部分力量深入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锄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或引导他们在适当范围内为人民做些工作。这部分人民武装力量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助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日、伪军好像被打瞎和打聋的野兽一样，虽然疯狂地乱扑，终究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 年至1942 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四万二千余次，毙伤俘日、伪军三十三万一千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很大支持。

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广大军民英勇顽强，作出了巨大的奉献，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例如，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本斋的母亲不忍群众被打杀，自己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1941年9月25日，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面对日、伪军的进攻，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连续打退日军四次冲锋。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时，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坠落崖底，壮烈牺牲，二人被挂在树枝上，后来脱险。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当时驻辽县）遭到敌人合围的危急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殉国。这样的民族英雄成千成万。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对侵略的革命精神，是反“扫荡”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抗日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克服经济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这些艰难的年代，中共中央还采取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

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又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

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

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军队的生产自给，形式上违背分工的原则，似乎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却是进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军队克服生活资料匮乏的困难，得以改善生活，同时可以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足以支持长期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1941 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在朱德进行实地考察后，从 3 月起，王震率第三五九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开垦荒地。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2 年到1944 年的3 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二百多万亩。到1945 年，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①，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到 1944 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 年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 年降为11.14%，1943 年降至不足9%。从1943 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敌后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一批经济工作干部。

七、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1943 年至1945 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发展得很快。在

① “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

欧洲战场，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转入全面反攻，把战争推进到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美国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中英军组织缅北战役，取得攻占密支那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度过1941年至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后，进入再发展时期。1943年，华北敌后军民在有利条件下，发起对日军的进攻性战役。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各根据地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并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有十九块，总面积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上升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

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得到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仍基本上采取避战、观战政策。他们一方面希望依靠英、美、苏的力量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另一方面仍企图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以便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借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以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发动政治上的有力反击。《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义正词严地批判《中国之命运》一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1943年7月4日和6日，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抗议胡宗南部的挑衅，呼吁团结。9日，延安群众三万人举行紧急集会，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10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途经西安时，胡宗南为了掩饰自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周恩来在酒会上公开宣布：已当面询问胡宗南是否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

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①] 这就把胡宗南部即将进攻陕甘宁的阴谋公之于众。接着，毛泽东于12日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的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这样，终于使国民党这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

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了，但它并没有放弃一党专政，继续在独裁统治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中国战区（作战区域包括越南和泰国等）陆空军最高统帅由蒋介石担任。接着，美国派遣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华后，比较客观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赞同国共合作抗日。可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战后的问题。为了在战后推行争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实现取代日本控制中国的目的，它在对华政策上实行了新的步骤。1943年1月，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暨换文》，以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提高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美国在前一时期所采取的赞同国共合作的政策逐渐转变为扶蒋反共政策。1944年秋，美国政府撤回史迪威，由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分来中国，并任驻华大使。赫尔利来华的任务是防止国民党政府崩溃，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在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后，国民党有恃无恐，它的统治更加腐败和倒退，并陷入严重的危机。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坚持一党专政，加强特务组织和保甲制度。国民党特务不经任何法律手续，秘密逮捕大批共产党人、革命青年、爱国民主人士，施以酷刑或任意杀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权利被剥夺，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美国《星期晚报》豪塞尔评论说：“蒋氏大权独揽，其地位与昔日之帝王相同。彼所领导之国民党，现为主张由国家统治个人思想之陈氏兄弟所把持，此种主张如称之为法西斯主义，未必完全不符。”

---

① 转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通过独占金融业、掠夺土地、垄断商业、吞并工矿业、控制交通运输、增加苛捐杂税等途径，猛烈扩张买办、封建性的官僚资本，大发国难财。1944 年宋子文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四千七百万美元。官僚资本的膨胀，大大加剧了国民党统治区内经济崩溃、物价上涨、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局面。

在军事方面，问题暴露得尤为突出。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丧失战斗力。从1944 年4 月起，日本为了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日军称这次进攻为“一号作战”。在这一线上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外，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战场出现大溃败的局面。1944 年4、5 月间，向河南进攻的日军占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 月到8 月间占领长沙、衡阳，随即向广西进攻，于11 月间占领桂林、南宁，追击部队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重庆为之震动。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从缅甸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中调兵增援，于12 月初收复独山，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已经实现。国民党当局在八个月中，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部分地区，总计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百四十六座城市，使六千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给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

当国民党战场出现大溃败时，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主力四千余人在10 月31 日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向被日军侵占的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场大溃败，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他们名誉扫地。正面战场的这种完全不应有的溃败，同敌后战场的形势形成强烈的对比。人民不能不从事实得出结论，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担负起争取抗战胜利的任务，不能维护中国的独立，推动经济的发展，只能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掀起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

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战斗。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反共，也大肆迫害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豪门资本而被捕入狱。国民党当局宣布取消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史良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中间阶级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认识，表示支持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政策不但没有使广大中间力量同共产党拉大距离，反而更靠近了。中共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和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如1941年3月19日以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多方刁难，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只得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在同年9月18日创办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10月10日，该报公开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制、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政治主张。这种患难与共的经历，使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更加强了。

1944年上半年，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争取民主的斗争空前活跃。这年1、2月间，黄炎培在重庆召开民主宪政问题座谈会，提出要求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十项主张，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响应。中共中央决定参加宪政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在宪政运动中，团结一切民主分子，达到战胜日本侵略、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同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谴责国民党坚持排除异己、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的行为。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吸收许多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这个组织。文艺界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文化界的张申府、曹禺等五十人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国民党内开明人士柳亚子、李济深等在广西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发出“动员民众，坚决抗战，铲除失败主义”的号召。

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为了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当局重开谈判。从1944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先后在西

安、重庆举行多次会谈。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当局承认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权利，扩编中共领导的军队，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给民主党派以公开合法的地位。由于国民党的无理阻挠，谈判毫无结果。国民党军队的大溃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激起了广大人民更大的愤慨。

从豫、湘两省开始的大溃退，使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作战无能充分地暴露出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已成为人们（包括许多中间派人士）的普遍要求。这种状况在以前还不曾有过。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林伯渠指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① 这个讲话的全文在《新华日报》上刊出。随后，中国共产党又以书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时日军正继续从湖南向广西进攻，如何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以阻止敌人进攻，已成为万众瞩目的极端急迫的问题。1944年9、10月间，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日益发展。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五百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董必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七十二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邹韬奋因受国民党迫害，在流亡生活中于7月24日病逝，根据他生前要求，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数千人，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提出要向法西斯统治展开斗争。四川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等五所大学及十二个学会二千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同盟也在10月10日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

① 《新华日报》1944年9月17日。

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出现了进步力量进一步团结、中间派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趋向进步的新局面。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

中国共产党还坚决而灵活地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了斗争。赫尔利来华初期，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并让赫尔利居中调处国共关系。因为美国政府开始感到，“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①，共产党还领导着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军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如果在打败日本前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国民党就有垮台的危险。因此美国希望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而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他们认为，只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战后就可以稳稳地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同时，还可以避免因中国问题而引起苏美之间的对抗。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经过三天谈判，赫尔利和中共领导人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协定”，赫尔利也背弃了他在延安赞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后，在国共两党多次接触和谈判中，赫尔利对中共表示的态度是：你先交出军队给我，我就给你民主。当他们的政治欺骗被戳穿后，赫尔利在1945年4月2日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逐步公开化，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气焰，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

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威胁和欺骗，当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的解放事业的前进，但已经预示，这个事业在抗战胜利时和抗战胜利以后还将经过严重曲折的斗争道路。

八、整风运动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

①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三章（一）《赫尔利使华的直接背景》。

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

为什么党要进行这样一场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现实需要，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一种错误如果没有被真正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另外的条件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出现。所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这种需要，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需要进行这样一次全党的整风。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起了积极作用。1941 年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尖锐地批评那种“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的作风”，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同年9 月10 日至10 月22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全党整风的条件就渐次成熟了。

整风学习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是从1942 年2 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

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两篇讲演开始的。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学习共分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五个阶段。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

这次整风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党内反复出现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都表现为理论同实际相脱离，主观同客观不相符合。犯这些错误的领导干部，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或从主观愿望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其结果给党带来严重危害，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但人们长期以来并没有认清错误的思想根源，所以错误连续不断地发生。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定而又灵活地按照客观实际办事，制订并实行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革命事业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事实的鲜明对照说明，能不能在指导思想上坚决地反对并纠正主观主义，对党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他又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不清除党八股，不能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不能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主观主义就还有藏身之地。所以，要彻底反对主观主义，不能不同时反对党八股。

反对宗派主义，是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任务。

要实现党的统一，单有思想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以组织上的统一来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在党的历史上，当主观主义思想

占统治地位时，在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对那些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进行打击。遵义会议以后，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残余依然存在，对党内外都有所表现。

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有种种表现形式，如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不团结等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首先尖锐地批评了“闹独立性”的问题，因为它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毛泽东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又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他进一步指出：“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这种人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① 毛泽东要求：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包括一部分党员在处于领导地位时对党外人士的不尊重，也包括“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关门主义残余。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共产党应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一部分人谋利益。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特别要注意照顾到中间阶级的利益。他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他还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822页。

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被列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对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起了重大作用。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反的。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

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会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分别召开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 、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座谈会等，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朱德说：“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① 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

① 《纪念党的二十周年》，《解放日报》1942年7月1日。

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表明，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样，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决议》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在整风运动后期，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许多同志在会上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检讨王明的错误，要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全党要团结”，“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①。当时王明称病没有参加会议。党对王明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也曾去探望并同他促膝谈心。经过工作，王明当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写信给党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七大上，经过毛泽东做工作，仍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

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定》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这是在整风运动中不应该发生的错误。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所花的力气又不多，所以在开展肃反工作中，未能准确地认识敌情，实事求是地从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由于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这个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不能因此否定整风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

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党内外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

① 1943年9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三十年代前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九、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两种命运和前途：一种是光明的命运，即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一种是黑暗的命运，即蒋介石集团坚持的，在日本失败后仍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继续反共反人民，保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和分裂贫穷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努力争取实现光明的命运。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这次大会上距1928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十七年，它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七大举行时，共产国际解散已两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有利于彻底破除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七大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在二十四年中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

中国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

七大指出，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下，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应该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七大再次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作了详尽的说明。鉴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七大要求全党在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时，还必须有另外一方面的准备，即警惕内战，准备应付内战。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人民就用革命的战争，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第二，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系统地阐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七大充分发扬民主，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对过去党内的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批评，犯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

七大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是，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并不能决定党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使全党

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七大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党内生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的严格的集中制与广泛的民主制结合起来，把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和全党在斗争中行动一致。

第三，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

七大选举产生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三)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选出来。根据这些原则，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一个由各个地方、各个岗位、各种经历的优秀人物汇集的、有威信的空前团结的领导机构。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七大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奋斗。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八路军、新四军完成了1945年对日军的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苏军对日作战，沉重地打击了盘踞在

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缩短了对日战争的时间。中国抗日战争随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这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日军大本营在下达“停止战斗行为”的命令同时，又命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以采取战斗行为”。由于日军宣布投降又不放下武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反攻作战仍继续进行。8月11日起的全面反攻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共解放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座。

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据统计，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二千一百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一千亿美元（其中财产损失约六百亿美元）。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洗雪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国各族人民因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在精神上受到极大鼓舞，提高了民族自信心。

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所以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主要是陆军的大部分兵力），这对于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起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大量侵华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其中日军五十二万七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六十九万四千余支，各种炮一千八百余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作出极大牺牲，指战员伤亡六十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牺牲巨大，伤亡达六百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七十一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一百二十余万人。敌后军民以高度的献身精神坚持奋斗，消灭日军大量有生力量，逐渐转变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实现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抗日战争也引起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大变化。这次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继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党把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坚持为维护全国团结抗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大多数中国人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并给予大力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通过抗日战争，明显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同党建立起友谊。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虽然只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认真贯彻而被国民党所拒绝，但它已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国抗战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的作用。抗战结束时，在全国人民中，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已经大大增加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期间达到了成熟。中国共产党到这时已能比较完全地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律，已能纯熟而恰当地处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

1927年和1934年两次的失败的教训。两次失败都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幼稚，还有弱点，也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起过积极作用，但共产国际的许多原则指示，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因而是错误的。实践证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中国人自己才能真正认识，不是别人所能认识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种种旧的、不适当的公式，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不依赖别的国家或国际指导中心的发号施令，因而能够独立地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善于运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基本武器，保证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历史证明：即使在客观历史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党去正确地掌握这个机遇，还是不可能实现预定的革命目标的。由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于中国的实际，从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　五　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一、战后政治形势与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严酷的战争岁月中，人民学到了平时多少年都难以学到的许多新东西，觉悟程度和团结程度得到很大提高。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共产党由于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有很大增强，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战初期大不相同了。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独裁统治，在战争的中后期尽力观战避战，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结果，使他们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深刻的裂痕。随着抗战胜利的行将到来，他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这方面来。1945 年5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

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① 抗战一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立刻打算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这当然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

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依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外扩张，企图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控制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所说，他们当时在中国所追求的长远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而短期目标首先是“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②。

总之，抗日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是：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企图垄断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但由于它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由于它的庞大的军队远没有全力地有效地进行抗战，这个企图不可能实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经过艰苦的斗争，得到一部分抗战胜利果实，但还不可能使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成为人民的胜利。共产党和国民党已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如果深入一层地观察，一方正蒸蒸日上，一方已危机四伏，这是两党自身在八年抗战中的所作所为造成的结果。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将如何发展？

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因为这是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后的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和平的要求，在和平的条件下同各方面合作进行建设和改革，那么，即便前进的道路会因此更加迂回曲折，斗争会更加复杂，这样做仍然有利于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力争的。

蒋介石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他看不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弱点，以为依仗他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就可以为所欲为。日本刚作了投降的表示，蒋介石政府的最高统帅部便在8月11日一面命令国民党

---

①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②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48年第8卷，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74年版，第45页。

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却唯独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命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蒋介石的下一步打算,便是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这时已不像1927 年那样,于横逆之来,无还手之力。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建国,当然不能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任凭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去。8 月13 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评论说:“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蒋介石对立刻发动全面内战还有顾忌。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才取得胜利,全国人民普遍期待能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动内战是极端不得人心的。国际上,英、美、苏三国当时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蒋介石的精锐军队在抗战期间又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华北和华东一时有不少困难,至于东北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明确警告,也使他不敢过于轻举妄动。他还需要有一段准备的时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他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毛泽东不来,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它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在当时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第一,由于和

平、民主、团结是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只要有可能，党就应当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由于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党和全国人民是有可能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这对于需要作应变准备的革命力量来说，也是有利的。第三，通过和平谈判，可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反动派究竟是真要和平民主，还是在这个幌子下实行独裁内战，这对于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有很大作用。在努力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局面的同时，党没有丧失警惕，没有放弃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

8月25日晚，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通知》接着指出："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

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这个《通知》，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态度和主张系统地阐述明白了。

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毛泽东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张治中也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重庆谈判的成就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蒋介石对待这次谈判的方针，在他的日记中说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而“政令军令之统一”则是一切问题之“中心”[①]。其实，蒋介石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过什么“极度之宽容”，无非仍是想作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有一点倒是确实的：他真正注意的“中心”，在于所谓“统一政令军令”，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他是决不会有任何“迁就”的。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基本态度，中共中央事先是估计到的。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许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中央准备在谈判中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作出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的

① 蒋介石 1945 年 8 月 28 日、29 日的日记。

让步。

这次谈判前后历时四十三天。1945年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经过谈判，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

谈判中，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

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中共代表主动提出，让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内的根据地，并将这些地区内的人民军队调往北方；同时还表示，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可将自己领导的一百二十万军队缩编为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使它占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这样重大的让步，由于国民党当局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还是未能达成协议，只得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纪要》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①] 经过谈判，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国民党在谈判中发动军事进攻

国民党当局虽然同共产党谈判和平，但它的主要打算仍是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

① 毛泽东194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然后利用中苏条约中对它有利的条款① 出兵占领整个东北。自日本投降至当年10月17日两个月间，有三十座解放区城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而对国民党当局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党坚定地认为，“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实现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一万人的军队和二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为了深入华北、打开进军东北的通道，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一路沿平绥路东犯，一路沿津浦路北犯，一路沿同蒲、正太和平汉路向北平推进。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进行反击。重庆谈判期间，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人民军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三万五千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

---

①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并就外蒙古问题等进行换文。条约和有关协定的若干内容有损中国之主权。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声明苏联给予中国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并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双十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10月中、下旬，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又连续进行平绥、津浦、平汉（邯郸）三个战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十一万人，迟滞了他们深入华北、进兵东北的行动。在邯郸战役中，还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战场上率部万人起义。这件事说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发动内战是何等不得人心，甚至在它的高级军官中也发生了分化。这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指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并对国民党进犯军进行必要的自卫作战，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二百三十九万一千平方公里面积，一亿四千九百万人口，五百零六座城市。

但是，国民党并没有从军事进攻的失利中汲取教训，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而且继续将大批军队调往内战前线。至1945年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已有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二十万人，伪军三十五万人，甚至还有日军三十五万人，总兵力达一百九十万人以上。这不能不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

11月19日在重庆，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1月25日，昆明六千余名大中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由抗战开始后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由于遭到反动军警的压迫和特务分子的捣乱，昆明三万余名学生举行总罢课。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了这场斗争。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暴徒冲进西南联大等校，并投掷手榴弹，致使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昆明学生在教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坚持斗争，重庆、上海等地也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罢课或游行示威等。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基本口号的一二一运动，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1945年9月，重庆科技文教界一批知识分子将原有的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固定性的政治组织九三座谈会，这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同年12月，民主建国会和民主促进会分别在重庆和上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等活动更加活跃。他们都要求实现民主，主张停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内爱国民主运动的力量日益扩大。

国民党政府派遣大批官员到他们所能到的原沦陷区，特别是城市，恢复在那里的统治。那里的人民刚摆脱亡国奴的命运，对国民党回来本抱着欢迎态度。但许多国民党的官员贪婪地掠取财物，接收成为“劫收”。物价高涨，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官僚资本在接收的名义下大大膨胀，民族工业的前途却陷入绝望。国民党在人民中的信誉一落千丈。

这时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因公开表明只同蒋介石合作而声名狼藉的驻华大使赫尔利，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赴华“调停”内战。12月15日，马歇尔启程来华。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声称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又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之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上述自治性军队及中国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合成一中国国民军。”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① 马歇尔来华的使命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借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存在；与此同时，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往东北，并作好将国民党军队运往华北的准备。其目的是贯彻“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这个既定方针。

政治协商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为了给协商创造条件，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多次呼吁和多方奔走，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样，战争的确在全国范围内（除东北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0日。

外)停止了一个时期,使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一时燃起了新的希望:内战有可能制止。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共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

会议历时二十二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

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政协协议还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进行整编,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

政协协议的种种规定,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它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这使他们尤其感到振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这些协议的。毛泽东主席在颁布停战令时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政协会议闭幕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引者注）这些决议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真心诚意地准备在保持抗战期间人民既得的根本权利的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政治改革，按照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使中国逐步进步繁荣。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蒋介石接受协议是被迫的，英美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还有许多阴谋，“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一点。他承认：国民党“愈来愈流露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他们将丧失一切”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

政协会议还在进行时，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国民党特务就在会场上起哄以至动手打人，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大哭大闹，说政协决定不利于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②。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捣毁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会

① 〔美〕迪安·艾奇逊：《我在国务院的年代》，美国纽约诺顿公司1969年版，第205页。

②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页。

场。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他的党徒对政协协议“就其牵牵大端，妥筹补救”。他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终于成为一纸空文。

三、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尽管有了政协协议，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意图仍然是通过战争来削弱直至消灭人民革命力量。1946年上半年，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处在密云不雨的状态中。表面上，1月间签订的停战协定仍在继续执行。为实行停战协定而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不断派人到各冲突地区调处。尽管国民党军队仍不停地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除东北外一时没有发生。其实，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沉寂。蒋介石正利用这段时间加紧部署全面内战，中国大地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厚了。

国民党加紧部署全面内战

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协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同美国政府对他的支持和援助有着直接关系。

为了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首先要把他的精锐部队迅速抢运到华东和华北，控制全国最富饶的沪、宁、平、津各大城市。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以军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八个交通警察总队约五十四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美国还出动海军陆战队九万多人，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直到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国民党军队在短时间内接受了一百多万日本军队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还收编了大量伪军，实力进一步膨胀。

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城市后，国民党军队就把它的进攻重点指向东北。抗战胜利前，东北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只曾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击破日、伪军的抵抗，迅速收复山海关、锦州、承德等地。其他部队也陆续进入东北，收复了除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外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军队控制平津等地后，随即向东北发动进攻。11月间，先后攻占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驻守的山

海关和锦州等地。1946年1月签订停战协定时，国民党政府以“尚未接收主权”为名把东北排除在外。2月间，美国第七舰队用运输舰将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五个军运抵秦皇岛，转赴东北。这样，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猛增至二十八万五千人。3月初，苏军按照协议开始从东北的城市和铁路线撤退。国民党军队立刻进驻沈阳，向解放区分路进攻。4月18日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四平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顽强的保卫战，在歼敌一万多人后撤离。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侵占长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5月初，因为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上海，继续进行艰苦的谈判活动，力争在最后时刻避免全面内战的发生。但由于蒋介石的决心实际上已经下定，谈判无法取得有效的成果。

这时，美国也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1946年3月，先后组成美国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6月17日，签订《中美处置租借物资协定》，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给国民党政府。美国官方曾经承认：“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① 这样，事实就把美国政府伪善的调停面目撕破了。

美蒋的这些活动，引起广大人民（包括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严重不安。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准备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请愿团成员中，包括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宗教界等社会知名人士。6月23日，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各界群众十万多人到火车站欢送。当晚，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国民党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五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多人受重伤。周恩来赶到医院去慰问，身负重伤的马叙伦握着他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事态的发展表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尽管中国共产党作出种种争取和平的努力，全面内战的爆发仍难避免。这迫使党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政协协议的同时，不得不进一步作出自卫战争的准备。4月16日，周

①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7月30日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

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5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加以制止”。在这之前,5月4日,中共中央即发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便进一步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进行自卫战争奠定更牢固的群众基础。

全国内战爆发的前夕,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随后,中共中央又在给各部队首长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是在自身生存遭到严重威胁时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而在被迫进行自卫战争时,仍准备作出让步以求避免战争。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战完全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手挑起的,它应对这场战争承担全部责任。

全面内战的爆发

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立刻翻过脸来,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二十二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是全面进攻的起点。在敌军重兵围困下,中原军区主力由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于1946年6月26日晚间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就是爱国救亡运动中的著名活动家。接着在同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诗人、文学家闻一多又被用同样的手段暗杀,他是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愤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显然,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不仅对着共产党,而且对着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善良人士。

国民党政府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对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十分乐观,以为可以速战速决。他们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为一百九十三个旅(师)、一百六十万人,占国民党全部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军)二百四十八个旅

(师)约二百万人的80%。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略企图是:沿主要铁路干线,由南向北进攻,夺取并控制解放区城市和交通线,歼灭人民军队主力,或将它压迫到黄河以北,而后聚歼于华北地区。蒋介石声称,他倚仗国民党的军事优势,"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对人民革命力量来说,战争初期的形势确实相当严峻。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对比,国民党显然占着优势。当时,人民军队的总兵力为一百二十七万人,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仅有少数火炮;解放区的人口仅一亿三千六百万,面积约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内部的封建势力尚未肃清,后方还不很巩固;而且解放区是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的,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

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国民党敢于发动全面内战,很重要的因素是依恃美国政府的支持,而当时的美国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垄断着原子弹生产的秘密。中国的反动派以它的后台的强大来吓唬人。在战争初期,一些中间派人士被反动派的表面强大所迷惑,产生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有的人甚至主张解放区军民在国民党进攻面前应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国际上,当时美国正在加紧进行"冷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声浪一时甚嚣尘上。苏联领导人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们认为,中国如果打内战,美苏可能卷入,中国将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据此,他们主张中共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采取坚定的立场。全面内战爆发后,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被迫进行自卫作战,并且认定: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

中国的内战会不会引发世界战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46年4月就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美英法和苏联之间,或早或迟要实行妥协。"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

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同年8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明确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使全党、全军和人民极大地增强了打败中国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

怎样才能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又一个问题。

中共中央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①] 人民军队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要打赢这样的大仗，要战胜蒋介石的进攻，只有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为此，在农村中，要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并区别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进一步巩固各解放区，使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党的政治方针。

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将抗日时期以分散兵力打游击为主的作战方法改为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其中，前八个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四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依恃他们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各解放区，企图一举消灭人民军队。中共中央一直有着两手的准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87页。

备，一面力争实现和平，一面也作好随时对付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的准备。当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各解放区人民军队沉着应战，集中优势兵力，力争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中原突围后不久，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队六个旅和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共五万余人。在淮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也都传来捷报。这些胜利，顿挫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锋芒，取得了主要在内线歼敌的初步经验。在战争的头四个月，即从1946年6月下旬至10月，虽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的城市一百五十三座，人民军队也收复了城市四十八座，并歼敌二十九万八千人。10月以后，国民党军队能用于一线作战的攻击兵力逐渐减少，士气日益低沉，军事进攻的势头开始降落。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人民军队逐步扩大歼灭战的规模，又经过四个月的作战，被歼灭的国民党军队共四十一万人；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八十七座，人民军队则收复和解放城市八十七座。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一步受挫。由于有生力量大量被歼灭，占领人民军队弃守的地方又需要分兵守备，国民党军队战线延长同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军队终于丧失全面进攻的能力，它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随之宣告破产。

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步骤使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本来，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等仍然留在南京、上海，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国民党当局不仅发动了全面内战，并且把战火不停息地越烧越大，这就使人们越来越看清究竟是谁破坏了和平和民主。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实际上宣布“调处”已经“失败”。9月30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蒋介石，指出：“事实已很显然，政府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至最后破裂的境地。”信中严正宣告：“恩来等特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

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①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一再发出的警告，强行侵占张家口。国民党当局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立刻撕毁政协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召集的协议，在侵占张家口的当天下午正式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这样，就使更多人从事实中看到，是国民党不要和平不要民主，共产党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战争的，从而把同情放在共产党一边。

当时，国民党要求参加政协的各方面交出参加“国大”的名单。中国共产党当即严词拒绝。中国民主同盟也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拒绝参加。这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只有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的一些政客参加）的“国民大会”，于11月中旬在南京正式召开，并且通过了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他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随即返回美国。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当局迫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返回延安；随又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及有关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也被封闭。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当局封死，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再将主力转用于其他战场。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刚于2月下旬采取突然行动在莱芜地区全歼南犯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部五万六千余人，压下了敌军的气焰，并有利于华东野战军全力向南。3月初，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人，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的战法，向山东战场发起新的进攻。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5月中旬，终于抓住战机，在孟良崮战役中全

① 《中共代表团致蒋主席函》，《群众》周刊第十二卷第十一期。

歼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三万二千余人。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陕北的人民军队为两万多人，兵力只有敌军的1/10，处于绝对劣势。他们在延安以南顽强地进行六昼夜的阻击战，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然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因占领延安而兴高采烈，但他们很快发现高兴得太早了。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书记处多数成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根据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以后改称西北野战军）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以便“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①]。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遵照中央方针，不断给进犯之敌以有力打击。在撤离延安后四十五天内，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二万余人；而后转战西北方向，并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两个旅。到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期间，即从1947年3月至6月的四个月内，解放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区也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然仍有九十五座城市被敌占领，但人民军队收复和解放了一百五十三座城市，并歼敌四十余万人。

总计从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止，人民军队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发展到一百九十多万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结束战略防御阶段，以新的态势跨入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2—1223页。

四、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腐败，所作所为完全脱离人民。他们为了进行内战，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大量出卖中国的权益。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国民党官僚资本极度膨胀，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农业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各阶层人民（包括中间阶层）逐渐从事实中看出，这场战争不只是国共两党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几代中国人所要求的独立、统一、自由、富强的中国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

当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1946年12月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即抗暴运动）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抗暴运动是由美国的扶蒋反共、助蒋内战的政策引起的。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当局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凭借在中国取得的特权，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并形成独占地位。如当时上海百货公司货架上竟有80%是美国货。在全部外国在华资本中，美国资本占80%。这些都是在国民党政府放弃国家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增加的，并不是正常的国际投资和经济交往。这种情况，给予处于危殆境地的中国民族资本以摧毁性的打击。战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已形同美国的殖民地。

由于国民党政府纵容，并规定驻华美军肇事只由美国宪警处理，美军在中国到处横行不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至少有三千八百起，中国人民被害死伤者在三千三百人以上。这些暴行，不能不激起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民族义愤。

事实教育了许多中国人，使他们认识到，虽然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者，但战后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1946年12月24日发生的美国军人在北平东单操场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就成为导火线，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

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学生五千余人在北平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沿途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同情。一些年轻的店员、公务员自动加入示威者的行列。这次示威不仅打破了回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古城的沉寂，而且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美斗争怒潮。

12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努力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各地党组织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也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总数达五十万人。

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指出美军的暴行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学生的行动“是替个人争人格、替国家争国格”。上海民主建国会、工商界协进会、重庆市商会等也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这就形成了具有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性质的广泛的人民运动。

抗暴运动表明中华民族不可侮。这场斗争，帮助人们认识了美国干涉中国的活动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领导，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发展起来。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同美国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官僚资本控制着整个

社会的经济命脉。1947年，官僚资本已占整个中国工业资本的2/3，占工业和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官僚资本家利用种种政治特权，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极度的压榨，对民族资本进行无情的兼并，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萎缩。

随着全面内战的持续，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支出猛增，数额占财政支出的80%。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法币发行额在抗战结束时为1.5万亿元；到1947年底已达40万亿元。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美联社上海7月24日电讯曾形象地描写道：法币100元可购买的物品，1940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1/3盒火柴。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的普遍掠夺。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商业日益走向破产，近于奄奄一息。从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上海、武汉、广州等二十个城市工厂商店倒闭的达二万七千家。1947年，工业产量较战前的1936年减少30%以上。失业人数陡增。广大工人、市民乃至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农村经济急剧衰退。1946年农作物产量比战前的1936年减少8—12%；1947年更减少33—40%。广大农村中饥民遍地，饿殍载道。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极度的困境。到1947年7月，物价较抗战前已上涨六万倍，生活指数仅增加六七千倍。靠工资收入和助学金维持生活的人们食不果腹，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党应“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为人民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5月，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比上一年底开始的抗暴斗争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

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五千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

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同一天，在北平，七千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走上街头。天津、上海、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许多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都同情学生运动。中共中央上海局、晋察冀局以及南京、北平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是这些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这就是五二〇运动。

五二〇运动在政治上有力的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之前不久，1947年4月，国民党曾玩弄“改组政府”的骗局，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入阁”，并据此宣称南京政府已是“自由主义”的“多党”政府。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正准备于5月20日在南京开幕。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这一天举行，对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是一个打击。当天，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学生一百五十余名。反动政府的镇压没有收到它们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

学生运动是人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党统治区内其他方面的人民运动这时也在迅速高涨。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汉族、高山族人民并肩战斗，使台湾全省大部分地方的反动政权陷于瘫痪。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在基隆登陆，对起义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被害者达三万人以上。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中，1947年全年有二十几个大中城市的约三百二十万工人罢工。当年9月，上海工人为抗议当局武装接收三个民主工会而罢工，并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展开搏斗。

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征税。到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三百多个县。1947年5至6月间，“抢米”风潮席卷南京、上海、北平、无锡、芜湖等四十多个大小城市。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革命形势也有新的发展。内蒙古人民于1946年4月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确定了平原自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方针。1947年4月，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临时参议会；并经过参议会，选举产生了以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1944年9月开始的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尔

泰三区革命运动也继续坚持和发展。

事实表明，“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中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五、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下降为一百五十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已大为减少；由于屡战屡败，兵力削弱，士气急剧下降，官兵中充满着失败和厌战情绪。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奋起斗争，使国民党军队的后方极不稳固。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一百二十七万人增加为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近一百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不需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强。在解放区内，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已得到巩固。

为了摆脱困境，蒋介石于1947年7月4日颁布《全国总动员方案》，力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持久。

挺　进　中　原

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仍居优势，在装备上的优势更明显。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形势仍然相当严重。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反攻。中共中央规定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

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这是因为：大别山区位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战略上十分敏感的部位。当时，国民党正集中兵力于东西两翼战场，中央部分的兵力很薄弱，只是凭借黄河天险，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大别山区曾经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条件较好，利于解放军立足生根。解放军只要能占据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动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采取这样的行动虽将面对严重的困难，但一旦实现便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达到将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目的。中共中央还决定，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即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夺取城市。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毛泽东充分估计到这次进攻的严重困难。他指出，到外线作战，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部队首长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

1947 年 6 月 30 日夜，刘邓大军十二万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鲁西南地区，经过二十八天的连续作战，歼敌五万六千人，打开了南下的通道。接着，部队迈开大步，长驱南征，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宽达三十多里、遍地积水淤泥的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经过二十余天的艰苦行军和激烈战斗，在 8 月末进入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的进军，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很快增加到三十多个旅，约二十万人。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乏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大军以主力一部坚持在大别山北麓就地展开，另一部分主力向皖西、鄂东地区展开。部队坚决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三万余人，建立三十三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八万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到11月底，歼敌五万余人，建立三十九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到11月下旬，完成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它们互为犄角，以鼎足之势，紧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三路大军的进攻“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①。

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反攻。同年夏季，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战略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93页。

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①

土地制度改革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已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从这以后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三分之二的地方已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共有六十万农民参军，六千万人支援前线。但还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已进行改革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为了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第一，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第二，它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个规定在总体上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首先是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也可以避免重复历史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但大纲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的办法，容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所以后来在新解放区和全国范围内进行土改时就加以改变。第三，它还规定了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规定可以组织人民法庭来保证贯彻土改的政策法令，维护革命秩序。这样就把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取得土地，同由政府颁布法令、支持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土改运动得以彻底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4页。

进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伟大的民主革命的洪流。对这次会议的积极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会议对于解放区土改不彻底和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没有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来保证实施不侵犯中农利益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原则；强调反对右倾而没有注意防止“左”倾。这是当时许多地区的土改和整党运动一度发生“左”的严重偏差的一个原因。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着手没收地主土地等工作。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

土改运动广泛发动后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偏向，主要是：侵犯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如把他们的成分错定为富农或地主，办事不要中农参加，摊派给中农的公粮负担过重；侵犯一部分民族工商业，如没收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对工商业征税过高；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用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或者将地主“扫地出门”，不给生活出路，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对地主乱打乱杀等现象。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逐步引导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大众翻身作了主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了过去中国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

经过土改运动，到1948年秋，在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正如毛泽东在当时所说：“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

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六、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历史进程的发展速度，有时超出人们原来的预料。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①。但蒋介石不顾一切地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有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强加到人民头上。全国内战爆发后，党最初提的仍然是“武装自卫”的口号，并曾尽力挽救和平。蒋介石却在不断扩大内战规模的同时，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至迫使中共代表撤离国民党统治区等办法，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以立法的形式表示同中国人民最后决裂。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给全国各阶层人民只留下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这一条路。到1947年下半年，战局发生了对蒋介石不利的根本变化。当时的情况，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②

新时期行动纲领的提出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在付出了巨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2页。

② 同上书，第276页。

大的代价后才换来的胜利硕果。

报告发出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实践经验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巩固、发展并取得胜利。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人民军队在以往作战中一贯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此后消灭敌人必须继续坚持的主要作战方法。报告同时提出，为了适应转人战略进攻后的新形势，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也应该有新的发展。比如，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又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重要据点和城市；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可能不给敌人获得休息时间；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使军队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在部分解放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实行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尤其重要）。像这样在作战过程中公开地宣布自己的战略战术，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报告说，这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所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为了保证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的贯彻实施，报告强调，必须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在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使党能够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

“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毛泽东以铿锵有力的十二个字结束他的报告。

党的十二月会议指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新形势下政策和策略的制订

十二月会议以后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这是因为：第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对于如何适应新的原先不熟悉的情况，做好新区工作和城市工作，党还缺乏经验。第二，党和军队主要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容易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工作，或者经验主义地将处理农村工作的方法照搬到城市工作中去，如不加以引导，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在同国民党分裂的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一些人容易滋长骄傲情绪，遇事采取不谨慎态度，这会助长“左”的偏向的发展。

尽管中共中央的路线和基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向在“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①]。它的表现是：在农村工作方面，除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等外，还有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的重要性，在工作步骤上存在急性病等；在城市工作方面，侵犯民族工商业，在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而不注意城市的生产建设，破坏城市的生产设施等；在党与群众的关系方面，笼统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助长尾巴主义倾向等。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97页。

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他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①

为了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对待地主富农应有区别，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对待大中小地主和地主中的恶霸非恶霸也应有所区别；必须严禁发生乱打乱杀的现象等等。中共中央还重新发布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使各地在处理有关问题时有所遵循。

1948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讲话根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分析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原则和方法。讲话中具体地说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阐明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的重要性；指出对知识分子应采取保护的政策，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并宣布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转发全党，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走上正轨起了巨大作用。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和中原局书记邓小平的《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也经毛泽东批示转发各地。经过全党的努力，到1948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

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由于农民中的基本群众尚未组织起来，社会秩序还有待稳定，立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条件一时还不具备。因此，中共中央指出：新区农村可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先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让地主富农多负担；待到具备实施土地法的条件，再进行土改。土改时，又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的多余土地在内。这种做法，既可以满足农民基本群众的要求，又可以缩小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6、1298页。

政治上的打击面，对迅速稳定新区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一些大中城市的先后解放，城市中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城市，但后来长时期生活和战斗在农村，许多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造成过一些混乱。1948 年2 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入城的干部和士兵，都不得自由夺取物资，“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年4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指明应注意：“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等等。6 月，中共中央又批发《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不能“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还是以农村的观点来看城市”。为此，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12 月，中共中央批转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沈阳接管工作的经验，解决了对城市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两大难题。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如解决好恢复电力供应、稳定金融物价、收缴敌警枪支、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发放工资等问题。而“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应在条件具备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要操之过急。由于党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都很快趋于稳定。生产及时得到恢复和发展，同各阶层居民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些新解放城市，对支援解放战争、繁荣解放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地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

“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

线和总政策。如果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时，就会迷失方向，贻误工作。

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在贯彻中央规定的统一政策时，要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避免简单化。

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这种口号，取消党的领导作用，提倡尾巴主义，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

为了保证中央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这个问题在这时特别重要，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极大的发展，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或即将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大为提高。这就要求迅速克服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严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及时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要求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

无产阶级政党在历史重大转折到来时，必须有预见地认真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制订正确的对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时刻制定了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并为增强全党同志的政策观念进行大量工作，使全党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

在 1947 年 7 月发布“戡乱动员令”后，国民党政府尽力征发一切可能征发的人力物力，继续进行内战；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颁布并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上一点“民主”的装饰，1948年3月至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争吵，并且由于美国政府也在考虑必要时由国民党内别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桂系首领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国民党当局还积极部署他们的残余力量和地方势力，在南方和边远地区加强阵地，准备对革命人民作最后的抵抗。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1948年陷于绝望的崩溃状况。物价成倍猛涨。上海这年6月的米价每石达法币800万元，为年初的8倍。国民党政府在8月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10月又制订《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它还发行金圆券来代替原来的法币，以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但金圆券又迅速贬值，物价涨风更剧。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其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一切办法都无效，只是使城乡劳动人民遭到彻底洗劫，使民族工商业进一步濒临绝境。

随着国民党统治基础的走向瓦解，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1947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十二个城市的十万余名学生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同济大学血案，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高潮。4月，华北学生为抗议当局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而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并同平津地区教职员工为要求调整待遇而举行的罢教、罢职、罢工、罢研、罢诊斗争相结合，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5至6月间，又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由学生首先发动、随即得到社会各阶层响应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运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于彻底的孤立。

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当局对爱国民主力量的迫害的加紧，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使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

尽管参加过民主同盟的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大多数人在不参加“国大”、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伪“宪法”的斗争中，仍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对于谈判，民主同盟主张态度要强硬，坚决不让，要打便打，他们认为战争不可免”，并表示愿同共产党“共患难”①。他们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进步，这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的主要方面。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主同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它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 年5 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 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新华社在评论中指出，“民主同盟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就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②。1947 年11 月6 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他们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关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这也帮助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1948 年1 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

---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1946 年6 月28 日。

② 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1947 年11 月6 日。

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①。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1948年1月1日，举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会议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民革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这年8月开始，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便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

历史的经验雄辩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

---

① 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12月15日，见《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①]。曾经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除了极少数走向反动以外，绝大多数在实际生活中逐步抛弃了这种主张，确认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八、伟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其中野战军一百四十九万人；在装备上已有很大改善，新增的装备是从敌方缴获来的，可以说是由美国经过国民党军队供应的。人民解放军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经过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的整军运动，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进一步提高。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达二百三十五万五千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解放区内已基本上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由于大批部队担任守备，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一百七十四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由于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它的五个战略集团（即胡宗南集团、白崇禧集团、刘峙集团、傅作义集团、卫立煌集团）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取得配合，主要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的守备，能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为数不多。它已经没有完整的战线。国民党的统治正面临濒于崩溃的局势。

情况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

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还超过人民解放军。在此情况下，敢不敢进行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占领的重要城市、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这时国民党当局又正准备实行战略部署的重大变动。1948年8月，他们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计划在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利巩固华北，达到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的目的；在西北，则力求确保关中、汉中，以掩护其对西南防线的经营。如果让国民党从容实施这种战略收缩的部署，必将增加解放军以后作战的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个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

战略决战，需要贯彻分批歼敌的方针。中共中央正确选定了第一个歼击目标，即首先在东北战场展开决战。这是因为，它既可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收缩企图，又可以使东北人民解放军腾出手来转入关内作战，还可利用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从而有利于整个战局的发展。当时，东北战场的态势对人民解放军也最为有利，夺取决战胜利较有把握。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五十五万人，但已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而东北解放军正规部队总兵力达七十万人，连同地方兵团三十万人，共计一百万人，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敌人。东北的解放区面积已占97%，人口占86%，二千一百多公里的铁路线中二千公里已掌握在人民手中，经过土改和清剿土匪，后方巩固。这些有利条件在其他战场上暂时还未具备。中共中央决定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使初战胜利能比较稳妥可靠。

战略决战的序幕是在山东战场上揭开的，这就是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的济南战役。在这个战役中，华东野战军集中强大兵力对济南这个重要战略城市发动攻击，经八昼夜激战，争取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两万人起义，歼守敌十一万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这是人民解放军解放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重点的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济南的攻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大大改善了支援前线的条件；也使华东解放军能全部南下，协同

中原解放军在陇海铁路以南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辽　沈　战　役

从9月12日开始，东北解放军集中主力七十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

当时对东北战场，中共中央认为，从战略上考虑，“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①]。蒋介石对孤悬关外的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是守是撤，一时还举棋不定。如果让卫立煌指挥的这部分军队撤向关内，国民党就可以保住这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而且可以使它同在华北的傅作义集团结合起来，对解放战争日后的发展带来困难。毛泽东指出，要预见到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为了就地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北宁线，攻克锦州，以关死东北的大门。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片面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主张先打长春。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经过中共中央多次批评教育，他才决心南下。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开始攻锦作战。蒋介石急忙调集华北、山东的一部分兵力组成东进兵团，并以沈阳主要兵力组成西进兵团，两路增援锦州。解放军在塔山、虹螺岘一线对敌东进兵团进行英勇阻击；敌西进兵团也被解放军顽强阻击于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近九万人，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锦州的解放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东北国民党军队向关内的退路已被切断。蒋介石仍严令廖耀湘率领西进兵团夺回锦州。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包括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的廖兵团。10月26日完成对廖兵团的分割包围。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该敌十万人，生俘廖耀湘。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人民解放军从此在数量上也对国民党军队有了优势，使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

---

① 毛泽东1948年2月7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电。

的解放，不仅使近百万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与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淮 海 战 役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六十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国民党在徐州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将刘峙、杜聿明集团蜷缩于徐州地区，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向南撤过淮河，据守长江。这个部署，反映出国民党统帅部在撤守之间仍犹豫徘徊的心理状态。当时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相交的十字架上的国民党军队共约八十万人。

还有9月间，粟裕就建议华东野战军主力由鲁西南出苏北，组织淮海战役，以歼灭徐州集团右翼一部为目标。这一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同意。11月，中央军委根据战局发展，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把“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作为总方针。中央军委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①] 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

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超过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武器装备上更占有巨大的优势。因此，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11月6日至22日是第一阶段。这时，国民党军队的黄百韬兵团正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②]。解放军决定以一半以上兵力用于阻断和打击前来援救黄兵团的敌军，以期使分散之敌不得靠拢，被围之敌无法漏网。

---

① 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6日关于成立总前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人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1页。

11月6日，战斗打响。黄兵团企图夺路西逃。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二万三千人突然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穿越他们的防区，迅速切断正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各路增援的敌军都受到坚决阻击。黄兵团只得折回碾庄，被压缩在纵横不到十公里的包围圈内，到22日，全部被歼。

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黄维兵团约十二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其中的第十八军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采取“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于25日将黄维兵团包围在浍河以南的双堆集地区。前来增援的敌军或者被歼，或者受阻。12月6日至1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该敌。在此期间，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在陈官庄一带，孙元良兵团被歼灭。

从12月15日至下一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部。在这个阶段的最初一段时间，为了配合平津战役，麻痹并稳住傅作义集团，淮海前线解放军曾奉命在两星期内暂停对杜部的军事攻击，主要展开敦促杜聿明等率部投降的政治攻势。到华北战场上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其中包括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之一的第五军，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六十六天，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人。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压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平　津　战　役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一百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国民党傅作义集团除有五万余人分驻归绥和大同外，有兵力

五十余万人，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约五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在这部分军队中，属傅作义系统的为十七个师（旅），蒋介石系统的为二十五个师（旅）。在此之前，蒋介石已提出要傅率部南撤，加强长江防线。傅作义对蒋介石的排斥异己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这时，傅作义所部为解放军在东北的胜利所震慑，已成“惊弓之鸟”，但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入关作战。傅作义根据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不断收缩兵力，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准备随时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如果傅作义集团撤走，人民解放军虽可不战而得平津，但国民党长江防线得到加强或保存较多作战力量，这对今后作战是不利的，因此，稳住华北敌军，使它不迅速决策南逃或西窜，就成为能否实现就地歼敌的关键。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11月23日起，就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并调动原驻天津、塘沽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十二、九十四、一〇五军进到北平地区。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在新保安歼灭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一万六千人，在张家口歼敌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一〇五军五万四千余人。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当东头的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二十九小时的激战，攻克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全歼守敌十三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解放后，塘沽守敌乘船南逃。

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同傅作义接触。由于解放军力量的强大和作战部署的迅速完成，由于中共的耐心工作和各界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旨，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傅部移动完毕，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相当时间，在董其武率领下于1949年9月通电起义，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便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五百四十三万人，向前线运送一千四百六十多万斤弹药、九亿六千万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战场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各具特点的作战方针，有力地保证了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九、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的防御。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函杜鲁门，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美国方面感到蒋介石的败局难以挽回，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次年1月8日，蒋介石

政府向美、英、法、苏四国发出照会，要求它们“调解”中国内战，四国政府也从各自的考虑出发，予以婉拒。这时，“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① 桂系首领李宗仁准备乘机代替蒋介石，出面同中共方面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实行“隔江而治”。在这种背景下，1948年12月24日，桂系另一首领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抢先打出“和谈”的旗帜。在他的授意或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和湖南省政府主席也建议恢复和谈，并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的进行。

蒋介石由于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保存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这时，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竟竭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机会，卷土重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自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他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愿意参加当前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4页。

革命事业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后，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他规定和谈的“限度”是划江而治，即“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①；同时强调“备战要旨”，应“以整饬军事为重”。他计划争取三至六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二百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同时还作了最后退保台湾的安排。李宗仁政府的打算也是守江谋和②。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承认以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是虚伪的。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报告对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作了估计，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

①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87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美国韦斯特维尤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91页。

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关于谈判问题，报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全面谈判如能成功，有很大利益；如不成功，可待进军后分别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并派黄绍竑将协定文本带回南京。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声明，拒不接受这个协定，并指示李宗仁、何应钦照办。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北平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经中共方面真诚挽留，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仍留下，多数随后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援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4月20日、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后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3艘英舰逃走。事后，英国政府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立刻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立场，使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它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当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时，原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忙逃往广州。4月

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国民党反动政权既被推翻，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6月，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的规划。这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文章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发展中国的经济，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毛泽东的报告和文章，构成了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

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政协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10月9日，毛泽东当选委员会主席。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民族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它的原则为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中国人民革命是怎样发生和胜利的呢？

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①]。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十分英勇的。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页。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逐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使它具有易于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

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转化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正因为如此，连坚决反共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底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中国不存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基础。"① 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仍幻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民主个人主义者会再显身手，以便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②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可以指导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而且可以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

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二十八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③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

---

①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74年版，第4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0页。

③ 同上。

第　六　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由此而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1949年10月1日，首都三十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受阅部队。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企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在新区工作中表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使人们耳目一新。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满怀翻身的喜悦。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大批参加革命工作。华侨青年和留学生纷纷回国。许多中间力量，包括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力量，主动向人民靠拢。许多人要

求重新学习，改变旧思想，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革命力量汇合起来，更有力地发挥核心作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个胜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很高的威信，被接受为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也扩大了它的影响。

建国之初面临的考验

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是当时形势的主流。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

在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既成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这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在国际上，新中国一成立，就得到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印度、缅甸、瑞典、瑞士等国也经过谈判，确认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而同新中国建交。英国很早承认新中国，但它在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和支持恢复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上采取暧昧态度，建交谈判只能搁浅。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新中国是很重要的国际支持。但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是出乎苏联领导人意料之外的，他们在对这个胜利表示欢迎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有些疑虑。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很多。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不能在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取得胜利，这是又一个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是指在全新的任务面前要排除万难去学会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指在进入繁华城市、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警告的，也是党的许多朋友所十分关切的。

总之，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否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管好国家，这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仍然是一个疑问，要由实践来作出回答。国际间的朋友和敌人，也在注视和等待这个回答。

面对建国初期的复杂形势和种种困难，中共中央保持清醒的头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基本方针，井井有条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后期作战，进展是很顺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由于敌军崩溃之势已成，我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以雷霆万钧之势，勇猛追击残敌，相继取得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阳）宝（庆）战役、广西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集团、宋希濂集团的贵阳战役、重庆战役和成都战役的胜利。在吸取进攻金门

岛失利的教训的基础上，1950 年4 月取得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胜利。在席卷中国大陆的军事胜利的形势下，又相继用和平方式解放了云南、四川、西康的广大地区。到1950 年6 月，经过八个月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三十万人，使整个解放战争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达到八百零七万人，完成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1951 年5 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 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到1950 年6 月，共歼灭国民党土匪武装近百万人，使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稳定。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在各新解放地区，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组织恢复生产。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讨论和决定当地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重大应兴应革事宜，选举地方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为从军事管制制度过渡到正式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适当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是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之后在全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干部、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领导层，以共产党员为主体，包括相当数量的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最基层有效地行使权力的政权。

没收官僚资本是新解放城市军管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在总结东北和华北解放战争期间接管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和对待国民党政权机关不同的办法，即不是打碎它们的机构，而是先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由军管会把它们完整地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样，接管工作既做到了快，又防止了乱，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设备破坏的现象。到1950 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二千八百余家，金融企业二千四百余家。它们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

人民政府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

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

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党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

当时财政经济困难，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战争还在进行，支援战争开支浩大；为了社会稳定，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只要他们不反抗新秩序，一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由此而使政府供给或支付薪金的全国脱产人员突破九百万，在那时这个负担是很重的；为了恢复生产，恢复铁路交通，也需要大量资金。而那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人民政府的收入远远不敷支出，暂时还只能靠大量发行货币弥补财政亏空。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继续兴风作浪，物价继续飞速上涨。为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 年 6 月 10 日，上海解放才半个月，军管会断然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投机商二百余人逮捕法办，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又进行了“米棉之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陈云指出，稳定物价的关键是看我们掌握市场主要物资多少。他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当11 月25 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对

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是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我们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正常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广泛支持。事后，上海一位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自此，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要进一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为此，必须改变建国前为适应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况而采取的各解放区分散管理的办法，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1950 年3 月，党中央就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办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这个决定立即在全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果。自3 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下面几个数字是很能说明情况的：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月即1949 年6 月为100，到1950 年2 月猛增到2097.9，上涨二十多倍；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后，以1950 年3 月全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到1950 年12月为85.4，1951 年12 月为92.4，1952 年12月为92.6，保持稳定并略有回落。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向全会作书面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也就是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会议指出，现在我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批胜利，表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会前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书记关于税收和失业问题的一份电报中，还提出这样一个策略思想："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① 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再加上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使失业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暂时增多，农民负担还很重，工商资产阶级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惶惶不可终日。投机资本的破坏活动和打击投机资本的辉煌胜利，又使党内有的同志误以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针对这种情况，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

① 1950年4月16日给陈毅的电报。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二、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

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当我国人民从各方面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新中国又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南北朝鲜的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结果。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美帝国主义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插足中国的领土台湾。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任命美国驻远东军队的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中国政府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的罪行表示了强烈的抗议。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7月13日，中央军委及时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截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进部队的后路。侵略军直逼朝鲜北方，战火有烧到中国东北边境的趋势。9月30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严正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如果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美国过分低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

为患”，他们的侵朝战争“赢定了”①。10月初，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武装较量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打退美国侵略军

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当时我国的情况是：经济恢复刚刚开始，长期战争的创伤尚待养息，财政状况还很困难，新区土改还没有进行，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海、空军更处于初创阶段。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经济建设不能进行？面对这样的紧急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全面地估量国内外形势，既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又深入地分析了出兵作战的必要和可能。出兵的必要性在于：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整个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将难以安定地从事建设，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势必嚣张，于中国、于东方各国都极为不利。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后来发表的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说得好：“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取胜的可能性在于：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旺盛，兵源充足；我军一贯能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勇敢作战精神；战场背靠我国东北，后勤支援近便；而美军虽然武器先进，但是兵力分散，补给线长，战斗意志不强。我们力求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这是有可能的。同时也准备美军至少可能用空军轰炸中国一些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纵然出现这种情况，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据此，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英国霍德与斯托顿公司1956年版，第386—388页。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令出动，赴朝作战。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支援，但临时改变了。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1950年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长驱直入的敌人仓促遭遇，利用敌人判断错误、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捕捉战机，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初战告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美国侵略军还没有从迷梦中醒来，继续以更大规模向北进犯，发动所谓“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人机群狂轰滥炸、我军供应不足而且气候严寒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英勇作战，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迫使敌军从总攻击变成总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以后又相继进行了互有进退攻守的三次大的战役。到1951年6月10日止，五战五捷，共歼敌二十三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在这种情况下，从1951年7月开始双方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并不甘愿放弃侵略野心，企图用空中绞杀、海岸进攻等军事压力迫使朝中方面在谈判中屈服。美国动员了它的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作为侵朝战争的主力。停战谈判谈谈打打，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利用地形，构筑坑道，以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积多次的小胜，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两年中又歼敌七十二万人。中国国内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后备力量轮番入朝作战，得到苏联支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也开始出战，后勤运输保障得到加强。这样，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此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①

美国侵略者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但是这场战争终于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这个胜利，揭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

① 〔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美国哈拉普公司1954年版，第11页。

战胜的神话。正如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说的:“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由于这个胜利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部分对帝国主义曾经存在恐惧和幻想的人们也由此受到深刻教育而觉悟起来。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侵犯新中国的尝试,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国内人民的热烈拥护为坚强后盾。在国内,党领导展开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用踊跃参加志愿军,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在各条战线上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实际行动来支援战争。抗美援朝运动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极大地鼓舞起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

从1954年9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从朝鲜回国,尽管这时美国仍不愿意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从朝鲜南北双方撤退外国一切军队的问题同朝中方面达成协议。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表现了中国人民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和中国无意在外国驻军的立场。

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新区一解放,就进行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从斗争中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培养一批农民积极分子,为开展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了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经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后提交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建国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这一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统一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党面临的最大课题已不是如何夺取革命

战争的胜利，而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进行的各项工作，都应当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并为它服务。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也在于此。《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总则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和可能，在政策上，对富农，由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即：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动；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对地主，限制了没收其财产的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其土地数量的标准。实行这些政策，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运动的阻力，还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工作方法上，强调土地改革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在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提高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实现当家作主。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同时，党又指出对群众运动不能放任自流，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同用党的政策去武装群众、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为了加强领导，党训练了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到农村工作。党还在城乡各界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并吸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去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形成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这是因为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更加丰富了，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也更为有利了。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反封建，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没

有力量领导农民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明确地提出并且领导农民完成了这个任务。反封建，最根本的是要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离开废除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单纯反对封建思想和文化，不可能彻底，不可能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当然，废除了这种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党还要为把分散的个体经济（它们也曾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改造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为彻底肃清封建的和小生产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这是一项很长时期的历史任务。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历史条件都有许多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点，党主张采取更加慎重、更加和缓的政策和步骤。特别是对于西藏地区，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一直阻挠改革。为了等待西藏领导人员的觉悟和其他条件的成熟，直到 1956 年中央还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可以不进行改革。但是，农奴主贵族中的反动分子，不仅反对在西藏进行土地改革，而且勾结国外反动势力策划"西藏独立"。1959 年 3 月 10 日，他们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还蔓延到西藏其他一些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迅速平定了叛乱。3 月 28 日国务院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6 月自治区筹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这以后，民主改革即在全区有步骤有区别地陆续展开。民主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把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党在西藏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彻底消灭封建农奴制度，消灭农奴主阶级。土改中区别叛与未叛：对西藏地方政府和参加叛乱的贵族、寺庙的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贵族和寺庙的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全区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土地上最后残留的封建制度归于消灭。

镇　压　反　革　命

镇压反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

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时在大陆上遗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以至组织骚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达七千多人。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在一段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且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人民群众自觉地起来检举和揭发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高潮以后，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处理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的方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都被基本上肃清。这使我国社

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

其他的民主改革

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相配合，党还领导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

首先是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逐步开展的民主改革。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在民主改革中，有领导地放手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揭露和控诉存在于旧企业中、接收后还没有来得及改革的封建把头制等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把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名副其实的主人。同时，通过运动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自我教育，消除封建行帮、地域观念所造成的隔阂，加强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工人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之间的团结。这样就在企业收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中进一步体现出来。这是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必不可少的步骤。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在一个方面的深入。党和政府为广泛宣传《婚姻法》和贯彻执行《婚姻法》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有效地推进了我国妇女的解放。

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由于与反恶霸斗争有密切联系，当时也都带有民主改革的性质。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定。当晚，出动大批干部和民警封闭全市所有妓院，将妓院老板二百余人全部集中审查处理，将一千几百名妓女集中在教养院进行学习，启发她们控诉旧社会

的罪恶和老板对她们的虐待，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学习技艺。经过学习教育，她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择偶成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等全国大中小城市都采取同样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这种在旧社会绵延几千年的丑恶现象顿时绝迹。对吸毒、赌博等同旧中国反动统治势力和黑社会势力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病害，党和政府也严加禁止。一方面发动群众有力地打击、制裁借此谋利的制毒、贩毒者和赌头、赌棍；一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让吸毒者、嗜赌者自觉地戒毒、戒赌。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居然都被基本禁绝。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反帝斗争的继续。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反封建斗争的完成。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起了极大的变化。这些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更加巩固，使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有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三、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七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国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总口号和总任务，是因为那时除西藏、台湾尚待解放以外，战争已经结束。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向经济转移，从我们进入大城市就开始了。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建国之初，他郑重宣告：“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①]。七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电示各地，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

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① 从全力领导革命战争到全力领导和平建设，这是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深刻转变。

旧中国经济本来极其落后，八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三年多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战争更使它遭到严重的破坏。1949 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 万吨，减少80%，煤仅3243 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318 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 万吨，减少约48%。1949 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 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 44 美元的 2/3，不足印度 57 美元的一半。这种情况使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紧迫。

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和国防建设。但是，由于战争始终局限在国外的朝鲜战场，党中央决定“边打、边稳、边建”。稳是稳定物价，这一点在战争仍在进行的艰难条件下做到了。经济建设则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

抗美援朝战争影响经济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禁止一切美国货物和船只进入中国，还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实行国际性的、全面的封锁禁运。在对外贸易中，我们原本决定“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②。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阻碍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政府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对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华一切财产实行管制，对美国在华公私存款立即冻结。随后，又对美国在华公私企业采取征用、代管、征购、加强管制等办法进行处置，并且接管了接受美国津贴的各种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对其他国家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政府根据区别对待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按照国籍、行业等不同情况，分别作了处理。封锁禁运造成的困难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激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加倍努力为经济的

① 毛泽东1950 年5 月20 日关于财经工作给饶漱石等的电报。

② 毛泽东1949 年12 月22 日关于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给中央的电报。

恢复和发展而奋斗。

农业、交通、工商业的恢复

“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①] 实行土改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土改集中在冬春农闲时进行，是为了不误生产。土改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由于摆脱了封建枷锁，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认为在发扬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的同时，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个体农民之间的劳动互助。国家还从减轻赋税、发放农贷、疏导供销、推广技术、奖励丰产等各方面，特别是从动员群众兴修水利方面，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政仍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三年间，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达二千万，完成的土方约十七亿立方米，相当于二十三条苏伊士运河。这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都是这时开始动工和加紧进行的。

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的恢复，也是摆在优先地位的。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成渝（成都到重庆）铁路在清朝末年就筹款准备兴修，四川人民保护路权的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但是在整个民国时代，四川全省一寸铁路也没有建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成渝铁路工程从1950年6月开工，到1952年7月1日建成。通车这一天，聚集在成渝两地车站的数十万群众热烈欢呼，许多人禁不住流下热泪。通往世界屋脊上的拉萨的工程艰巨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也开始兴修了。

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党强调两条：一是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一是要主要依靠国营经济。翻身作了国家和企业主人的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高涨，涌现出大批的劳动模范，开展了广泛的劳动竞赛。在重点建设方面，除首先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外，还兴建一批骨干企业，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棉纺厂，哈尔滨亚麻厂等。成渝铁路所用的钢轨，治淮工程

---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中的整套钢铁闸门，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党认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要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14.9%增加到34.4%。合作社商业作为国营商业联系群众特别是联系农民的重要助手，1952年全年商品零售额达到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19.6%。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是一个极关紧要的大问题。1950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85%。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增加工业产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帮助商品流通以促进城乡交流、吸收职工就业、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增加国家税收和社会积累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作用。资本家当中有一批代表人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并在资本家中进行工作，发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必须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其消极作用。如前所述，1949年11月，人民政府打击投机资本，在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1950年初物价稳定以后，由于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等原因，发生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职工失业增加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采取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调整税收负担、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调整工作到1950年秋完成。这次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困难，而且使他们得到很大的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11.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二十二年中的任何一年。

“三反”和“五反”

党和政府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党中央不能不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干部贪污案件，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时有发现并作过处理。1951 年11 月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揭露出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党中央随即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为了在全党范围内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场斗争是必要的。斗争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斗争中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当时的书记张子善，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尽管他们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功劳，党也决不姑息，经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胜利的初战。“三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随即作了纠正。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1952 年1 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运动中揭露出的“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地存在。少数资本家“五毒”严重，情况惊人，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这样的激起全民公愤的事件。“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全国上下当时强烈的呼声。运动进入高潮后，党及时指示各大城市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

活的正常进行”①，“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②，限制受处罚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超过全体资本家的5%，并对“五反”定案、补交漏税和退回违法所得的工作规定了一系列合理的从宽的政策。中央指出：这样结束斗争，“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③。针对运动高潮中党内露头的否认资产阶级仍有积极一面的思想，党中央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所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④。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半年结束。它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我们党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又一个回合的胜利。运动过后，党和政府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关系，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合理利润，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有所发展。以1952年同1949年相比，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增长54%。

三年经济恢复的成就

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八百万增加到一千六百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先后在企业中实行劳

① 中央1952年2月15日关于“五反”中对守法和半违法半守法及严重违法的资本家处理的指示。

② 毛泽东1952年2月17日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

③ 中央1952年5月9日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

④ 中央1952年1月21日批转的薄一波关于中央一级各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

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据调查，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为140元（按1957年价格计算），1952年达到189.5元，增长35%。农民收入1952年同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

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1949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34.7%，1952年上升为56%。另一方面的变化是，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为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17%上升为26.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26.4%上升为1952年的35.5%。这表明我国经济的恢复，不仅有数量的发展，而且有性质上的变化和质量上的提高。

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在1952年行将结束，1953年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发展面临的形势和许多新的问题。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当时的形势是：抗美援朝战局早已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任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战争影响并有紧张的社会改革相伴随，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进行得比较顺利，原来设想“三年五年恢复”，现在三年就实现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这一切说明，我们已经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当然是国家的工业化。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所在。现在，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开大步前进了。

同时，我国社会生活中又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党有明确的方针和系统的政策来逐步加以解决。在农村，主要是土改以后农民分散落后

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原料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又使共产党人不能不去考虑个体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已经经历几大回合，斗争并未结束而是时伏时起，对国家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这些矛盾的加剧，使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形成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这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起就已经确定的奋斗目标。中国近代的历史已经证明，为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切奋斗，无论是用改良的办法还是用革命的办法，统统都失败了。这样就产生了另外寻找新的奋斗目标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提出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目标，正是体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中国原来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基本国情又决定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历史的必由之路。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党一直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步纲领，用它来规定自己领导的革命的性质和经过这个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的性质。至于革命何时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党只是指出这是必然趋势和需要必要条件，没有也不可能对转变的时机和条件预作具体判断，这是要在革命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的。

民主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确定了各项基本政策，也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向。但是，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去。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说明："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他同时指出：

“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而在党内的场合，包括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和建国后几年的多次党内干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过，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估计至少要十年，多则十五或二十年。那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这样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到1952年，经过了三年的实践，由于形势的发展，新的经验的积累，以及对社会主义改造步骤有了新的认识，使原来的那种设想发生了部分的变化。党中央认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预计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现在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了。

这个改变为什么会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呢？

第一，因为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这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但是，由于没收官僚资本，解放前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的80%成为国营资产，全国银行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这样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到国家手中，使这个没收同时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①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国民党时期和中国历史上更早的官营经济不可同日而语。它代表和保障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受到群众的欢迎和信任。它是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的主要力量，又是现有基础工业的主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都要由它来承担。中国实现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不可能依靠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弱小，而且主要是商业和金融资本，很少工业资本；民族工业资本中又主要投资于轻纺工业，很少重工业。私营工厂一般规模不大（雇工不

① 1959年底到1960年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到十人的占69.7%),技术落后(工场手工业占79.1%)。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更没有能力担负起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任。而国营工业大多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在国营企业中主人翁意识强,生活稳定,享有各种权力和福利,劳动热情高涨。总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当时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其他经济成分的优越性,是一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生力量。到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60%,社会主义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对强大的因素。此外,当时由国营经济和国家行政力量支持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高度统一,很自然地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建立在这种高度集中统一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后的发展表明在若干方面确有其弊端,需要适应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和改革。但它却是当时在物资短缺而需求紧迫的严峻形势下党和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一定程度的统一和计划性,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始终是必要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国营经济发展和计划经济扩大的要求,就成为党认为需要也可能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总路线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的又一条。保护,包括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和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两个方面。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同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同国家的管理,同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私营经济内部工人同资本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为了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调节和解决这些矛盾,对资本主义的某种限制和资本主义反对这种限制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同资本主义经济反抗国家限制的不法行为和消极作用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合理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合理分配原料和市场,在保证国营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的过程中,国家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

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些本来主要是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而采取的措施。当时对于许多私营企业来说，没有国家的扶植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所以国家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受到资本家欢迎的。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一系列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不但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也必然加深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从而也就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对它们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开头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党从总结经验中肯定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大和提高，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改变了过去只把将来某一天宣布实行国有化，一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社会主义改造措施的原有观念。这也成为党认为这时可以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总路线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第三，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在土改完成后的农村中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也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的主要一项。在农民分得土地以后，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怎样才能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迅速增长的需要？怎样才能避免两极分化？当时个体农民平均每户只有十来亩耕地，贫雇农平均每户不足半头耕畜、半部犁，资金也很缺乏，维持生产尚且不易，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多种经营更加困难。在这样的个体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要解决适应工业发展和避免两极分化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根据当时的经验和认识，党认为只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才能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简单协作的互助组已经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也已经开始发展，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集体农庄）也有了若干典型试验。党总结这些实践经验，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不仅是帮助贫苦农民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党还形成一个新的观点：中国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业合作化不能坐等工业化和机械化。一般规模较小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没有大机器，主要靠统一经营和协作，也可以增产，正如手工业工场初起的时候，没有大机器，主要靠协作，也能提高生产力一样。这个观点说服了很多人。这是党认为现在可以提出向社会

主义逐步过渡的总路线的第三个基本因素。

这三条表明，既然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意义的因素，是不断壮大其力量和扩展其范围的因素，那么，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扩大的常委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说："集中地说，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第四，从国际环境看，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军事上侵略威胁，经济上严密封锁。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显示出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只有苏联援助中国。尽管我们在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时候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经济制度仍然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榜样作用。这也是促使党认为应当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上讲到：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都较详细地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到1953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正式进行了讨论，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9月24日发布的庆祝国庆四周年口号，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这条总路线。1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这个提纲时写了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对于为什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他还作了这样的解释："我

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1954 年 2 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化”与“改”之间，这一“改”与那一“改”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化”和“改”，都规定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且规定必须逐步进行和逐步实现。这是考虑到我国原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改造亿万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实现。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时间，加上三年恢复时期，共十八年。这是较为稳重的估计。同原先所设想的先进行十五年或二十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一步实行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具体步骤和方法有了变化，而预计要用的时间仍大体相同。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1953年1月1日，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宣告：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年初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指出："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第二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全党和全国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兴高采烈地迎接和投入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高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陈云主持，从1951年开始着手。1952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提要。在这期间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又明确规定：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方面初步编制和开始执行，一方面继续不断讨论修改，先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1955年3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于同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认为：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

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一）党当时确定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且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这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对我们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为了获得能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需要尽可能使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我国有计划的工业化的起步点，仍然是很低的。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而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已分别达到45.2%和39.5%。1952年我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如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2949度。毛泽东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 中国人民自然都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同时，考虑到轻工业相对说来还有一些基础，当时由于销路和原料的限制，设备利用率还很低，增产潜力还很大，考虑到农业增产当时只能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和资金投入，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也有客观的可能。当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武力威胁，也迫使我们不能不较多地考虑为国防现代化所必需的重工业建设。

计划规定，五年中，一方面将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工业部门，另一方面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的工业部门，一方面要合理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求大大提高我国的工业生产的能力，初步改善我国工业几乎都集中在沿海和东北的很不合理的布局。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

建设，其中又把88.8%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即重工业的建设。

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各部门是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一五”计划规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运输邮电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用于农林水利部门的占7.6%，用于运输邮电部门的占19.2%，用于银行贸易部门的占3%，用于文化教育部门的占7.2%。同时十分注意市场的稳定，强调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使国民经济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二）党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正确估计我们主观力量增长的可能性。资金、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严重不足，是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科学交流等各方面对我们的封锁和歧视，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必须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在发展速度的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总希望能尽快地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起初往往考虑需要的方面多，考虑客观限制和实际可能的方面少。例如开始拟定计划的时候，曾经提出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20%以上，农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7%。这是大体上参照1950—1952年的增长速度制订的。但那是带有恢复性质的速度，要在恢复以后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保持同样的高速度，是不现实的。当时把工业增产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新建项目的投产上，而对新厂投产往往预期过快过早。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很快增长的可能性期望过奢，而对制约农业增产的不利因素估计不足。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反复测算，又鉴于1953年和1954年连续两年农业生产因灾不能完成当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最后确定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4.7%，其中70%靠原有企业挖掘潜力，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4.3%。同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这仍然是较高的，但是比较接近我国的实际，是可能完成的。

（三）党坚持在经济建设中要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其中一部分要在“二五”计划期间进行）。对于兴建这些项目，苏方不仅提供贷款，而且从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建筑安装到人员培训、试车投产，

都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一五”计划时期，苏方派来我国的技术专家达三千人，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达七千多人，实习生五千人。这是中苏人民友谊史上光辉的一页。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不赞成依赖苏联的援助。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这些贷款，从1955年开始，就以我国对苏贸易顺差分年偿还。在苏联帮助设计和装备的项目中，仍有20%至30%的设计工作量和30%至50%的机器设备由我们自己负担，凡能自己解决的绝不依赖外援。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坚持我国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党还要求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这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逐步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或者影响国家建设的发展，或者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全国人民必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服从国家建设的长远根本利益，而对眼前生活改善的幅度作必要的限制。在扩大积累的同时，也要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改善人民生活，不能片面地提高积累而过多地挤了消费，这样会影响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一五”计划开始，建设规模很大，但是积累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1953年只比1952年略微提高，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

以上这些指导思想，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思想原则。

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执行的鼓舞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

工人阶级一马当先。他们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又是工业化战线的主力军，被各阶层人民称为工人“老大哥”。他们不但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而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1953年，全国总工会根据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保证全面地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紧急通知》。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七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工人阶级中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随即提高一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在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当时从全国一次调集的干部，就有一万名之多。党号召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钻研工业建设的业务。毛泽东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

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辞艰苦，兴高采烈地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1952、1953两年甚至把建设急需的理工科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分配。以建设的尖兵——地质勘探队伍为例，旧中国只有微不足道的二百多人，几年功夫，通过从各方面调集专业人员，分配地质专业和从其他专业转到地质专业的大专学生，以及采取大规模培训等办法，迅速发展到数以万计。

农民也很关心工业建设，认为工业发展了，用化肥和机器种田，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就有希望了。他们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成为农民向国家、向工业建设贡献力量的重要渠道。在工业建设发展之初，特别在矿区建设中，大批青年农民被吸收到迅速扩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来。

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这是我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胜利。鞍钢全体工人写信向毛泽东主席报喜，毛泽东复电祝贺。苏联专家为鞍钢的重

建出了大力，苏联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庆祝大会。华北的包头钢铁公司和中南的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为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开了头。到1956 年，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开始修建，到 1957 年建成，使铁路从此可以纵贯中国。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大大小小建设项目不胜枚举，单是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起来每天有一个开工或者竣工。

总之，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虽然基础是薄弱的，限制因素是多方面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有利条件也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主体，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工业化在扎扎实实地取得进展。

六、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外交工作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在到来，其他各个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应的发展。

文化和思想建设

文化建设，一是要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这就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是要适应和推进经济建设，这就是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准备和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党主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①

教育工作改革的内容，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外，还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解决教

①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 年 6 月。

育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的问题。为此，党要求：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发展小学和中学并扩大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创建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和技术进修班，开辟这类特殊途径来提高工农干部的教育水平。一是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1952 年在全国范围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调整后的高等院校大幅度扩大招生。这些都是为了适应有计划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对建设人才的急迫的需要。

在科学工作方面，建国之初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1954 年春，中共中央批转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作出指示："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的时候，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以促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并帮助全面了解和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我国科学基础薄弱，而科学研究干部的生长和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奋努力，急起直追，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① 批示还系统地阐明了党的团结科学家的政策，大力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的方针和建立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包括高等学校和各生产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在内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体系的方针。在文艺工作方面，党继续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党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的成绩。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②。建国之初，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不肯跟随国民党逃亡而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以李四光、老舍为代表的著名知识分子大批回国参加建设，就是一个方面的明证。知识分子学习热情也很高，他们要求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地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

---

① 中共中央1954 年3 月8 日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

②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51 年10 月24 日。

的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还组织他们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实践中接受教育。1951 年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毛泽东选集》的开始出版，推动了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热潮。1951 年9 月北京大学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开始，首先在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周恩来受中央委派，向两市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着重阐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和目的，强调要分清敌我，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还要力争更进一步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使参加学习的教师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各人总结思想，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党总结京津高校教师学习的经验，向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教师推广，并且逐步扩展到各界知识分子中去，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一运动，到1952 年秋基本结束。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参加了学习。这次学习运动，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思想批评中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如有些单位学习苏联，要求承认苏联的某些生物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批评西方科学家的一些生物学说是“资产阶级”的），做法有些粗糙，有的单位采用群众斗争的办法，感情上伤了一些人，但是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在运动的进程中党对发生的缺点比较及时地作了纠正，并且通报各单位要求注意防止。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感到有收获，通过学习，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使自己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

1951 年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新放映的电影所歌颂的武训，是清末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讨论和批判这个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1954 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

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党发动这两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1955 年，又展开了一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在进步文艺界中历来有不同意见和批评。这时，针对胡风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批判猛烈展开，并且迅速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镇压。这种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的做法，特别是并没有经过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作家）当作“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做法，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

1955 年3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强调指出，为了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在思想工作中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而这一任务的解决，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对于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正确开展，《指示》作出了一系列原则的规定，其中包括：“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在批评中，“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于后者，应当“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这些规定本来是在研究这以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为了纠正和防止学术批评和讨论中的偏差，使之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而制定的。这些规定实际上为党后来提出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了初步的准备。可是由于揭露和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掀起，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受到极大的干扰而被忽视。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加强各项政治建设，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已提上党的重要议事日程。

1953 年1 月，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1954 年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会上，毛泽东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热情洋溢的开幕词，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且用法律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而确立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确立了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总之,这个宪法体现了两大原则: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记载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胜利成果,指明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大会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从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即中央人民政府。

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建设,主要有:

(一)人民政协继续发挥作用。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其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人民,并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国内外重大事项和重要人事安排进行协商,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等十五人为副主席。人民政协的继续存在,符合于宪法中规定的“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法制建设继续向前发展。

我国建国初期即已着手的法制建设,由于宪法的制定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重新制订了有关国家机关的一批重要法律,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随后，还开始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以及民法起草的准备工作。我国有系统的法制建设工作，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三）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

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中国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各少数民族人口据1953年普查统计共三千五百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他们分布的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步汇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中华各族人民过去共同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新中国成立前后，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进行种种阴谋活动，策动所谓“民族独立”，妄图分裂中国。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党根据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一贯立场，确定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实行这一政策，一方面可以保证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地位，满足各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这是党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创造。党的这个主张，早在建国初已为《共同纲领》所接受。根据《共同纲领》关于民族政策的原则规定，总结1947年5月我国第一个省一级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以来的经验，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和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了比《共同纲领》更进一步的规定。到1956年9月，全国已建立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两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和四十三个自治县。到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西藏自治区则是在1956年成立筹备委员会，而于1965年正式成立。

(四)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当公开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扩军备战并且威胁我国的安全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建设足以保卫我国领土完整、领空领海不受侵犯的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在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和平建设时期,在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上迈步前进,取得新的成就。

党 的 建 设

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团结,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1950 年,针对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中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党中央发出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了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的整风学习。1951 年春天,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在这种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整党从1951 年下半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在进行“三反”的单位结合“三反”进行,到1954 年春基本结束。在总数为六百五十余万的党员中共有四十一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

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高岗、饶漱石于1952 年底和1953 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党中央正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和饶漱石窥测形势,以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在 1953 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和

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会外，他们散播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破坏中央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高岗自己。在同年秋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配合行动，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在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不顾军队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事实，断言“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且把他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12 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1953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1954 年 2 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妨碍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等待他们觉悟，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是高岗拒绝党的教育，终于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 年 3 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

总起来说，建国之后的这些年代里，全党党员的精神面貌是比较好的，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对党员的教育和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的斗争是抓得比较紧的。党中央从延安整风和七大以来所形成的坚强团结，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继续

保持下来。清除了党内野心家高岗、饶漱石，而且没有因此而在党的领导层中牵连许多人，这就使党内团结不但没有受损害，而是更加强了。党的领导层在政策上和工作上的一些分歧，都能经过党内正常的讨论，得到意见的协调或认识的一致。一个坚强团结的党，一个为党所确定的正确目标而一致行动、努力奋斗的党，是建国初期我们各项工作取得顺利进展的最重要的保证。

外　交　工　作

为了给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党要求在外交方面展开积极的活动和斗争。

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的紧张局势开始有所缓和。但是美国不仅不想从朝鲜撤退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且他们的舰队继续盘踞在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并且企图进一步从印度支那地区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这是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特别是亚非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相违背的，是不得人心的。得到中国大力支持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法国殖民侵略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1954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54年4月，由于苏联的推动，在日内瓦召开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分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期间，由周恩来率领的我国代表团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未能就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法国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权利，从而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

为着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5 年 4 月，有共同历史遭遇的亚非二十九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面对着帝国主义对会议的破坏阴谋以及与会各国间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周恩来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提出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和引申。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各国建立了联系。同时还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个声明导致中美两国 1955 年 8 月开始大使级会谈。

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联系，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七、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宣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迈开了步伐。

农业合作化的稳步前进

1953 年，党先后作出两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第一个是 1953 年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第二个是 1953 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国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就是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稳步前进的。

第一个决议，原是作为草案于 1951 年 12 月在党内下达的。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背景是，对于在老解放区农村已有较大发展的劳动互助组织的性质和前途，党内产生了有所不同的看法。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才能由穷变富；“组织起来”的远景目标，是集体化，社会主义化：这两条是党的一贯主

张，在党内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当前步骤。在老区农村，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助组织发生涣散现象，农民中出现向富农方向发展的自发趋势。面对这种新情况，有些同志主张把老区互助组织（主要是常年互助组，也有少数土地入股的合作社）提高一步，引导它们走向更高级的形式，这就是，提高互助组公共积累和扩大合作社按劳分配部分的比重，以这些新因素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互助组织的私有基础。有些同志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而不是逐渐动摇它的私有基础。动摇私有基础，搞农业集体化，那是将来的任务，要以国家工业的强大发展和农业机器的大量使用为条件。这种意见分歧也反映到中央领导同志之间。中央书记处对这个分歧进行认真讨论，考虑各方意见，取得共同认识。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9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述决议草案就是这次会议的成果。

作为这个决议草案基本出发点的指导思想，是重视“两种积极性”的思想，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在我国经济条件下，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将是大量的，农民对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了解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的特点，并提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党坚持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策，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同时，党从来认为要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贫困农民增加生产，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并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决议草案要求在全国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并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外，还提到“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决议草案分析了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上的两种倾向：一种是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党引导农民从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经济的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

形式；一种是采取急躁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需条件，过早地不适当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达到社会主义。党批评这两种错误倾向，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经过一年多的试行，党认为实践证明决议草案确定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1953 年春把它作为正式决议公开发表。发表时将试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说明党对使用机器作为办高级社的先决条件的看法有所变化。

1953 年，党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12 月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粮食市场出现紧张局势、中央作出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重大决策的同时通过和公布的。《决议》强调农业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高涨的需要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为着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逐步克服农业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把农业增产和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决议》总结我国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指出：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个决议的特点，是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认为初级社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优越性，证明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从而日益成为党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

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农业合作化获得很大发展。运动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是健康的。1953 年曾经一度出现有些急躁的偏差，很快得到纠正。中央成立以邓子恢为部长的农村工作部，密切注意和具体指导运动的发展。在积极推动互助合作的同时，党特别强调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

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互助合作搞得好不好，根本一条要看是否增产。据1954年底统计，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四百几十万个增加到近一千万个，初级社由1951年的三百多个增加到1953年的一万四千个，再到1954年秋的十万个和1954年底的四十八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由1951年底的二千一百万户增加到1954年底的七千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由19.2%增加到60.3%。当时的许多统计材料表明，合作社80%以上都增产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他们积极要求入社。在老解放区的许多村庄入社的农户已达到60—70%，以至80%，参加合作社已开始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行动。

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六十七万个，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这是因为在合作社大发展的过程中新社工作不免粗糙，再加上1954年粮食统购多购了七十亿斤，农民有意见。一些地方出现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和备耕这类应当引起严重注意的现象。整顿的方针是：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或者暂时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或者适当收缩，或者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即所谓“停、缩、发”。按照这个方针，经过初步整理，全国合作社缩减了两万个，初步巩固了六十五万个。合作化运动根据情况及时调整步伐，保持了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稳步前进的势头。

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1953年10月，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一方面推动了农业的互助合作，一方面推动了对私营粮商的排挤和改造，从而带动对其他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关键的一步。

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工业的发展，城镇和工矿区的发展，种植工业原料作物的农业地区和农户的增加，急剧扩大了对商品粮食的需求量。而当时小农经济增加生产和提高商品率的能力显得很有限，在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小农余粮户又有待价惜售心理，特别是私人粮商粮贩借此机会企图操纵粮食市场，投机活动猖獗，使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的第一年，粮食的收购和供应就出现紧张局势。1953年度需要由

国家供应的粮食销售量比上年猛增31%，而当年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眼看难以完成。一些地区粮食脱销，若干小城镇和受灾地区开始出现粮食市场混乱现象。连北京、天津的面粉供应都出现令人担心的情况。9月4日，北京一些粮商在两小时内把市场上能够抢购到的大量粮食统统抢购了去。人们害怕一天几次哄抬物价的恶风又会刮起来。面对这些严峻情况，党需要慎重地估量形势，处理好国家同农民（余粮户）的关系，国家同商品粮消费者（工人、市民和农村缺粮户）的关系，国家同私人粮商的关系，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这些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个，最难的是第一个。当时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① 经过对可能采取的八种办法仔细斟酌和权衡，中央判断：根据现在的情况，基本的办法只能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严格管制私商；这是长远大计，只要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党中央对这一重大决策拍板定案。由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涉及城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决议作出后，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把这项工作作为极端迫切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担当起来。党相信，依靠党同农民从土改以来建立的密切联系，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工作和阐明社会主义前途的总路线教育，加上统购中充分考虑农民合理利益的经济政策，党的这项决策是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的。事实证明也的确得到了农民的支持。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初步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在不高的水准上满足了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当时这是一个正确的、不可避免的选择。以后针对1954年购了过头粮引起的紧张，1955年减少征购总量，又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消除农民的某些不满，坚持和改进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同上亿户农民直接打交道，非常繁难。这样就产生了"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的

① 《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必要。解决粮食紧张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粮食生产，而粮食增产，当时认为靠小农经济潜力很小，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最近几年内必须依靠合作化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革。这些都促使党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互助合作、粮食征购，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对农民进行改造的两大战略措施。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限制私营粮商一律不许自由经营粮食，只能做国家销售粮食的代销店；私营加工厂只能接受国家粮食部门委托加工，不得自购原料、自销成品。这就是对粮食行业的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改造。粮食统购统销以后，跟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 年又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这些都成为推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步骤。

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稳步前进

在总路线提出和形成的过程中，1953 年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去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总结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情况和经验。随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当时的情况是：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私营企业的大多数都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下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和合作，已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不再是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的、并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了。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因此，李维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①]。党中央对这个调查报告十分重视。6 月，两次召开

①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6 页。

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这样，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那种最后的改造。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家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是在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过程中的改造。党当时估计，再有三年五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至于最后的改造，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9月，毛泽东在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确定和粮棉统购统销的实行，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程。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1954年1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这两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利润都实行当时所说的“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这就使这些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

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拿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公私合营优越性是很明显的。合营工厂私股分得的红利大多数也比私营时期的利润多。这些情况促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形成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形势。

公私合营一般是从规模较大的企业开始。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大企业为数不多，绝大多数是分散落后的中小型企业。稍具规模的企业实行合营后，剩下还有约占私营工业总产值一半的十二万几千户中小企业，由于机器简陋，工序不全，加上原有的经济联系被打乱，在生产上处境更加困难，也纷纷要求公私合营。国家为保证重点建设，不可能分散力量向这么多小企业投入资金和干部。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12月，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个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把个别合营和按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1955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市一部分行业先后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和急促完成

1955年夏季，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在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以前，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的说来，是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的。在这场争论之后，由于对所谓“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的尖锐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伐猛烈地加快了，其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也连带着猛烈地加快了。

1955年春季，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计划，要求到1956年春季，农业合作社从经过整顿保留的六十五万个，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计划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京，对农村粮食形势和农业合作化发展作出了新的观察和判断，主张修改计划，加快发展，从六十五万个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个，即翻一番。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他认为：合作化运动应该

与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干部领导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需要逐步提高，要求不能过急；从1954年秋的十万个社到1955年春的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已经很快，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的任务很重，应该着重巩固现有的合作社，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基础。后来的实践表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毛泽东却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思想右了，是对合作化不积极。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包括自愿互利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有准备分步骤发展的方针，以增产为标准的方针等等）的许多论述是正确的，对我国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关系的分析等等也包含深刻的见解。但是，报告的主旨在于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右倾”。毛泽东认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却落后于群众，“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甚至说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这样，就把工作中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这类正常党内争论，夸大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使多年来形成的比较健康的党内民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现象。

毛泽东的报告一直传达到农村党支部，各地党组织纷纷检查“保守”，反对“右倾”，对合作化运动重新部署，农业合作社迅猛发展。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性质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强调“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一百零四条按语，其中有怎样办好合作社的具体经验的总结，有关于农村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妇女青年工作的许多正确意见，还有“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勤俭经营“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这样一些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重要论述。但是，序言和有些按语不但对合作化中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给予更尖

锐的批评，而且认为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中也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使“反右倾保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猛烈浪潮。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虽然着重批评右倾保守，认为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但是，他仍然肯定要准备用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仍然肯定要采取逐步前进、由低到高的办法，仍然肯定要按照实际情况规定发展合作社的控制数字。他提出的预计是：到1958年春有一半农户入初级社，1960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以后再逐步分期分批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然而，由于猛烈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所形成的政治压力，使这样的预计实际上不再成为指导运动的方针。而对实际出现的完全不顾这些方针和计划的盲目发展，领导不但没有加以纠正，反而兴高采烈地加以赞扬。这样，加速合作化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像海啸一般席卷整个中国的大地，几个月的功夫，合作化就骤然完成了。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就是说，原来预计十八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仅仅用了七年时间，提前十一年完成了。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猛烈发展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也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1955年11月中央拟定的已经大大加速的计划，提出的要求仍然是用两年时间分期分批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可是，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包括部分企业职工，天天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政府只好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的办法，即先承认公私合营，以后再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和人事调整。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手工业的合作化，在总路线提出以后，原来也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农业合作化的猛烈发展，也影响了手工业的合作化速度。

1955 年底提出要求：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采取手工业全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 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1955 年下半年到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显然过于迅猛，这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于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八、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完成

1956 年在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不再是占有和经营他们原有的私人企业的老板，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受为企业的职员；他们仍然领取定息，但是定息已同他们原有企业的利润没有联系，而是根据核定的私股资产（当时估算全国资本家所有资产共二十四亿两千万元），按固定利率（年息5%，略高于当时银行利率）提取定息，领取定息的时期定为七年（后来延长到十年）。这样一来，加上原来的国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这种情况反映到国民收入的结构上，1956 年同 1952 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 19.1%上升到 32.2%，合作社经济由 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 0.7%上升到 7.3%，个体经济由 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 年同1952 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 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 26.9%上升到 32.5%，资本主义工业由 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 42.6%上升到 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就是说，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

经济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本来就是上层建筑中保障我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它们就担负起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任务。

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和遗留问题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规定的任务，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1956年已经基本上完成。就这一方面而言，过渡时期已经完结，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实现。按我们现在的分析，这个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建设社会主义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党和人民作巨大的努力，甚至还会有原来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艰难和曲折，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使后期的改造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从党的领导的角度来总结，有深刻的教训应该吸取。主要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骄傲了，不像过去那样谨慎，那样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和尊重党内民主了。但是，有两条基本的事实必须看到：在几亿人口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深刻的革命变革，第一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第二是在得到人民群众基本上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很难做到而确实做到了的事情。

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往往在一个时期引起生产力的破坏。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也出现过一部分群众一时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总的说来，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保证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粮食产量来说，合作化过程中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在合作化过程中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十分显著。农业的改造，要动摇农民对土地、耕畜的深厚的私有观念和各家各户自主经营的习惯，自然会引起相当的抵触。但是，党用事实向农民群众表明，合作化可以使占农村人口多数的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各种

困难的贫农下中农得到利益，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合作化是拥护的或者是随大流的。比较富裕的农民在党的自愿互利政策没有得到很好执行的情况下会吃一点亏，党注意纠正这些偏差，并且向他们表明，合作社生产的发展也会使他们得到利益，因此，大势所趋，他们也是可以拥护或者随大流的。私营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工人阶级当然极力拥护。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他们为形势所迫，又于心不甘。但是，党不采取斗争地主的办法对待民族资本家，还继续支付定息，给予工作，保留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因此他们也是可以接受或者随大流的。有一位被称为“纺织大王”的资本家，当被问到作为资本家为什么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他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他历述作为一个中国民族资本家，他如何一直梦想兴办工业，救国图强，可是在旧社会受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于政府贷款、委托加工和收购产品，才使企业摆脱窘迫局面，盈利逐年增加，然后说：“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能有今天？”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① 从这一席话，可以生动地看到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政策的根据和效果。总之，在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做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个事实说明，总的看来，党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是成功的。

马克思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过进行这种和平赎买的政策和方案的轮廓。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列宁的方案没有能够很好实施。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保持联盟。这种历史背景加上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实行了

① 1956年1月21日《新华社新闻稿》。

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还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在农业合作化中，也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由于这些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目标模式方面，虽然还是以苏联为榜样，在具体道路上却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遗留下许多问题，需要党仔细地调查研究，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进行有系统的调整，来逐步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有几个大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但是，有没有必要使它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可不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一个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改造的完成而扩大到全部经济生活，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还需要发挥，如何发挥？还有一个是国营经济如何发挥中央、地方各级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需不需要划分层次，根据不同情况发挥不同层次的积极性？还是公有范围越大、经营越集中越好？这些问题在改造过程中大都或多或少有所觉察，可是，来不及反复研究和慎重决策，就在改造高潮中被掩盖起来。这些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急过粗带来的其他问题，只要冷静下来，实事求是，认真调查和调整，是可以在实践中依靠经验的积累逐步加以解决的。客观形势要求党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调整和改革。

“一五”计划建设的成就

在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接下来的1957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

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

人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

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10%，平均每年增长25.4%，消费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9%。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说，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进。“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农业的增长，跟世界相比速度不低，但是跟同一时期我国工业增长速度相比，就相对落后了。粮棉增产的速度没有达到人们乐观的期望，紧张局势一直未能显著缓解，要求农业增产的压力仍然很大。

五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变化很大，1950年主要是靠工商和农业税收，占75%，国营企事业收入只占13.4%，其中工业收入仅占6.8%，1957年各项税收的比重下降为49.9%，国营企事业收入则上升为46.5%，其中工业企业收入上升为19.1%。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这一方面的任务还需要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才能达到原来预计的目标。在总路线载入宪法的时候，党曾经指出，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只是打下一个基础。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基本完成，使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体任务更加显得紧迫。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继续完善，尤其需要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才算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客观形势要求党这时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上把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第　七　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八大和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载入党的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载入党的史册。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

但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全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在长期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党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到七大的时候，总结历史经验，从理论、路线，到各项方针、政策，到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和有利情况的估计和对策，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认识，并且在党的高级领导层中取得了比较牢固的共识。因此，如何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如何开始新中国的建设，党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的，从而井然有序地领导了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远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艰难和复杂得多。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党号召过“学习苏联”。这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并且有收到积极效果的一面。但是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党没有可能事先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能不能比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少经历一些大的曲折？党希望做到这一点。后来的历史表明，我们未能避免大的曲折，我们对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问题只能在探索的实践中去解决。而在1956年，这一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国内形势的变化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应该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全党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是随着革命战争结束而开始的。但是，那时还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需要同时进行。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加紧步伐的时候，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层事实上不能不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社会改革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工作中心，就应该进一步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方面来。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在各方面都还不完善，需要稳定、巩固、调整和改革，而这种调整和改革，应该紧紧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并且完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要来进行。

国际形势的变化是：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揭露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时，对斯大林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极大的震动。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在4月和12月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党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重要的意义。

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取得初步的成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为八大的召开作了准备。

“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

1956年初，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毛泽东同一些地方领导人酝酿形成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和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好、又快、又省的方针。这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形势下提出的，反映了党把注意力转移到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上来的意向，反映了党和人民希望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把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一些的愿望。特别是日内瓦会议实现印度支那停战以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党预计可能有一段国际和平时期，想利用这一时机抓紧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但是，在“反右倾保守”的浪潮下，对经济建设的规律了解和尊重不够，对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要求过大过高，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党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且着手加以纠正。周恩来最初也赞同加快发展的战略，但是面对由于不断提高指标而加剧的财政和物资的紧张状态，1956年2月他在国务院会议上及时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① 按照这样的思路，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6月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接受和通过了由李先念报告提出的这个方针。毛泽东后来在1957年4月时说：“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十大关系”②。

中央政治局先后找三十四个经济部门的同志来汇报、讨论问题，是为八大的召开作准备。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4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得到政治局赞同后，5月2日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② 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谈话。

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这个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经济、研究我国建设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① 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十大关系”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肯定过去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第四、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十大关系”后五条，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确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宣布了这一点。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5月26日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央向科学文化界阐明了党的这条方针。在这之前，中央在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经过建国后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742、720—721页。

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②。这个估计和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基础。周恩来还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③。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讲话，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组织领导下，有数百名著名科学家参加，历时数月，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且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把规划付之实施。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中讨论党和非党的关系，提出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宣布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关于对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报告在肯定过去镇反、肃反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做出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估计，提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和机关内部清查反革命分子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周恩来7月在上海市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④ 在处理党内矛盾方面，《论十大关系》重申延安以来实行的“惩前毖

---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

③ 同上书，第185页。

④ 同上书，第207页。

后，治病救人”方针，不赞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这年6月，党还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宣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倡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利益第三次携手合作。

所有这些，展现了党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多方探索的生动景象。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五十多个外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这次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不仅系统地论述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而且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战略问题。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

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 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党确定自己的正确路线的政治基础。关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法没有全面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但是，上述提法的着眼点，在于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的报告就近年来党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强调地提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决议指出：如果对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地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不估计到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大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要求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粮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①。这个意见受到大会的重视，为大会决议所采纳。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

在国家工作方面，大会要求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要求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他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它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大会经过反复的酝酿和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出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九十七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六名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七大时选出的书记四人，增加比较年轻的两人。八大继承了七大选出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并有新的成分加入，为以后的新老交替作了准备。在讨论中央委员候选名单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还讲到这个名单的结构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

①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中成长的干部，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一款。这是因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他认为让他摆脱第一线的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不担任国家主席，不担任党的主席，仍然可以以党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必要的时候，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

新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会议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但是事实上后来除了1958 年5 月召开了八大第二次会议以外，八大再没有举行过其他的会议。

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设想（包括八大一次会议以后不久进一步提出的一些新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许多未曾预料到的复杂考验还在前头。但是，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毕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的意义。

八大以后的进一步探索

八大一次会议以后，进一步探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按照八大确定的方针，编制1957 年建设计划和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一个是如何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1956 年初经济建设上的冒进势头虽然基本上得到遏制，但是并没有完全遏制住，在一些方面还是冒了。到年终决算，出现了1953 年以来的第一个财政赤字年度。尤其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编制1957 年计

划的时候，从各部门、各地方汇集起来的指标，仍然大大高于保证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实际可能。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论。毛泽东强调1956年财政开支和基本建设投资中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指头”，主张1957年的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周恩来和许多人则主张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1957年预算指标应该压低一点。在这前后，陈云反复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1956年11月10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讨论1957年的计划和预算时，周恩来提出1957年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会上大家都赞成这个方针。11月15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实际上，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不过当时没有提出批评，而且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在1957年实行这个方针。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民主讨论的作风的。这样制定的1957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是做了个妥协。这就成为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由来之一。

按照八大确定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调整经济关系，也有初步进展和新思路的探索。还在工商业和手工业全面改造之后不久，党就一再强调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个体手工业、小商店、小摊贩、小挑贩，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并且已经提出要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放宽市场管理，允许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选购和自由推销，允许完成统购和订购任务以后的一部分农产品进入自由市场。八大以后，自由市场有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以上海为例，9月份有个体手工业户1661户，10月份即增长到2885户，到年底增长到4236户。针对那种认为个体户增长违背合作化方向的思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人民的需要，增加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城市的就业人数，对国家有利无害[①]。在个体户增加的背景下，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手工业个体户和

① 《怎样对待手工业个体户》，《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1日。

手工工场，人们称它为“地下工厂”，还出现了“地下商店”。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这类事物，引起原工商业者和社会的注意。1956年12月毛泽东就这些问题同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多次谈话、讨论，提出这样的意见：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①]。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②]。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③]。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即进一步考虑：一定限度的资本主义私人经营在国家领导下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还表示赞成把大批同资本家一起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小业主和工商业独立劳动者从“资本家”队伍中划分出来，取消给他们的定息（这些人的定息数量微不足道），让他们加入工会的设想。这些考虑和设想虽然后来长时期被搁置起来，但是的确应该看作是根据中国国情探索自己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可贵的思想。

关于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的调整，八大一次会议即已指出，一部分合作社成立比较急促，需要处理许多遗留问题，调整现有组织形式，纠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而忽视社员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的偏向，要求合作社在产品分配方面实行“少扣多分”，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强调必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后来又决定增加社员的自留地。1957年9月中

---

① 毛泽东1956年12月7日的谈话。

② 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③ 周恩来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

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三个指示。其中提出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一村一社，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十年内不予变动；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队对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取代“干活一窝蜂”等浪费劳动力的做法。这些指示是邓子恢主持制定的，是朝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的尝试。

1957年秋天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它当作全党整风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则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的事情。

二、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全党整风实际上也是八大提出来的。联系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的伟大的建设工作做好。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当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①]为鉴戒，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决定明年开展全党整风。现在就要进行酝酿和准备。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于国内的敌我矛

① 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同年10月到11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

盾已经基本解决(还没有完全解决),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这些矛盾,通过或者联系到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即人民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解决这样的矛盾,从思想教育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要教育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是要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前一方面是首要的方面,全党整风就是着重从这一方面来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并且学习在由革命转入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

1956 年秋冬,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国际上东欧的波匈事件不能不在我国发生影响,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这年下半年在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 年9 月到1957 年3 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有多起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在农村中,夏收以来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公开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还有一些错误议论。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陷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

1957 年2 月,毛泽东在有一千八百多人出席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

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而同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遇到矛盾便把它当作外来的敌我矛盾的理论区别开来。他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如何看待肃反的问题、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以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明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1957年3月中央宣传部召开有党内外思想工作者八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进一步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绝大多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但还是爱国的；抱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知识分子改造和同工农群众结合的必要，并且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这两篇讲话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进行了传达和讨论，引起热烈的反响。传达和讨论这两篇讲话的进程，也就是揭露和检查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进程，从共产党方面来说，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中央连续发出一系列党内指示，党报公开发表一系列社论，对这一进程加强督促。毛泽东、刘少奇分途南下，沿路作报告，要求党的干部充分认识由革命到建设的深刻转变，充分理解采取党现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

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①。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的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明：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的提出，整风和通过整风想要造成的政治局面的提出，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对于党的事业同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

整风指示发布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这是在讨论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形成的简化词语）。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十三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党衷心欢迎广大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5月间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展开人民内部矛盾

① 毛泽东1957年3月写的讲话提纲。

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这些党内指示说明，党确实诚心诚意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5月16日中央发出的党内指示，在强调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恳、正确的同时，指出应当注意最近一些天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中央当时决定，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原样地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就是说，党从原来不主张“大鸣”、“大放”，改变为主张“大鸣”、“大放”，叫做从右派手中把这个武器接过来。5月19日北京有的高等学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中央当时认为大字报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利多害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迅速蔓延。这样，就出现了和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被认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就是说，在共产党和共青团内也要揭露和批判大批右派分子。从夏季到秋季，党用很大的力量来指导和扩展反右派运动。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的关系，提出了整个整风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的安排。9月到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主要也是讨论整风和反右运动。

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完全结束，是在1958年夏季。

反右扩大化的后果和影响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但是，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的设想本来是：批判右派，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留下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1957年6月29日中央指示，右派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这已经不是主要批判政治思潮，而是更多地着重于具体指名，但是人数还较有限制。仅仅过了十天，中央指示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8月要求运动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以后又提出向中小学教职工）展开，并且提出要深入“挖掘”右派。9月八届三中全会统计，已划右派六万余人，最后运动结束时，达

到五十五万。对右派性质的判定，7月11日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还是讲“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同时指出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经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过了不几天中央就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就从数量和性质两个方面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运动方法的采用，也是使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方向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来解决，不应该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由于反右扩大化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

整风开始的时候，中央反复强调不要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如此，在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的复杂局势下，由于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形成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党的各级领导还是走上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的熟路，把历史转变时期新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这是建国以后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说明驾驭不熟悉的复杂政治局势的艰难和实现政治生活历史性转变的不易。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的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全会的小组讨论中，不少同志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党的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不能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就改变八大的结论，不应当把一时激化的阶级斗争，当作长期的主要矛盾。另有一些同志则认为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解决，政

治和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仍将是长期的，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会议后期的讲话中，否定了前一种意见。

后来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

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那次会议并没有否认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而且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1957 年右派进攻的事实证明意识形态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确是没有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的完成而自然结束。但是怎样处理好这种斗争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党还缺乏经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经历复杂的考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前后约达二十年（1957－1976 年）之久的长时间中，我们党在这两大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歧途和曲折。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但是，1958 年提出"大跃进"，有当时历史发展的背景。首先是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党认

为这个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整风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毛泽东由此而更加相信1956 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1957 年9 月到10 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除了讨论整风反右以外，农村工作是又一个议题。听到会上有的地方领导人重提多快好省，毛泽东很兴奋。他在会上的讲话，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责1956 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会议通过并公布了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决定以讨论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1 月13 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提出"大跃进"的先声。1957 年11 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崇高的声誉。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这件事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以巨大鼓舞。苏联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 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八大二次会议

1958 年1 月和3 月，毛泽东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联系到1956 年经济工作估计和1957 年经济计划制定的争论，更加严厉地批判反冒进，批评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思

想，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7年整风反右，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固然可说是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反复强调的从革命转变到建设的正确战略思想的继续，但是这种转移同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结合在一起，同“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口号结合在一起，离开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不能不走偏方向。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学习要和独创相结合，批评过去八年经济工作（主要是重工业和计划工作）的教条主义，认为这是在外国经验的压力下，不能独立思想，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想，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而本来是应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完全抛弃这些经验，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八大的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是，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那时文化革命的含义是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还提出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这些解释来看，本来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

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加以在宣传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会议武断地认为1956年下半年的反冒进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的“马鞍形”，即1956年的高潮，1957年的低潮（实际上并不是低潮），1958年更大的高潮；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在会上作了检讨。会上还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这些批评的压力，大大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建议》，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会后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还增选了三名政治局委员。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

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

钢铁产量要当年翻番和人民公社的一哄而起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高估产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中央有关部门和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兴高采烈，对超乎寻常的大幅度增产的假象深信不疑，致使会议竟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6000—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10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三个月前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又普遍翻了一番。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前八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完成追加的钢铁产量当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估计约九千万）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乃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

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到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这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猛增54.8%，而农业由于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占用，总产值后来核实只比上年增长2.4%。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猛增87.7%，全国职工总数也比上年猛增2/3以上，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使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困难。

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七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如河北徐水县和山东范县，甚至打算试验两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提出“八包”，“十包”，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这些情况表明，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是有它的由来的。“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时候讲的这一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全党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大家都愿意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既然已经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这不只是哪一个人的愿望和情绪，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当时全党和全民族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情绪。应当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一些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只要党正确地领导和组织群众，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符合于实际的主观能动性，从一个历史阶段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快一些的。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反对冒进的同志）从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并且不辞劳苦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比如那些修得合乎需要和标准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备，等等。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普遍地办起了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巩固，终究为后来各地区工业的发展播下了种子。但是，经济建设有它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我们全党还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又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许多同志有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来进行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当他们转向领导经济的时候，很容易相信如果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经济建设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好。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内部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对于许多同志既是美好的回忆，又影响着他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由于反右倾而大大加快和迅速完成，许多同志只看到它的胜利而没有看到它的急促粗糙所遗留的许多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有待长期调整解决的问题，因而更加增强了靠反右倾、鼓干劲来加快建设和加速前进的自信心。群众运动中出现许多混乱和偏差，许多同志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但往往只是把它们看作形势发展的支流，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那么一股干劲，担心纠偏就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懂得只有正确地领导群众切实取得建设成果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做法，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终将真正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总之，在一连串胜利面前，在党的许多干部包括许多领导干部中间，谦虚谨慎被逐渐忘却，骄傲自满在逐步发展。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1956 年周恩来、陈云等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反急躁冒进的意见，毛泽东当时还能给予一定的尊重（或者妥协），而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认为事情的发展完全证明反冒进的错误和他原来想法的正确。自从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不同的意见难以提出了，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这样，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

四、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1958 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他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发展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人。这年 11 月毛泽东提议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有某些转变。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发展。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 年7 月庐山会议前期，八九个月的时间中，中央领导全党为此进行了初步的努力。

人民公社的整顿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有中央和地方的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

东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他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大有要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认为，需要对这些同志做说服工作，需要让大家冷静下来，“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①]。1958年11月到12月之间，又在武昌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为接着在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作了准备。经过这些会议的多次讨论，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兴起给予极高评价，同时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企图澄清思想上和工作中已经产生的混乱。

针对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衷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衷于发展生产力，大力实现工业化，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只能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倾向，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针对那种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动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

① 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

《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由于仍未摆脱高估产的迷误，会议正式宣布1958年粮、棉、钢、煤都将比1957年增产一倍或一倍以上，粮达到7500亿斤，钢达到1100万吨。因此，虽然讲了要“压缩空气”，会议通过的1959年计划，除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的500亿元降为360亿元，钢产量由原定的2700－3000万吨降为1800－2000万吨外，粮食提高到10500亿斤，其他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要求在1959年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这个决议通过后，陈云认为1959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不必在公报中公布，但是这个意见没有能正式提出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是刹住了，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加上为了完成由高估产而来的高征购任务，又不适当地进行了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因此，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还没有真正缓解。毛泽东从视察中了解到这种情况，认为要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为此，1959年2、3月间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不了解公社的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公社一成立，就取消了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强调，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即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否定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尚且不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对于农民的劳动成果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一个批语，进一步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在内部还讲了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

为了纠正上述两种倾向，毛泽东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郑州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接着在3、4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上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两个文件都规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生产大队，大体相当原高级社的范围）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目前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后一个文件进一步规定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有的地方叫生产队，大体相当原来的初级社），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并且决定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帐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帐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毛泽东强调：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否则，群众不能解怨气，干部也会被毁掉。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中央督促各地召开省、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包括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以至一部分社员，使中央的精神和政策同最基层的干部和群众见面，以求充分地揭露矛盾，统一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去。毛泽东几次就召开这些干部会议给各级干部写信，同他们讨论问题和办法，并且反复强调："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①

"大跃进"指标和生产安排的调整

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肯定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

① 《党内通信》，1959年3月15日、17日。

社的规定，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有的中央委员曾提出利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公开修改一些过去宣布过的高指标，未能得到多数中委的支持。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除对基本建设投资又作调整，由360亿元降为260—280亿元外，其他高指标大都未变。钢仍为1800万吨，只是内部说明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1958年的1100万吨钢中好钢为800万吨。

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这次大会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选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毛泽东在1956年、1957年、1958年初和1958年底多次向党内外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想退居领导工作的第二线。由于大跃进以来的新形势，他在七中全会上又强调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他要在中央亲自挂帅，所以实际上仍然处在第一线。

七中全会前后，毛泽东觉察到干部中存在着向上级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的问题。他在七中全会上讲到要学习忠贞而敢谏的明朝官员海瑞，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那样的勇气。4月底，他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着重提出讲真话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①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中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首先是农业生产情况很不好。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2页。

年减少20%(这与1958年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因而一度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有关)。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问题也很多。钢铁生产上不去。1959年头四个月按计划应该生产钢600万吨,实际只完成336万吨。组织"钢铁战役",突击生产,也无济于事。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针对这种形势,陈云提出:粮食要省吃俭用,控制销量;猪鸡鸭鱼的饲养,要实行国营、集体、个人三条腿走路;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认真精简去年多招收的工人,压缩购买力。接着,他受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委托,落实钢铁生产指标。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5月中旬,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应降为1300万吨。他还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①

陈云的意见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5、6月间,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当年钢产量指标由1800万吨(1650万吨)降为1300万吨;农村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中央还明确指出,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

7月初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在准备和开始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明确肯定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进一步提出,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今后要倒过来,按农、轻、重安排,就是要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首先要把农业搞好。他还指出: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

---

①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130页。

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的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重要的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完全肯定。所以纠“左”的努力，虽然认识逐步有所深入，总的都是在保持1958年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而且沿着反右派扩大化以后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路，认为如果怀疑或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就是“观潮派”和“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中央已经确定的纠“左”措施，也远未完全落实。因而“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期发生重大反复，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五、“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的错误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十八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具体政策。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分六个大组座谈讨论。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有的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感到沉痛，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另外不少与会者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彭德怀的一封信

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他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

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提到纠“左”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小组讨论中，有些人说这封信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有埋怨泄气情绪，甚至认为这封信实际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也有许多人表示基本同意信的内容，认为提出意见是好的，但不赞成信中的有些说法（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还提到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著追求。他认为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决定，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到1959年5月提出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已经“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①]。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

① 《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一个调整指标的决定，大家照此去工作，形势就会好转。而彭德怀等却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记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他认为彭德怀这个“海瑞”是“右派海瑞”，是“居心不良”，彭、黄、张、周是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党内外国内外议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包括机关工作人员、党校学员、解放军指战员、党外人士和一些被划为右派的代表人物）对当前形势的忧虑以及对领导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评，其中也有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意见。毛泽东把这些批评和意见当作对党的攻击，并且把它们同庐山会议上中央领导层内部的争论联系起来，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于是得出结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在这种错误判断下，他决心发起反击。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7月26日，他又在一位党的工作人员向中央反映意见、批评去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信上写了一段批语，认为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

由于对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由于毛泽东在全党长期享有崇高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少数人的推波助澜，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会议的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在大会或小会上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彭、张历史上的是非，“新帐老帐一起算”。林彪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给

批判定下最高调子。一大堆政治帽子，如“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等，都提了出来。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黄、张、周组成“反党集团”，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出于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威信的考虑，彭德怀等承认和检讨了“错误”。毛泽东对此表示欢迎。

“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

在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刘少奇曾主张把反右倾的决议只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这个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在党中央提出来。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11月中央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因而没有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批判了大批农民党员和党外群众，不过没有戴帽子。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

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① 这个论断，把庐山会议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这就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申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与此相联系，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发展。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不久前已被认识到的问题，仿佛又不成为问题了。比如，大跃进的一个主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反右倾中，把这种正确认识当作“谬论”加以批判，硬说“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紧张状态，视而不见，硬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1959 年上半年降低一些过高指标的正确措施，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小马鞍形”。在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中心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庐山会议确定 1959 年钢指标调低为 1200 万吨。作为政治任务，靠拼设备、拼资源的蛮干，到年底完成 1387 万吨。1960 年要求实现“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钢指标定为 1840 万吨，也不顾一切地“保住”了。还提出三年、五年、八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为促进这种过渡，用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大办”各种社有经济的做法又在盛行。农村公共食堂，作为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要求全国大办，不要例外。城市人民公社也在许多中小城市挂起了牌子。总之，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

---

①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 年 8 月 16 日。

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到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这当然为一大批工矿的建设打了基础，但是，只有经过调整才能形成可靠的生产能力。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22.8%。再次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大量职工和投资，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5000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1/3。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六、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

受到严重困难的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两件事标志着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大跃进”和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停止了。全党上下跟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党接续从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努力，接续八大一次会议前后的努力，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新的经验。

调查研究和农村政策的调整

从1960年10月开始，党中央已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但是，郑重地、系统地提出这一任务，则是以发出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上述《紧急指示信》为开端。《紧急指示信》的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中央和毛主席从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的“共产”风。认为自那时以来，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基本上没有再犯，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不彻底，去年冬季以后又刮了起来，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一直没有纠正，继续刮，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加上“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这是针对各种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试点和计划而提出的）；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加上“至少二十年不变”）；恢复农村集市，等等。当时还强调：只要坚持三级所有，坚持部分供给制，坚持办好食堂，“就不会犯原则错误”。

《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全党动员和组织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入农村，

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而奋斗。中央还连续批转各地贯彻执行指示信情况的报告，以督促这一工作的进行。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① 并且以他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可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作为他的错误之一例（他还在《十年总结》中说明他在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上同意了过高的钢指标，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错误）。毛泽东在党内作自我批评，希望推动广大干部认识："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②

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附有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还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实际上是向全

① 中央1960年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

② 中央1960年11月15日转发湖北省委报告的批示。

党领导干部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以过去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作为真理的标准，这就为根据实践检验来纠正过去决定的错误打开了道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是这段时间实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发生重要转变的思想前提。

全会以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下去。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为系统地解决包括这两大问题在内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毛泽东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经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复讨论和试点，做了几次重大修改。先是在6月发出试行的修正草案中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而这两点直到《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初稿都还申明是必须坚持的，取消或建议取消公共食堂还曾经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大罪状。9月毛泽东又根据几个省的意见，提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称生产队，原来的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① 这就表明，调整人民公社政策的工作，不仅是接续郑州会议以来的努力，而且追溯到高级合作化，接续了八大一次会议前后调整农业合作社内部关系的努力。最后修订的农业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这个条例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一些根本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遏制“共产”风再起方面，一

① 毛泽东1961年9月29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信。

直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思想路线的初步转变和农村政策的逐步调整，对过去被批判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的工作提上日程。1961年6月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确规定：过去批评和处理得正确的，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进行的批判，应该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还应该纠正。甄别工作实际上是为了消除“反右倾”斗争的消极影响，调整党内政治关系，调整党同受过错误批判的群众的政治关系。

在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的同时，党中央还发布并要求试行按同样精神制定的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商业四十条。

工　业　的　调　整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时候提出来，经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工业的调整起初进行得成效不大。因为原来的设想，是维持1960年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已经达到的产量指标，在这个基础上调整，1961年的计划指标不再提高，也不降低。所以，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的1961年计划数字，钢为1900万吨，与1960年大体持平，略高一点；粮为4100亿斤，比当时估计的1960年产量3700亿斤增加10.8%。由于对农业实际产量的估计和可能增产的期望过高，就下不了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然而半年执行的结果，钢和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产量水平大幅度地跌落下来。这时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努力查清几年来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1958年不是庐山会议“核实”的5000亿斤，而是4000亿斤；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亿斤，而是3400亿斤；1960年不是估计的3700亿斤，而是2870亿斤；1961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160亿斤。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问题困难的症结也就完全暴露出来，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1961年计划不可能继续维持。

1961年9月，经过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

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在今后三年内，执行八字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会后，经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1961年计划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为87亿元，钢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当年年底计划执行的结果，与这些指标大体相符，粮食达到2950亿斤，比1960年略有回升。

工业调整的另一方面是整顿企业秩序。“大跃进”给许多企业带来不少问题：管理工作混乱，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废弛，设备损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工资奖金存在平均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整顿工业企业，要治乱。在他主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派出十一个工作组到许多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这个基础上起草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9月由中央发布试行。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从而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条例还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作了详细规定。由于这个条例的实行，国营企业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对于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科学、教育、文化政策的调整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科学界意见，提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聂荣臻还就其中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向中央专门写了请示报告。7月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发布试行。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

称高教六十条），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9月发布试行（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则是这时起草和讨论，1963年3月中央批发）。在周恩来督促下，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8月还提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1962年4月中央批发）。

这些条例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大跃进”以来，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许多过火的和错误的批判。有些文教单位的党员干部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既然绝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他们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这一情况的材料上批示：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团体、新闻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和讨论，“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①。按照这个精神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方向的努力，被“反右倾”斗争打断了。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执行，则是这种努力的继续。中央在批转科学十四条的时候指出：近几年来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并且要求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对反右派斗争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批判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对的，当然仍需肯定；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

这些条例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同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密切相关。针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出现的问题，这些条例分别地论述和规定了执行双百方针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要求在批评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的时候，要严格划分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界限，严格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允许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更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在学术、艺术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

① 1958年12月22日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批示。

这些条例还针对科学、教育、文化部门中出现的生产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的混乱现象和业务工作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明确规定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保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保证科研人员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学校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文艺为政治服务不能理解得过分狭隘，文艺不仅应该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而且也应该使他们得到正当的艺术享受和健康的娱乐，凡能满足以上任何一种要求的作品，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从总结经验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心情已经较为舒畅，专心从事业务工作的条件已经大体具备。当时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这句话代表了他们拥护这些条例，希望政策不要再变的殷切而又隐含着担忧的心情。

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势必引导到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重新作出科学判断。这些条例还没有涉及这个根本问题，工业七十条接触到这个问题，重申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没有涉及科学、教育、文化机关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是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讲话特别强调，经过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八年、十年、十二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随后周恩来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宣布这一科学论断。政府工作报告是经党中央批准了的。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1956年所

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七　千　人　大　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的。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大会的前一阶段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这个草稿未经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就直接提交会议进行评论，征集修改意见，以便更加直接和广泛地集中大家的智慧，把报告修改好。经过与会者反复的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定稿，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

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会议。先由邓小平主持、继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会议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在列举了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之后，报告着重指出工作中发生了如下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一、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

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

报告分析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报告强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对于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说明。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他说了一些重要的看法。主要是：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个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主持的这个会议上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开始的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

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并且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朱德在山东组的全体会上，陈云在大会结束后陕西省的全体干部会上讲了话，重点是讲党内民主生活。有几个省，对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工作中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批评。

这次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会议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对于“反右倾”斗争，只是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而对彭德怀，虽然不再讲他庐山信件的错误，却仍不予平反，理由是他有一个“反党集团”，他又有“国际背景”，但实际上所谓“反党集团”是无中生有的，说他有国外某种势力的支持，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样就不可能彻底改正并且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林彪在大会的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原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林彪离开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原则，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

进一步的调整和探索

七千人大会以后，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方面从下到上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大胆探索。

七千人大会上估计：经济上最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会后，首先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1962年2月刘少奇召开政

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南海西楼会议),指出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在会上讲了系统的意见。根据刘少奇的提议,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长篇讲话。他指出,农业恢复的速度,只能"争取快,准备慢"。现在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七千亿斤粮食、七千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千万吨的主观设想来布置的,因而大大超出现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所能负担的限度。他主张规划国民经济要安排一个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要五年。在恢复阶段中,第一位的问题是增加农业生产,供应吃、穿。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坚决降下来,将来再上。还要大规模减少城市人口,并且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陈云的讲话得到会议的热烈赞同,也得到中央各单位领导人的完全同意,经中央批发,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党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5月,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主要是:

第一,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1961年根据中央的部署已经精简职工八百多万,减少城市人口一千万。1962年要继续精简职工一千万,减少城市人口一千二百万。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两年半内共精简职工约两千万,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周恩来当时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同1960年相比,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亿元,积累率由39.6%降为10.4%。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第三,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经过调整,全国工业企业数1962年比1959年减少38%。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的生产指标。同1960年相比,1962年工业总产值下降47%,其中重工业产值下降57%。钢由1866万吨降为667万吨,对采掘、石油、化工以及支农产品等薄弱环节则予以加强。

第四,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

层的领导力量。

由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首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这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农业总产值也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其次是1962年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亿元，结束了四年连续赤字的状况。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约35%。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上升，这年同上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棉布增加2.5尺。这时，经济困难只是刚刚迈过沟底。总的说来，工农业的生产水平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很低的，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还有待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努力。

在调整政治关系方面，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以后，刘少奇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接着举行了已经推迟一年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刘少奇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周恩来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此后中央还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检查纠正近几年来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强调必须正确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工作等各方面的问题，以加强全国各阶层和各民族的团结。

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的工作，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以后即已陆续展开，但是进展很不平衡。有的地区和单位重视不够，执行不力。鉴于这种情况，1962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随后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对过去搞错了或者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这样，甄别平反工作才迅速全面推开。到1962年8月，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

关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1959年国庆前夕已经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始分批进行这一工作，到1962年大部分都已摘去帽子。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单是摘去帽子并没有从根本上澄清是非，解决问题。但是，摘去帽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安排有所改善。1962年7月中央统战部提出“右派分子本人或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应该进行甄别”，“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这个意见，当时中央没有同意。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以后，农民积极性有较大提高，同时，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又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了起来。自从合作化以来，每当党提出调整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总有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的情况出现。虽然屡次制止，但一有机会又重新出现。这个事实说明，作为集体经济内部一个层次的家庭经营，在许多方面适合中国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状况，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民的需要。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些形式加以支持和引导，在保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邓子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的做法。他认为，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有严格的责任制，而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联系是很难包的。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邓小平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和在接见共青团干部的时候，都讲到农村广大地区出现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且引用了刘伯承常说的那个著名的民间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①]。他声明，这只是初步意见，可能不算数，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七、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

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中这十年，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初几年，由于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停战，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党希望发展这种形势，并且希望抓住时机，加快国内经济建设。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的决议，确定了党所主张的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方针。1957年初毛泽东分析，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以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党主张继续加强同它们的团结和合作。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争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党主张积极支援它们并且大力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关系。对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党认为它们也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后来毛泽东称这一部分国家为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国家为第一中间地带），因而也要争取同它们发展关系。对美国，党认为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它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威胁，一方面仍然要争取同它和平共处，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上述四种力量的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分化和改组。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和紧张局势中，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是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当时党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重要因素。

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继续迅猛向前发展。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英法侵略的斗争，阿尔及利亚

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古巴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所有各种民族解放斗争，中国都给予热情的声援。十年间，又有大批亚非国家同中国建交，拉丁美洲的古巴也是这个时期同中国建交的。此外，中日之间通过民间渠道，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发展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1964 年中法建交，则是中国在亚非拉以外地区进一步打开外交局面的一个重大成果。

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原则，通过互谅互让的平等协商，从1960 年1 月到1963 年3 月，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五国签订协定或条约，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大文明古国，两国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一直相互同情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在国际斗争中积极合作，并且共同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极其希望维护和发展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在1959 年西藏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被迅速平息以后，印度当局一些人对我国西藏少数人的民族分裂活动采取或明或暗的支持态度，给中印关系投下阴影。中印边界纠纷渐趋尖锐。

中印之间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只存在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印度政府主张的边界线大大超过它原来实际管辖的范围，把传统习惯线以北一直由中国管辖的大片领土划归印度。中国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分歧，在此以前，双方维持边界现状。印度政府拒绝谈判。1959 年8 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1959 年11 月7 日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印方拒绝。1962 年10 月17 日，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收复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为了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于11 月21 日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且自12 月1 日起，将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 年11 月7 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二十公里。接着，又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军，归还所有缴获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这些行动证明中国力求控制并平息边界冲突，以两国人民友好的大局为重。但是在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边界挑衅重起的威胁仍然存在。

中　美　关　系

美国在这十年中对中国仍然抱公开敌视的态度。有两个问题最尖锐：一是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一是美国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美国还多次侵入我国领空。1955 年万隆会议以后，由于周恩来声明而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使一大批受到美国政府阻挠的中国留美学者得以回到祖国，为祖国人民服务。但是在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承担不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中国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当局谈判，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实现祖国统一，但是这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中美之间关于相互放弃使用武力的外交谈判，必须导致美国在台湾地区的武力威胁的解除，中国决不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由于中国一切合情合理的建议都遭到美国顽固地拒绝，会谈到1957 年底中断。为了打击国民党部队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的前沿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 年 8 月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急忙增兵台湾海峡，并且派舰队为国民党舰队护航，侵入中国领海。中国对此向美国提出多次严重警告，同时重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争端的愿望。9 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美国企图用“让出”金门、马祖，换取中国同意对台湾和澎湖不使用武力，实际仍然是要搞“两个中国”。这不但是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的，台湾当局对此也十分不满。考虑到在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同国民党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中国政府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10 月 6 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没有美国护航的条件下，暂时停止炮击金门。10 月25 日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机场、码头，以利金门诸岛得到充分供应；逢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是台湾方面的船只、飞机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同时，劝告国民党当局不要过于依人篱下，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僵局，一直延续多年。

在印度支那半岛，1954年日内瓦协议后实现停战，以北纬十七度线为界，越南北方归越南民主共和国管辖。1955年法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美国乘机取代法国，用军事援助扶植亲美势力，特别是积极支持统治南越的吴庭艳集团，残酷迫害前抗战人员和其他爱国人士。1960年底，越南南方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反抗美吴集团的反动统治。1961年，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次年成立“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加强对越南南方人民的镇压，并且准备袭击越南北方。为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无偿提供大量军事装备。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1965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越北部的岘港登陆，准备随时北犯。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并且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开始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到1968年3月止总计达三十二万余人。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军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的领空和交通运输线。中国军队伤亡达五千多人，援越物资超过二百亿美元。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援下，越南人民艰苦奋战，使美国侵略军陷入毫无胜利希望的困境，不得不在1968年11月宣布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准备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

坚决抗击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独立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同武装威胁的一手相配合，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手，就是“和平取胜战略”。1959年毛泽东就已提出必须警惕美国用和平手段，通过渗透和腐蚀，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以后，毛泽东反复严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联系起来。防止和平演变，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如何正确地和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始终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需要认真地和妥善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中 苏 关 系

中国党一直主张中苏两党两国友好，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

义各国团结。1957 年毛泽东率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国党以内部商谈方式向苏共提出了对苏共二十大若干问题的不同看法。中苏两党协调立场，互有妥协，共同提出《莫斯科宣言》草案，获得会议通过。尽管如此，中苏矛盾后来还是逐步激化了。

中苏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有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个方面是苏联党当时的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使中国受他们的控制，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1958 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严辞拒绝。同一年，赫鲁晓夫深恐中国炮击金门妨碍“苏美合作”，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不能接受。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领导不问是非曲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1960 年 4 月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6 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策划几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会晤，对中国党横加指责。中国党不向压力屈服。苏联政府突然于 7 月照会中国，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在中国正经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极大地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

1960 年 10 月，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必要的妥协，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中国党希望在这个声明的基础上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是，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苏联报刊和在苏共影响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连篇累牍地发表决议、声明、文章，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中国党从 1962 年 12 月到 1963 年 3 月陆续发表七篇文章，答复和批评受苏共影响而指责中国的几个党。1963 年 7 月，邓小平率团去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在这前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

员的公开信》，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会谈没有结果。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且由此而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世界历史教训。这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苏共新领导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强行召集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中国和其他六国党拒不参加。此后，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中断。

回顾这场论战的历史，正如邓小平后来说的：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至于过去争论的另一个方面，邓小平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

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坚持各党各国的独立自主，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和霸权主义，以大无畏精神顶住这方面的巨大压力，表现了中国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性，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此而自豪，也赢得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人民的尊敬。

八、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经济上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在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分歧。在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些矛盾和分歧暂时潜伏下来。形势逐步好转以后，随着国内政策调整的进一步深入（从西楼会议到包产到户的建议），再加上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使党内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发生了新的波折。

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包产到户问题在内。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这个题目也就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279页。《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 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当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会议期间，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得到毛泽东同意，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对这部小说当然可以批评，但这样的政治批判是没有根据的）。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会后还撤销了由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验再一次被压下去。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工作就此结束。为被划作“右派分子”的人甄别的提议和试点，也被指责为“猖狂之至”给打回去了。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公报中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写上的。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样，就把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又一次严重地而又极端简单化地提到全党面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除了外部敌人的进犯和颠覆以外，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1957 年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困难和调整时期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和某些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极少数地主分子写“变天帐”等情况的出现，又证明了这一点。正视确实存在的阶级斗争事实，正确地加以处理，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保持清醒的认识还应该包括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不能因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把它扩大化和绝对化。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由此而断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那时估计是十几年）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在实践

和理论上失去了清醒。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又断言党内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一类斗争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八届十中全会把对彭、习、邓的批判当作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事情的性质完全判断错了；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并且说这个时期比几十年要更长，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这个论点更是武断的和不清醒的。后来这个论断被称作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全会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讲话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形势分析，同时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本来应该继续进行的纠“左”工作，刘少奇提议将这次全会批判彭、习、邓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高级干部，不向下传达。中央接受了这一提议。毛泽东也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关于商业工作等几个决定以及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修正草案，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这样，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矛盾暂时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

“四清”“五反”和政治思想领域的批判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在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但同时也规定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国有一大批农村社队进行了“四清”，少数城市展开了“五反”的试点。

1963年秋季以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内也已经出现修正主义。邓子恢等关于农村工作的正确主张，被概括为“三自一包”（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并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1962年春向中央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和缓；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向中央提建议，组织原则上更没有错，可是却被歪曲地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并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统战工作的许多正确建议，也被说成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他们都被作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严厉批判，王稼祥、李维汉被撤销职务。

“四清”、“五反”被视为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在运动中，一些试点单位总结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作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

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根据这些精神，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对后十条作了修改，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也就是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都撇到一边。刘少奇还提出要抽调大批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且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工作方法。中央连续转发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以及关于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社教运动的经验总结等后来都证明是错误的文件，强调进行夺权斗争。由于不少干部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中央强调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要求在地、县两级干部中批判怕“左”不怕右的思想。这样，在1964年下半年，“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影响下各地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但是，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毛泽东还在内部批示中提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

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

(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到1966年春,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四清",国营工业和交通系统开展运动的单位约占总数的3.9%,其他如财贸、文教等部门只在少数单位试点。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执行。不过,这次运动只在局部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进行的,还纠正过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全国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大的影响,社会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过火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早在1962年秋,江青就指责新编昆剧《李慧娘》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因为剧中有鬼魂出现),1963年5月江青组织文章在报纸上尖锐批评《李慧娘》和赞扬这个戏的文章,使文艺界感到气氛紧张。1963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还多次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文化部和文艺界立即组织整风学习。1964年6月,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文艺领域当时确实存在某些不健康现象。指出这方面的问题,通过正常的批评和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来加以解决,是必要的。但是毛泽东的两次批示未能实事求是地全面估计文艺界的形势,从而导致发动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来解决文艺问题。

在文化部门、文艺单位和全国报刊上，对《李慧娘》、《谢瑶环》等许多戏曲，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许多电影，对许多文艺理论观点，公开进行政治批判。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又扩大到学术界，从哲学，到经济学，到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全国报刊上受到猛烈批判。被批判的作品，许多是优秀的或者比较优秀的，有的有缺点，也并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被批判的理论观点，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可以讨论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被批判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党在文化、学术领域的重要领导干部和有成就的党员作家、学者。他们受到批判后，许多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或者不能继续进行正常的工作。

1964年春节，毛泽东召开座谈会，随后又作了多次批示和谈话，在教育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过火的主张。

随着文艺、学术、教育领域批判的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的、过火的批判，破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影响了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左”倾批判日益加剧的时候，邓小平曾试图加以控制。1965年3月，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纠正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试点中的“左”倾错误的会议上讲到文化思想领域当时的状况，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1965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也是企图稍许缓和文艺、学术界的紧张局势，把批评引上说理的轨道。但是，车没能刹住多久。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一个更大的错误批判的浪潮更猛烈地掀了起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3—1965 的三年经济调整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还没有成为支配全局的错误。全党和全国

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一种急躁的想法又开始抬头，认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又可以转向加快发展了。这年9月，中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工业结构不平衡、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尚未很好解决，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因此确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这就是说，在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到期后，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到1966年再开始。在三年过渡阶段中，调整工作是在国民经济大规模缩减、大幅度后退已经基本结束的条件下进行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是：农业生产要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要比1957年的水平提高50%左右；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要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原料、材料、燃料的节约要达到或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和目标，必须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进行了某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值得注意的有两项。一项是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把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专业性大公司，主要按经济规律而不是靠行政办法进行管理。1963年3月，在刘少奇提议下，试办了第一个托拉斯——中国烟草公司。以后又陆续试办了全国或省市的一二十个托拉斯，为日后的改革积累了一些经验。另一项是劳动制度改革的试验。早在1957年，刘少奇就提出过要少用固定工，多招亦工亦农的临时工。1958年，他进一步提出要有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和全日制的教育制度，另一种是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1964年刘少奇重提上述意见，得到中央肯定。此后，就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固定工和临时工并行的劳动制度，在一些单位试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制度。

1964年5月以后，在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大规模的三线（战略后

方)建设开始布局。为此,中央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这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又一次大调整。

从备战的角度考虑经济建设,不单是工业建设布局的调整。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特别着眼于发展农业和调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他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他还说:我们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最好的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①]。

从1961 年到1965 年,经过五年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工业内部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有所增强,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在1964 年底到1965 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 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庄严场合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

① 毛泽东1966 年3 月12 日给刘少奇的信。

九、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从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十年(1956—1966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

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开始的一年多,是继续执行和超额完成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间经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这五年,是以打破常规(也就是抛开原定计划)的三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由于“大跃进”失误而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为标志的,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困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1961—1962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然后是三年继续调整(1963—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66年开始)之间的过渡阶段。调整一共前后五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所取得的成就是明显的。

以1962年为基期(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退到最低点的年份),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9%。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三项增长率分别为10.9%、4.5%、18%。当然,由于1962年的基数太低,后三年经济增长带有恢复性质,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并不完全可比。

以1957年为基期,在1958年到1965年的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62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936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工业主要产品中,钢增长1.3倍,达到1223万吨;原煤增长77%,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度;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131万吨;合成氨增长8.7倍,达到148.4万吨。农业主要产品中,棉花达到209.8万吨,增长27.9%,粮食达到3891亿斤,接近1957年3901亿斤(原来说的3700亿斤不包括大豆)的水平。“大跃进”的大起大落使整个这段时间的增长率降低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农业较快得到恢复,有些方面还有所增长,工业各方面都有增长,有些方面增长额相当可观。

“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

工业的建设，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还有一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工业的地区布局和门类结构有了改善。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是1959年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而迅速建设起来的。一年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随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使我们能够自豪地宣布：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同石油工业发展相联系，石油化工这门新兴工业也逐步建设起来。

十年新修铁路近八千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等线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襄渝等线也在加紧修建。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科学技术成绩显著。1956 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1963 年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就制定这个新的规划作出指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①。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著。1958 年这方面工作已在聂荣臻主持下迈开步伐。1961 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2 年11 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②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经过广大科技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职工、干部的努力，1964 年10 月16 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地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我国自力更生取得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4 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十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57 年到1966 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一百四 十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二百十一万人，分别为1950 年到1956 年的四点九倍和二点四倍。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我国还在这个期间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所表现的无比的英雄气

---

① 1963 年12 月同聂荣臻等的谈话，转引自江泽民在全国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 1962 年11 月3 日在罗瑞卿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建议信上的批语。

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是应当载入史册的。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被称为“铁人”的大庆工人、共产党员王进喜不怕任何困难、带头艰苦奋战的精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共产党员在带领群众战胜灾害和进行生产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雷锋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这期间出现的光辉的榜样。党号召全党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焕发起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这十年建设成就的时候所说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邓小平后来在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多次说过：“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① 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如同对正确的东西还要作分析一样，对错误的东西也要作分析。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现实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带来了严重破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看不到这种斗争和危险，是十分错误的。越过真理的界限，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的和极其有害的了。同时还要看到，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

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无论在规模、程度、性质上都不能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量齐观。毛泽东在1967年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些斗争中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质上的区别。不能不看到两者的区别，正如不能不看到两者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和准备。

十年探索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当然，由于它本身还不成熟，不彻底，它终于没有力量阻挡错误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到后来反而被错误趋向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压倒。但是，它终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这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根本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当然，在指出这种历史联系的时候又必须看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在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基础上发展到全新的历史高度，比起“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中正确趋向的积累，要广阔得多、深刻得多，有许多过去没有的新创造、新开拓，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

十年建设的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正确的东西，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

斗中取得的。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的，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这十年中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或由他支持的，有时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①

总之，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60页。

第　八　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 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导致混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他又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且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野心的人物的活动造成了机会。这些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

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实行“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1965年2月，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找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本来，上海报纸发表的文章，其他地方的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要转载，但是这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来北京的报纸转载了，不过只是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毛泽东在小范围的谈话中则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更进一步强行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1966年初，这一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对《海瑞罢官》（后来扩及一切对海瑞的宣传和评论）怎样表态，已经几乎成为判断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

1966年2月3日，彭真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开会，拟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的

主旨，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这个提纲，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也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过，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的文章。

江青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便在取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这个会议内容整理的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结的开始。

3月底，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停止彭真的工作。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经过林彪的策动，在军队中制造了一桩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196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提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的不信任。罗瑞卿因此受到错误的批判，并以“篡军反党”的无中生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在这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以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

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两次中央会议的全面发动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按照这个文件通过的日期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照这个文件的条款数简称十六条），以及对党中央领导机构所作的改组，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五一六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这个通知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五一六通知据此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根据党、政、军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警号，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上引的一些尖锐的词句都是他加写上去的。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

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批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套主张受到重重阻挠，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毛泽东把他所认定的这种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共产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深深的担忧。在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他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就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党内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所在。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列举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结合攻击彭、罗、陆、杨，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很不正常的紧张气氛下，会议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就接受了五一六通知，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还有一些当时规定的成员不久即受到迫害而被排除）。这个小组实际上作为一个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特殊机构进行活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部。

会议结束前，江青、康生等已将会议的信息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展开对北京市委尖锐的攻击。《人民日报》在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后，于6月1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该报发表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

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还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许多学校的学生发生两派或几派之间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进行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毛泽东于是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对此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

毛泽东认为，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刚刚兴起的“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8月1日，他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8月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他还在插话中声色俱厉地指斥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7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张大字报还针对过去党的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提示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发出五一六通知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现在终于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强调青

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这个文件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判别走资派、左派、右派、中间派等提出明确的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十六条中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等等，但是它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大规模混淆敌我的群众运动，所以那些正确的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从来未被遵守。

这次中央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是由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的，但是他在进入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就被排斥（后来被迫害致死），李富春不久后也被排斥。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中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会议期间和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同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许多与会者对党中央领导层如此突然而重大的人事变动感到极为震惊，思想上有种种困惑和怀疑。这次中央全会通过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

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

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它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性斗争。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任意反对和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是错误的，他们要同这种破坏行为作坚决斗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于这种局势深感忧虑，对这场运动抱有怀疑。五一六通知曾说，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个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为了继续克服这种所谓“阻力”，1966 年10 月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会议的“批判”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却指责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担心和防范是什么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便在全国掀起。此后，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对那些不法行为的干预都可以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10 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

1966 年11 月，各地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座谈会的同志都主张在工交企业的运动由党委统一领导，要求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不能停产闹革命，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一个“左”倾的条例草案。但是这些正确意见受到林彪、江青的蛮横指责。在他们的干预下，用中央名义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简称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

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要求把它扩展到工厂农村，这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后来农村受到波及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因为农民知道不能“停产闹革命”，但是农村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被批斗的仍然不少。更具破坏性的是大批工厂企业被卷了进去，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也纷纷受到冲击，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生产秩序陷于混乱。

毛泽东从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对社会严重混乱状况采取肯定的态度。他在这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表现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在非常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努力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他领导党和政府的一些尚能工作的部门尽力维持社会生产的继续进行和国家政权职能的勉强运转。可是，天下大乱的局势既然开始形成，它就必不可免地越来越失去控制，带着巨大的破坏力量猛烈地恶性发展，造成人们最初难以预料的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后来他把这件事作为他一生中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领导建立新中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他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党和群众的拥护、支持。但是，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直至认我为敌，他在人民掌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这一系列“左”倾空想，既违反马克思主义，也违反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他强调指出的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也不是事实。他所说的修正主义的含义非常模糊，把许多不属于修正主义的东西，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都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例如从1962年以来他作为修正主义反复批判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主要是党内外一部分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错误所提出的一些合理的正确的意见。现在可以看得很

清楚，1962 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提出或支持过的实行包产到户等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张，实际上是 1978 年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但是，这些主张却被毛泽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纲领。

长久以来，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努力追求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既有一些宝贵的预见，但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前几天，他在给林彪的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后来称为五七指示）中，勾画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不作这些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这个构想当时被《人民日报》高度评价为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纲领，实际上是 1958 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在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从而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看法显然都是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观点之所以能够形成，党内之所以不能抵制、许多人甚至接受这些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在迅速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问题、新困难的时候，容易习惯性地照搬过去熟悉的经验，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把新条件下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斗争，仍然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过去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

想社会的某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但是对他们还没有实际经验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出发，作出大致的推断。如果引用他们有关的论述中的个别论断，甚至加以误解，当然不能解答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很容易流于空想。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系列“左”倾的理论观点和某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被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坚持这种迷误竟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抱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六十年代我们党正被迫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激烈论战，这种国际背景对国内政治生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常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严重斗争，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已经建立了伟大的功绩，他成为不容怀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这样，尽管广大党员和干部、包括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已日益产生怀疑，但是仍然很难抵制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很难阻挡“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党在开始领导很不熟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部分领导干部却在一连串胜利中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毛泽东这时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他也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日益严重。对他的个人崇拜日益盛行，以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形成一种狂热。如邓小平所说：“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① 这就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在这中间，林彪、江青、康生这伙野心分子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这些人中，有的人党多年，为党作过有益的工作，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0页。

务，有的则工作成绩少，原来的职位不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带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入党，他们追求个人权势的欲望随着条件的变化还有发展。他们的错误言行在正常情况下，毕竟多少受到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约束，不可能充分显露；而一旦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极不正常的时机，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政治野心和阴谋活动便极度扩张起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还有许多不健全的地方。这种制度方面的缺陷，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毛泽东在犯错误过程中未能受到限制，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终于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灾难的发生和发展。

二、“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全面夺权”引起全国动乱的升级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比前一阶段，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

1967年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大力支持这个夺权行动，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1月22日《人民日报》也在一篇社论中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接着，山西（1月14日）、青岛（1月22日）、贵州（1月25日）、黑龙江（1月31日）等地的造反派组织也先后宣告夺了省、市委，省、市人委的党政财文领导权，得到中央的认可。在很短时间里，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夺权者同倾向于支持原来的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在这一派夺权者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

争。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这一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使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

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是对于这种严重混乱状况也不能不设法加以约束。当时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主要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在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为了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布一系列的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等。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种“全面夺权”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是，事情远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简单。上述社论、指示中提出的许多要求、规定，几乎很少收到实效。“大联合”、“三结合”作为夺权的基本方针，不但未被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斗争的焦点。许多地方形成的互相对立的两个或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些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总的都是在“左”倾方针和极左思潮影响下活动。一些造反派组织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实行“大联合”，来夺权、掌权。许多原来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后，不愿或不能站出来。有的刚刚被这一派造反派组织“结合”，立刻又被那一派打倒。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许多造反派寸步不让，争夺激烈。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支左部队介入后，很难避免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在造反派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许多纠纷和冲突。不少地方出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并酿成流血惨案的事件。这种严重危害国家、社会和军队安全的动乱，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

面对这种局势，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进行抗争。1967年1月19

日在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主张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与地方一样开展所谓大鸣大放等“四大”。为这个问题，他们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展开激烈的争论。2月11日、16日，在两次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他们相继激愤地发言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谭震林说：“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毛泽东在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很不满意，因为这种抗争实际上是力图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也就是根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荒谬做法。他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严厉的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又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组织对他们的围攻。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能。

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究竟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打倒一切”的动乱局势的根本原因。“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方针，以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名义，否定建国十七年来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成就，把大多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政策的中央领导人及其以下各级领导人都诬指为走资派，要把他们打倒，要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推翻。这种混淆是非和混淆敌我的“全面夺权”是完全错误的。怎么谈得上正确地对待干部、要“革命干部的代表”站出来呢？“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但是，在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被揪斗迫害，在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级组织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在党纪国法被弃置不顾、国家的司法公安机关无法行使职权的情况下，正好为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各种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提供不受任何约束的纠合、滋长和活动的条件。这一小股打着最“革命”的旗帜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也就成为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制造动乱所依靠的社会基础。许多在初期被卷入运

动的群众，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他们并不赞成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左行为，后来经过不同的途径逐步提高觉悟，纷纷离开造反队伍。许多人反过来以种种形式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有些人甚至牺牲了生命。这样，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实现群众的“大联合”。事实表明，既要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局部问题上纠正某些过火的作法，扭转动乱局势，这种两难的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更加高涨。江青一伙将二月抗争诬指为“二月逆流”，向社会上散布，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活动。由此出现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的局面。从1967年4月起，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实际上等于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为开端，又制造了一个从多方面攻击“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所谓“革命大批判”高潮。这种大批判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混淆是非，混淆敌我，传播和助长“左”倾思潮，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原想以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结果却促进了大动乱。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长时间不能成立。5月，一些地方发生武斗事件。6月到8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纠集数以万计的人围困中南海（号称“揪刘火线”），冲击国家最高领导机关。7月22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投入林彪、江青一伙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8月7日发表讲话，公开煽动“砸烂公检法”。同日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8月上旬，在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的公安、检察、司法机关遭到更大的冲击。造反派以外交部名义向我国驻外机构滥发造反指示，并制造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涉外事件。在7月下旬林彪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之后，报纸上发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不少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许多地方连续发生抢劫银行、仓库、车船、档案机要文件，破坏铁路交通等违法事件，发生大批人员伤亡的武斗流血事件。特别是7月20日武汉发生围困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王力和数十万军民示威游行事件（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反映了广大群众和军队官兵对中央文革小组

“左”倾错误的强烈不满。局势的发展，已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

面对这种严重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8月底，他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还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10月，中央发出毛泽东在这年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记录。这个谈话记录针对造反派山头林立、冲突不已的情况，重申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批评红卫兵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教育。针对大批干部被打倒的情况，毛泽东重申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和各省、市分期分批举办轮训干部的学习班。有一批干部从受审查中解脱出来。报刊上加强了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某些过左的作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毛泽东领导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制止局势继续恶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1967年冬到1968年春，社会动乱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在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抵制的情况下，干部和群众中怀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绪有所增长，不时出现否定“一月夺权”、否定反“二月逆流”、为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鸣不平的言论。上海、北京出现批判陈伯达、康生，打倒张春桥、谢富治的大字报。外交部91名领导干部（多数是驻外大使和司局长）贴出彻底批判“打倒陈毅”反动口号的大字报，要求陈毅回部主持工作。这些动向，使林彪、江青等人深感恐慌。从1968年3月下旬以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林彪与江青合伙又制造一桩诬陷军队领导干部杨成武（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案件，罗织一些罪名说他们“犯有极严重错误”，撤销他们在军内的所有职务。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会。这使林彪一伙在军内控制了更大的权力。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前一个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若干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一些地方又连

续发生冲击部队和抢劫、破坏国家物资和公共设施、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等恶性事件。一些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升级，造成人员伤亡的惨案。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除对一些问题严重的省市实行军管以外，他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毛泽东在这时同几个造反派头头的谈话中，批评他们大搞武斗的错误说：“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经过两年的实践，毛泽东逐渐发现，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并不是忠实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可靠力量。两年前派工作组是被根本否定的，但是这一次对学校和某些部门派“工宣队”、“军宣队”，却被说成是实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革命措施。两年来，全国的大学和许多中学，虽然经中央三令五申要复课闹革命，但是始终不能实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开始进行恢复学校教学秩序的工作。

经过二十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在工作中也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军队干部参加地方行政工作，他们对那些工作并不都熟悉。参加革委会的少数原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能力的好干部受条件限制难以发挥作用。参加进去的一些坏干部和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则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许多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为了给九大召开作准备，于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52.7%。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被允许出席的中央委员中许多人是刚刚从“牛棚”（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中解放出来的。八大一次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总数为97人，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到会者只有40人，不足半数。开会时决定从被允许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增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98人，除增补为中央委员10人和去世12人外，只有9人出席会议。而被扩大吸收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等的总数达74人，占出席会议人员总数的55%以上。

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为了坚持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向说成是正确的，他在讲话中继续不顾事实地赞扬“文化大革命”，并要会议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林彪、江青等人趁机组织围攻参加过二月抗争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组织攻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

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中央委员陈少敏在通过决议时拒绝举手。刘少奇在被审查期间，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他受尽折磨，于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含冤病逝。后来经过认真复查弄清楚，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冤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这个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达二万八千多人。还在1967年3月，康生、江青就煽动所谓“抓叛徒”活动。各地造反派竞相组织各种各样的专案组，把许多干部已有正确结论的历史问题翻腾出来进行追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如所谓“六十一人案件”、“新疆叛徒集团案件”、“东北叛徒集团案件”、“南方叛徒集团案件”，等等。许

多过去在敌人统治下英勇斗争、坚贞不屈的老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作了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被加上所谓“叛徒”、“特务”等罪名惨遭迫害，有些人被摧残致死。此外，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中，还有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以“反革命”等罪名受到诬陷和迫害，有些人也被摧残致死。这是党的历史上继三十年代苏区肃反扩大化之后，又一次极为沉痛的教训。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当时，全国总共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从这种情况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条件并不成熟。九大的代表不可能从选举中产生，而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选出来的。这使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中，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林彪代表党中央在这次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贯串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语，有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确立的特定的含义。它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这篇报告论述了这个理论的形成和意义，回顾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这个“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鼓吹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对于党应该怎样去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作论述。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把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写进总纲，而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党章还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未有的。

九大开幕前夕的3月间，发生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毛泽东在九大前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还在1965年，党中央就根据我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形

势，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严峻的估计。这时，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更为紧迫和夸大的估计。九大的政治报告写上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备战不仅成为九大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稍后，即开始全国性的挖防空洞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许多备战工作。

这次大会选举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重新被选入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占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去世者不计）总数的约32%。许多功勋卓著、在广大党员中很有威信的革命老干部被排除在外。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却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的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数十次。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毛泽东曾经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即使对他这样的领袖人物来说，也感到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都流于落空。九大的召开，也没有像他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三、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

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

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

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只是工厂,实际上,同样的做法也用到其他各个领域。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总结的经验,仿照执行。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表现。通过“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社会秩序和国家工作很难有多大的好转。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的任务。毛泽东的一个批示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个批示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领导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不提。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种建党方针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整党建党中,要求党的组织按照这种方针进行整顿和吸收新党员,当时称为“吐故纳新”。其结果是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合乎党员条件。这次整党建党,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问题很多。“文化大革命”期间严重发展的个人崇拜、争权夺利、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毕竟重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所谓“教育改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 年6 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

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用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以后，又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改革”带来的恶果是：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过低，学习过程中业务、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上大学成风。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恪尽职守，不少工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所谓“教育改革”，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1971 年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曾经指出：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张春桥等人无视这些意见，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写进《会议纪要》的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教师以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几年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一千六百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

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些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尤其荒谬的是，一部分国营工厂的工人因为生产任务不足，或者因为派别纠纷，也被派往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又人为地加剧了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斗、批、改”便很少再被提及。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之后，转而把考虑的重点放在政府的重建方面。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成是夺取更多权力的机会。这个宗派集团本来就是以个人野心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步结合而成的。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居于“副统帅”的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高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日常的军事领导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这时与江青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他们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虽然毛泽东多次明确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但是1970年4月11日，林彪一反常态，仍然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表面上，林彪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实际上，叶群1970年7月在他们一伙人中私下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这些野心家根本不讲原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争夺各自宗派集团的权力。他们总是要借机生事，借堂皇的题目作卑劣的文章。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时，这两个集团之间积累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中表述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发言反对。他们之间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

看，这只是文字之争，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是一场大的斗争的前奏。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会上抢先发表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并利用宣传“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8月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一份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他们在发言中，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华北组当晚发出登载集中反映这些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这份煽动性很大的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听说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贬低毛泽东思想”、“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都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从而造成一种紧张局势。

毛泽东这时察觉到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他于8月2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伯达展开揭发批判。吴法宪等也受到批评。全会于9月6日恢复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中央于11月发出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接着中央召开华北会议，在一个多月的会议期间，揭发批判陈伯达。中央还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对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责令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在会上检讨。4月29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

九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

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早在1969年10月，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0年10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收集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起义”三字的谐音，指“武装起义”)。这个后来被查获的《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正当“联合舰队”积极准备发动罪恶行动的时候，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他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通过他们的亲信得知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陷于极大的恐慌之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他们密谋在毛泽东南行的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同时，他们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当他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迅速乘车于9月12日提前返回北京，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

9月12日晚10时30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山海关等异常活动的迹象。周恩来立即警觉地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的事，并命令将飞机马上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阴谋已难得逞，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

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在已经进行五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破坏，大批坚持革命、富于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即他所高呼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新擢升的六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些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究竟有没有合理性？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要不要这样“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反之，“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中的任何阶层带来任何利益和希望？“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巨大灾难究竟有什么意义？继续下去又还有什么意义？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国民经济在动乱中的起伏及随后的调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1967年到1968年，国民经济受到社会动乱的破坏而急剧恶化。1966年下半年，由于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的干扰，使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许多损失，不过，当时的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还未被打乱，特别是由于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因而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仍然取得比较好

的成绩。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34亿元，比1965年增长13.4%。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8%，全年收支相抵还节余17.2亿元。许多生产建设项目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年度计划。但是，当1966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就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灾难。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去控制。原定的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废置。1968年连年度计划都未能制定。这是我国建立经济计划以来仅有的没有执行年度计划的两年。企业内部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前五年调整时期制定并实行的比较完备的具体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等，都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遭到践踏。甚至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劳分配原则、利润指标等也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摒弃。其结果是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劳动纪律松弛，工伤事故增加。加上许多工人离开岗位，交通运输阻塞、物资供应困难、协作关系中断，社会治安不好等等原因，全国大批工矿交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由此造成这两年的生产大幅度下降。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4.2%。国民收入1968年比1966年下降13.3%。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居民取暖用煤和棉布定量供应的数量都有所减少。

随着全国省、市、县级革委会的陆续建立，党的九大的召开以及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的相继恢复，国内形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

1969年2月，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并把它作为主要文件下发，由各地边执行，边补充。这时，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控。通过这些努力，使1969年的国民经济有所回升。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国民收入达到1617亿元，比上年增长19.3%。但是，这种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部分指标仍然低于或大体相当于1966年的水平。由“左”倾错误造成的经济工作中的许多困难问题依然严重存在。

1970年2、3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拟定了《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

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当时对国际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对国内刚见好转的经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突出强调要“以战备为纲”,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要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制订的计划纲要,又出现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问题,还出现向地方急速地盲目地下放企业管理权限的问题。1970 年的经济建设按照这个纲要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地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中央企业事业单位大规模下放给地方的经济体制变动急剧地推行。经过这些方面的工作,1970 年国民经济取得较大的进展。这一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订的主要指标。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1966 年的指标。但是,这种盲目冒进的建设和体制变动必然带来许多严重问题。这一年年底,在经济发展中已暴露出一系列矛盾,如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原材料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基建规模偏大、项目过多,积累率过高;产品质量下降,设备失修,事故增多等等。然而,1971 年的经济建设,仍然不顾这些矛盾,盲目地继续追求“四五”计划纲要中规定的高指标。在向地方过多过快地下放企业管理权限以后,中央的宏观调控手段大为削弱,各地为建立各自“小而全”的经济体系到处“铺摊子”,纷纷提出要把产量“翻一番”;加之当时用于内地建设和军工项目的投资比重居高不下,这样,1971 年的基建规模不仅没有压缩,反而进一步扩大,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已。到 1971 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五千万,工资总额突破三百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八百亿斤,大大超过预定的计划。1972 年,“三个突破”的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巨大恶果。

1972 年至 1973 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着重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整顿粮食统销工作;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首位;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将“四五”计划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降低;加强经济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等等。

经过近两年的调整，虽然在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没有根本纠正的情况下，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1973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经济工作包括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一定的发展。1973年，我国从国外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等重要项目。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民收入达到2318亿元，比上年增长8.3%，财政收入达到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实现收支平衡。1973年成为几年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取得这些建设成绩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而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这一时期在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和科技项目上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在铁路建设中，1970年7月建成成昆铁路、1972年10月建成湘黔铁路、1973年10月建成襄渝铁路，连同此前建成的宝成、川黔、贵昆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这些铁路干线建设的工程异常艰巨，施工条件极为恶劣，它们的顺利建成，不仅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是创举，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在科学技术领域，1970年4月我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作为我国能源建设中一个重要支柱的大庆油田，也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大庆人勇敢地克服干扰，使油田开发工作从1971年起走上正常的轨道，原油产量长时期保持持续和高速的增长，到1975年已达到年产4625.9万吨，为全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奠定了基础，并且取得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建设这类特大油田的丰富经验。所有这些都表明，工业科技战线上广大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同其他战线上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一样，在长时期社会动乱的局面下，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排除万难，辛勤劳作，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这些多方面的贡献，显示了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凝聚起来的巨大的力量。

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受挫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各种重要问题。党中央责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又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党中央将林彪事件自上而下在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传达。从1971年12月起，党中央陆续批发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这一系列措施，都取得相当的成效。这时，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因此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后政治局势又出现大的反复。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周恩来紧密配合，使这一工作很有进展。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就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他的谈话中和周恩来所作的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陈毅恢复名誉。1972年4月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许多老干部或他们的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对其中一些信件作了批示。根据这些批示，周恩来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尽管他们的处境仍然很不好，但是许多人都尽其所能，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在艰难中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

时，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坦率地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这一系列行动，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

在这期间，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这是1967年2月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他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普遍存在的顾虑，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提出整顿企业和加强经济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党中央还作出关于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在文化教育方面，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提示，提出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三点意见，并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进行宣传。《人民日报》也发表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教学改革经验，提出中学教育应"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这些宣传报道，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

但是，由"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起家的江青集团，决不肯就此善罢甘休，而是继续追求最高权力，林彪的灭亡只是使他们认为在这种权力追求中减少了一个障碍。各个领域的干部为清除极左思潮影响、恢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一方面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却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江青一伙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进行指责，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右倾回潮"的活动。他们还指使上海《文汇报》组织文章攻击周培源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的正确意见。根据周恩来意见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时候，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赞成，唯有张春桥、姚文元把持下的上海反对。张春桥公然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1972年和1973年两次全国计划会议的两个文件草稿，由于张春桥的阻挠，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毛泽东也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过来。他仍然梦想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比较接近他原来愿望的某种圆满结束。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他作出林彪集团正是极右而决非极左，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按照党章规定的五年期限，这次代表大会是提前一年召开的。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一些众望所归的老干部得以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毕竟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的趋势。

1973年8月31日，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这时只因为他比较年轻，又当过战士、工厂干部，就突然被提升到副主席的高位。康生虽然是个老党员，但犯过许多严重错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一伙密切结合，也被提升到副主席的高位。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

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他们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更加扩张。但是，许多干部、党员通过林彪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识别能力。一场更激烈的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

四、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左”倾错误造成的外交纠纷

“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工作也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插手外事部门，兴风作浪，甚至图谋篡夺中央的外交大权。他们肆意抹煞建国十七年来外事工作的重大成就，诬蔑十七年来执行的是什么“三降一灭”（即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外交路线。在他们的煽动下，外事部门的领导人被揪斗，这些部门的工作一个时期被打乱。我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受到批斗。某些外事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违犯纪律的事屡有发生。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这些当然都引起驻在国政府和官员的疑虑和不安。特别是1967年8月在北京发生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事件，造成我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局面。在一年多时间里，与我国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有近三十个国家同我国发生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是由于中国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这就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外事工作陷于困境。对于这些极左错误，周恩来和广大外事干部一直表示反对，并努力设法制止。毛泽东也多次提出批评，要求纠正。经过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外事工作一度出现的偏差较快得到纠正，一些不正常状态逐步消除。同国内其他方面的工作比起来，外事工作所受破坏的程度要轻些，时间要短些。1969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

和发展关系的信息。不久中国就陆续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对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双边关系的事件，主动进行修复工作。这样，就使中国的对外关系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中美关系缓和和中日建交

进入七十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使我国的对外事务出现良好的转机，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局势转变的带关键性的一环，是中国同美国关系的缓和。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长达二十年之久。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方面看来，美苏对立是它所面对的严重问题，但是世界上已出现几个力量中心，中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使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在北方边境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1969 年1 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方面就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1971 年7 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信息公布后，立即震动了世界。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周恩来总理同他举行会谈。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 月 28 日在上海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在《中美联合公报》中，中美双方申述了各自的原则立场。双方都认为要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威胁。在长期阻碍两国改善关系的台湾问题上，美方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后，两国政府领导人继续就建交问题进行会谈。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中美建交，美国政府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从台湾撤出美国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台湾的所

谓“共同防御条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美国总是在台湾问题上设置障碍，对接受这些原则提出若干保留，如要求以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它废约、撤军的条件等。中国政府则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同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会谈。美国政府这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较以前尼克松作过的承诺还有后退。由于美国政府下不了决心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中美建交被拖延下来。但是，两国已经在1973年互设联络处，双方的贸易关系、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在几年间有较大的发展。两国结束长期的敌对状态，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这毕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对国际形势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当美国先同中国进行和解的外交活动后，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的反响。日本舆论强烈要求尽快争取中日建交，为日本取得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各国竞争的有利地位。在日本许多对华友好的政党、社团和人士的推动下，日本政府首相田中角荣等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首相等日本客人。周恩来总理同田中首相举行会谈。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日本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1973年初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并陆续签订贸易、航空、海运、渔业和科技文化等一系列协定，使这些方面的交往得到很快的发展。两国政府还于1975年开始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打开两国睦邻友好的历史新篇章，对两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出现建交高潮。西欧国家战后随着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抗衡的要求不断加强，它们希望同中国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独立自强而相互支持、合作的倾向也在发展。中国也和它们抱有同样的希望。1969年以前，西欧、北欧、南欧国家中，只有六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互设有半建

交性质的代办处。到七十年代末，除安道尔等四个小国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七十年代初，在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中国同加拿大、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的阻挠，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剥夺。中国政府一直为恢复自己的合法席位进行斗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美国的阻挠越来越困难。到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时候，经过许多亚非拉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共同努力，克服美国等企图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制造“两个中国”的障碍，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中苏谈判、中越关系恶化

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反华的同时，还在中苏边界部署重兵、派军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起边界的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面被迫加强战备，一面仍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在北京会见时曾达成谅解，认为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苏联方面最初反对讨论签订这个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而这个问题在柯西金于北京会见周恩来时是已表示过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历时九年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取得任何结果。从

六十年代以后，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中国党和政府不仅在涉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也在整个国际事务中，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同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国和越南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下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创业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全力支持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和国内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无私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援助。然而，在1973年美国军队从南越撤走，1975年越南全国解放以后，越南当局热衷于推行它的地区霸权主义，企图建立所谓“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对此理所当然地持反对态度。越南当局由此竟采取反华仇华政策，公然挑起领土争端，侵占中国领土，制造边境冲突，残酷迫害和大量驱赶在越南的华侨。从1975年起，中国多次向越南提出举行边界谈判的建议，但越南当局以种种借口进行拖延。越南领导人还在对柬埔寨发动侵略后，把它的侵柬同反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称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中国一直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重，再三提出规劝和警告。但越南领导人自恃有苏联的支持，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中越关系达到严重恶化的地步。

从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同东欧的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几个国家的关系较之六十年代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中国同这几个国家的贸易、科技交流、人员互访都有所恢复。中国同罗马尼亚两国都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能够互相支持、密切合作。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从1970年以后也有较大的改善。

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

七十年代中国对外工作的一个显著成就，是建立和发展了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比过去大大增加，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在东南亚和南亚，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在西亚，在大洋洲，中国同这些地区一大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普遍加强了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协调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第三

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虽然已经获得民族独立，但仍然面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严重斗争任务。有些国家还面临同南非种族主义，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任务。中国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真诚维护并努力促进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团结，为打破大国欺侮小国、富国压榨贫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而奋斗。

七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这种划分中，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同世界反霸力量的矛盾；强调在世界反霸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作用，以及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打败超级大国的侵略、控制和压迫，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这些分析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是在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

五、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党的十大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再一次作了充分肯定，但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厌倦、怀疑和责难的情绪仍然在增长。周恩来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虽然被打断，但是干部和群众仍然对这种努力表示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毛泽东这时一方面希望结束长期的不正常局面，也对已经认识到的一些具体错误进行纠正，以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出现“复辟倒退”，担心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他在思想上不能不陷入深刻的矛盾。

动乱的再起和围绕四届人大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1973年7月，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要借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他们看到在这之前，即1973年7月毛泽东批评过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的工作，12月批评过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以为有机可乘，企图通过这次运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江青于1974年1月两次在北京召开的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在会上以运动的领导者自居，在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把周恩来、叶剑英置于被指责的地位。江青在另一次讲话中公然声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批“现在的儒”。她还以个人名义向一些部队、机关写信、送材料，煽动“点火放炮”、“夺权”，还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由江青集团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这些文章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在前一时期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正确的政策措施、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江青等人还歪曲事实，制造事端，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所谓“反潮流”的典型。在他们煽动指挥下，到处揪斗老干部，批判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把政治空气又弄得很紧张。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拉山头，打派仗。一些人甚至散布所谓“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煽动停工停产。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重新打倒，或被迫离开岗位，或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入瘫痪。“批林批孔”运动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据1974年1月至5月统计，煤炭产量比

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3.7%。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五亿元，支出增加二十五亿元。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是此时毕竟不愿重新出现社会大动乱。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并指出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对他们多次进行批评。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些批评，使他们不得不暂时稍有收敛。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人帮”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加紧了阴谋活动。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制造事端，对邓小平进行攻击。邓小平理直气壮，严正地顶住了“四人帮”的围攻。

“四人帮”经过秘密策划，于10月18日派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带着重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

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还在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同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对江青一伙进行多次批评,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这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展示了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等12人为副总理。这次大会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虽然所说的时间过于局促),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这都给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人民的新的希望。

1975年的全面整顿及其反复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很快扭转了局势。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

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那些闹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弄得不得安宁。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注意落实政策,比如对老、中、青干部,对劳动模范、老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要落实,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他的这些讲话,促使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精神为之大振。在邓小平领导下,有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同心协力的配合,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

由于闹派性、打派仗,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这是阻碍局势好转的一个关键。党中央于2月下旬召开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作出决定,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发动群众批判派性,撤换一批捣乱的派性严重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这些有力措施深得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都疏通了;全国二十个铁路局中的十九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五万三千七百多车,比2月份平均日装车多一万多车;煤炭日装车达到七千八百多车,是五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年前四个月,全国欠产钢一百九十五万吨,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厂欠产严重,中央于5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立刻显著回升。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七万二千四百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

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国务院关于当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

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这种状况表明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这期间，对于军队、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都大力进行整顿，分别取得明显的成绩。军队的整顿在调整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国防科委解决了七机部两派闹派性达九年之久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文艺工作重新强调党的百花齐放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开始改变近十年文坛一片荒芜、百花凋零的局面。特别是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科学院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做了准备。

对于邓小平主持下在各个领域所作的整顿，“四人帮”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的阻挠、抗拒，并伺机提出反对。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又同周恩来等谈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在全国立即掀起学习这个谈话的运动。在“四人帮”指挥下，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们提出“打土围子”，是要把那些反对“左”倾错误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比作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围子”中的敌人，要对他们实行所谓“全面专政”。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察觉，提出了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对“四人帮”进行批评。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能遏制的，他们仍然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捣乱。1975 年8 月14 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自己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四人帮”立刻抓住这个题目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宣传运动。江青公然制造“《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邪说，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江青的讲话加以斥责。使“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又一次受到打击。

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抑制，由于人心思治，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1975 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得到制止，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但是，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

毛泽东自1971 年冬身患重病以后，病情时轻时重。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他对党和国家大事的设想和主张越来越抽象化。1975 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联络员来保持不多的联系。处于这种状况，使他更加不能了解全面情况。“四人帮”在其间所作的一些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1975 年11 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又以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信（信上反映了“四人帮”两个亲信人物的问题）为借口，硬说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而刘冰的信的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这样，

毛泽东就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动乱，这个时候干部群众的认识已经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很大不同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人们从阅读当时印发的供批判的材料中，反而对坚持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邓小平获得更多的了解和信任①。这显然是“四人帮”所始料不及的。

1976年2月上旬，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有关这次运动的多次谈话稿。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中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对当时大多数干部来说，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

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起用。一些地区派性斗争重新泛滥，造成停工停产，交通堵塞。全国再度陷于混乱。这种状况，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郁积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已经如大宗火药堆积，一旦点燃引信，便将猛烈地爆炸起来。

---

① 当时印发供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材料，包括上述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还有一篇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照邓小平指示精神写的未发表的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的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月4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二百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多年在湖南作地方工作，1971年调国务院工作。他是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逝世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于2月由毛泽东指定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联络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凌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异常气愤。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时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

广场的群众。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影响下发生的。已经持续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更加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这个抗议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亿万人民对他们在缔造党、军队和国家，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等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和卓越贡献，都怀有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加紧装备民兵，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四人帮”还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上反复宣传，以党内“正统”自居。他们在报上公开提出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以此诬蔑和打击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

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还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由1977年7月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挣扎。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党和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党和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持续十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丰富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的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经过“文化大

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其中许多同志遭受严重的打击和迫害，但是他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仍然密切关注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和发展前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或者刚正不阿、直率地对“左”倾错误提出批评，或者冷静思考、认真地写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回忆和理论文章，或者就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向党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向能接触到的群众恳切宣讲党的优良传统，等等。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以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斗争。其中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这些“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因遭受严重折磨而不幸去世。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永远被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原油产量1976年相当于1965年的6.7倍。一些工程艰巨的新铁路和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外事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中。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

第　九　章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干部和党员中、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真是人心大快。中国共产党能够割除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毒瘤，这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群众举行热烈的游行和集会，表示他们由衷的喜悦和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对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要求。

经过十年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并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恢复正常秩序，重新振兴起来，都有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当时确实可说是个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

“四人帮”虽然垮台，但是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仍掌握在江青反革命帮派分子手中，有些地方帮派势力盘根错节，还有一定的势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这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76 年10 月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从12 月10 日起，又连续发出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和他们的极左路线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与此同时，全国普遍清

查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派头目和骨干分子，坚决予以揭露并进行审查。对于当时仍处于动乱中的少数地区，中央先后派出工作组，前往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秩序。到1977年上半年，由于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逐渐形成安定的政治局面。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这就摧毁了这股猖獗十年、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16日到21日举行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的工作。这也是当时极为迫切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书面提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十届三中全会才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同时，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

在科学教育文化战线上，主要由于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出现了完全新的面貌。“文化大革命”是由这条战线开始的，首先整顿这条战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后，科学教育工作由他分管。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

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1977年底至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经济领域内，“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遗症主要是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混乱，商业流通堵塞，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铁路堵塞的问题。1976年12月至1977年上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整顿，一批企业趋于瘫痪的状况有所改变，生产上的混乱情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农业生产1978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突破6000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1977年比上年增长14.3%，1978年又增长13.5%。财政收入1977年比上年增长12.6%，1978年又增长28.2%，都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1977年全国60%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5.1%。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举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距十大只有四年。提早举行这次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显然是必要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2、3月间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届人民代表大会是“四人帮”还在猖獗的1975年初产生的，提前换届显然也是完全必要的。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为副总理。

与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邓小平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政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活动。它恢复活动，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间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重要的意义。

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本应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是这两次会议没有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能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的错误，而担任党的主席的华国锋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要在短期内消除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确实不容易。这种混乱之所以形成，固然由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扰害，但也确是由于毛泽东从“左”的指导思想出发而作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且是和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有关。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他以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从这种错误立场出发，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包括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之所以迟缓、难以进行，就是由于他的阻挠。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两句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这样的拒绝作任何分析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其实不足以维护、而只能破坏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十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社论。这个社论是华国锋批准的。

一大和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并没有能纠正，反而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固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主要是由于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

党的十一大修改的党章仍包含着“左”的错误。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进行了宪法的修改工作，虽然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的许多好的内容，但还没有能彻底纠正1975年宪法中的错误。

经济工作方面，虽然如前所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间，开始使国民经济摆脱瘫痪、半瘫痪状态，这是成绩。但是就在这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从1976年冬季开始，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和粮食生产，对石油、煤炭、钢、化工的生产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国务院1977年7月的一份报告并且认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在1978年2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在国家计委和各部门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务院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按照这个规划，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1978年的实际产量是3178万吨)，石油产量达到2.5亿吨(1978年的实际产量是1.04亿吨)等等。这些指标的不符合实际可以拿石油为例。对石油产量增长的要求，是在没有地质勘探资料的条件下空想出来的，实际上直到八十年代末，石油产量也还不足1.4亿吨。过高的产量指标不能不要求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按照规划，1978—1985年的八年期间的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这个规划虽然只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没有公布下达，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了坏作用。1978年的积累基金比上年增长30.6%，而消费基金仅增长8.4%，积累率急剧上升到36.5%，成为1958年的“大跃进”后二十年中积累率最高的一年。这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31%，也成为“大跃进”后二十年中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额增长最高的一年。

华国锋这时看到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不要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这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这当然是对的。但他由此出发，不顾国力，企图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冶金和化工部门的高速发展的计划都建立在巨大规模的引进上，甚至把所需资金寄托在外债上，既不考虑对引进的配套能力和消化能力，也不考虑还债的能

力。所以被人们称为“洋冒进”。这些计划的执行只是开了一个头，虽然当时拟建或始建的项目有的后来建成了，是有成效的，但总的说来，这些计划是不可取的。这时的“洋冒进”和五十年代的“大跃进”相比，虽然社会经济环境有所不同，但同样都是出发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洋冒进”发生于国民经济在十年动乱的大破坏后亟须休养生息之时，正如要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只能事与愿违。“洋冒进”破坏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当然不能改善、而只是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

所以，总起来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间，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阻挠。因此这两年是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局面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才告终止。

在两年徘徊期间，主要应由华国锋负责的“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在党内外群众思想中引起新的混乱，也遭到党内外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一方面，人们在长期动乱后急迫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倾的错误，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玷污了党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很明显的，如果不澄清是非、肃清“左”倾错误，也难以抵制和纠正后一种错误倾向。

邓小平在正式恢复工作以前，已经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央一封信，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5月，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他在十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全党上下对继续“左”倾指导思想的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

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这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也在若干场合指责这篇文章。但是，这场讨论已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冷却下去。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这篇文章中表达的精神。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他们并在不同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必须量力而行，努力抵制和克服仍然存在的“左”的倾向。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批评一些“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同志，说“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邓小平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就说不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据此，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①。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党终于在1978年末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但其所以是伟大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09、114页。

的转折，决不仅限于此。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倡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联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争取中国的工业化做了许多努力，得到很大成绩。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破除迷信，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反复出现，使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努力方向受到严重冲击，直到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十年。在1957年到1966年的曲折前进的期间，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和其他许多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党员，提出过许多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好的主张、见解和方案，有的已通过实践初步见效，有的并未能比较广泛地付诸实践。但这一切在十年动乱中几乎全部被掩盖掉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本应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吸取一切曾经提出过的好思想，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能做到这些，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到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被载入党的历史。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为一些历史的冤案（例如彭德怀）平反。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紧接着工作会议，12月18日到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华国锋的原来计划，这次全会讨论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由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的讲话和发言，这次全会突破原来的议题，形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他说：“不打

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在公报中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这就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次中央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认为，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1977 年的十一大虽然在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那时还有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任务，而且十一大所继续加以肯定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是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相容的。只有在解放思想、破除“左”倾僵化思想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至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是要改变的，但其改变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那种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实际上只是为革命而革命的“左”倾的有害的观点。

邓小平的讲话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所以，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加强民主，正确地实行民主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33 页。

集中制。在强调民主的同时，邓小平指出，我国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全会公报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全会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外，邓小平还特别讲了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且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会讨论经济问题时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全会肯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并且指出：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等等。

全会十分重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为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邓小平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大政策”。他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

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①]。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政策符合于客观规律的要求，是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的。

总之，这次全会已经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鉴于当时经济领域内的实际情况，全会要求在几年中逐步地改变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洋冒进”的错误，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全会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公报中说，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要求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这方面的决定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加于党组织的破坏，克服两年徘徊期间仍然存在的不正常现象有重要的意义。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会不会导致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曾是使一些人困扰的问题。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42页。

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并且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这次全会把对“文化大革命”全面的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做（两年半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了这件事）。全会郑重地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全会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三、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三中全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在1979 年到1982 年间，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扰乱的各方面社会关系调整过来，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为了顺利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对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关系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理。继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党中央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阐述。1979 年3 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后就再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

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①。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党进一步清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个理论，按照当时的解释，就是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今后，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不应当继续使用。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去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台湾及国外的敌对政治势力相勾结。在共产党内部，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②。他在批评怀疑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倾向同时，着重尖锐地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谓“社会改革”的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8页。

② 同上书，第150、159页。

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阐明“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因为拨乱反正，既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是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这种纠正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能彻底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但这样做，势必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问题。而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②。如果党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发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党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197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叶剑英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建国以后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从同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指出，这个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③。《决议》讨论稿写出后，于1980年10月交党内四千人讨论，而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5页。

② 同上书，第159页。

③ 同上书，第255—256页。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忽视、否认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以及贯串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的概括。《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个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使极端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得到正确的结论，这充分表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在对《决议》讨论稿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调整他担任的职务。198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

的工作，但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他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通过《决议》的同时，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 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在这以前，1980 年 8 月至 9 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已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他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这次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①，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由于需要年青一点的同志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而胡耀邦有长期在红军中工作和从事党、团工作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所以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

调整社会关系

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处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措施。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虽已局部地进行，但进展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陆续得到平反。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也恢复了名誉。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和有关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从而使建国以来这起最大的冤案得到平反。

党还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了甄别。其中主要的是，为1955 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在1978 年4 月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又对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改正；为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平反，等等。

---

① 在这以前，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他担任主席后，兼任总书记。一年多后，按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不再设党的主席。十一届五中全会还批准汪东兴的辞职请求，免除他担任的党中央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有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他们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或担负新的职务；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他们放下包袱，精神振奋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受到昭雪。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党在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干部队伍积极性的同时，还采取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其一，从1979年1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土改时，给地主、富农划定成分是必要的；由于情况变化，改变他们的成分，也是必要的。

其二，从1979年1月起，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随后，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此外，还落实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

其三，从1979年11月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到1981年，原八十六万工商业者中的七十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分。接着，又明确肯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

其四，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国家开始建立学位制度，恢复评定学术和技术职称，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一批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得到安置。

其五，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推动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和文教科技等领域积极发挥作用。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我国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

其六，1980年到1981年，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问题的会议，认真解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中央和一些地方还先后为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同志摘掉帽子。

其七，1982年3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文

件，阐明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这前后，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得到恢复，各地的寺堂庙观陆续修复和开放，宗教政策得到落实。

其八，重申党的侨务政策，保护和褒扬侨胞爱祖国、爱故乡的热情，鼓励他们为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作贡献。

上述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落实，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加强党的建设

十年动乱期间，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党的纪律松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一些干部中还滋生了腐败现象。必须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使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党规党法的决定，1979 年1 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首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着手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一批党员违纪案件进行了认真的查处。1979 年11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重申“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章程。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发这一规定时，强调高级干部必须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80 年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坚持党的路线、坚持集体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等十二个方面的问题作出原则规定。陈云在同年11 月中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①]，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党风建设。

党中央认真总结和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开始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1980 年8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

①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245 页。

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其核心则是权力过分集中。这类弊端，大多是由于缺乏经验，对一些问题采取了不科学的解决办法而形成的，但它们也“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同时，还有一个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但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①]，这个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首先在干部制度方面迈出改革的步伐。中央强调，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就是革命化。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2 年2 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许多老干部愉快地响应中央的号召，主动离休、退休或退居二线。一批经过考验的中青年干部先后走上领导岗位。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是党为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稳定地向前发展中保持路线政策的连续性而采取的一项有战略意义的步骤。

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解放军通过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努力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党对军队保持着绝对的领导。解放军在军民关系方面，在守卫边疆、保卫祖国安全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新的巨大成就。1979 年2、3 月间，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南侵略者胜利地实行自卫反击战。这一战打击了越南当局的地区霸权主义气焰，使中越边境地区获得一个相当时期的安定。以巩固国防为前提，为了有更多的财力从事建设，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自1979 年后逐年降低(1979 年为17.5%。降低到1988 年的8%)。在1985 年，我国决定减少军队一百万员额，并顺利地完成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93、287、294 页。

了这次世界上少有的百万大裁军。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家四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调整国民经济，农村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着党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虽已扭转，但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陈云、李先念致书中央，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①。李先念还说，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我们在实行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创造一个良好的新开端②。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

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③。陈云也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认清，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④。在调整中，党坚决纠正前些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并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

---

①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224页。

② 《李先念文选》(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年)，第3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49—150页。

④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222、226—227页。

在开始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时，党的各级领导大多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行动迟缓。1979年、1980年未能使基本建设总规模按必要程度压缩下来，调整收效不大。从1981年起，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认真执行这个方针，使经济形势比较迅速地好转。国民经济内部在积累和消费间、农业工业间、轻重工业间的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在调整国民经济时，党中央领导人民勇敢地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是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和某些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端。在过去时期，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得不采取，而又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行之有效的那种一切由国家统一管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果继续施行下去，不但国家负担过重，负担不了，而且妨害各种社会活力的生长发展，形成僵化的局面，从而严重阻碍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因此，必须对于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使它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调整工作开始时邓小平即强调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①。当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事业。如何正确地实行改革开放？如何通过改革开放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巩固与加强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些曲折，甚至发生某种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1978年，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为了克服农民生产和生活上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47页。

的困难，中共安徽、四川省委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两省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开始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执行时。1979 年4 月党中央提出十二项主要措施，其中第一项是“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这里面除具体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外，还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重、控制统购指标等。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中全会作为草案提出来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1979 年9 月的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决定》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意见，“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就为鼓舞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经验，并据以进行农村的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

由于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逐步被突破，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开始时，大部分实行的是联产到组责任制。随后，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人，并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对于采取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当时党内外不少干部存在着相当大的疑虑，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离开了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中央在1979 年9 月下达的文件中，还只肯定因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一般并不加以提倡。1980 年5 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讲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指出，关于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些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①]。1980 年 9 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75 页。

题》，强调要进一步搞好集体经济，同时也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后来，中央又进一步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户保持着发包和承包关系。集体统一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所以，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这种制度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它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见效之快，是人们没有预想到的。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

全国各地农村中也有些生产队、生产大队乃至社，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但它们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保持原有的集体经济的体制和做法，而是加以必要的改进和改革。它们可以说是在实行或走向邓小平所说的“高水平的集体化”。有些原来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的社队，在推行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没有继续坚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则是一个缺点。但这些社队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创立新的集体经济时，仍能利用过去的集体经济中的许多好经验。

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还存在另外一些缺点。如对保护集体财产和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注意不够；土地分割过于零碎，不利于使用机器和进行灌溉。党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指示各地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远比农村改革复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开始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

七十年代后期，全国一千多万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回城，迫切要求安排工作。城市中新生长起来的大批劳动力，这时也有不能充分就业的问题。由国家全部包下来，是不可能的。三中全会以后，党提出广开门路，搞活经济，以及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来解决这个问题。到1981年10月，全国已安置两千多万人就业。在这个过程中，集体、合营、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局面。商业、服务性行业和消费品生产行业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所有这些，都对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在这期间，在对外开放方面开始迈出了两大步：一是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二是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采取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形式，以吸收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投入兴建。

调整国民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收到好的效果。1982年，虽然调整工作尚未结束，但成绩已很明显。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较高的发展速度，是在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速度。在此期间，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以1982年来说，这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1倍；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50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38.3%；城乡储蓄余额达到675亿元，比1978年增长2.2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党中央开始着手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的发展战略。

四、十二大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纲领的制定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名，候补代表145名，代表着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的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十二大提出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根据邓小平1979年以来的倡议，大会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把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就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五十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几次大起大落，一个重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1—372页。

要原因，就是近期目标定得太高，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大会还实事求是地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即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大会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及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这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想、道路和纪律。要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大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些理论和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了。

大会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并且制定了新的党章。新党章清除了1977年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在新党章的总纲中，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规定。新党章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求，比过去历次党章的规定更加严格。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还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

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大会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针对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大会严肃地提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大会确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选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中纪委第一书记。这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老一辈领导人外，增加了新的成员。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自1980年9月后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们和叶剑英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起重要作用。邓小平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党的十二大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了新的完善的党章，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

在党的十二大后两个月，1982年11月至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一次修改宪法。宪法的修改工作由彭真主持。大会通过的新宪法不但彻底纠正了1978年宪法中还存在的缺点，而且内容更加完备，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规定。

1983年6月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大会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其特点是：农村改革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

市；城市经济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出了重大的步伐。

农村改革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任务。到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1984年初，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至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还可以更长一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酝酿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党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农业税，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这样，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农村改革的一个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大收获，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村中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乡镇企业的兴办，不仅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更新农民观念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且在提供财政收入、发展出口贸易、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兴起了一大批小城镇。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事物，

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农村的经济改革，不是采取一哄而起、一步到位的方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及时总结农民群众的创造，因势利导，加以推动。这是党指导社会改革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拥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农村，比较顺利的实现了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进行的城市改革的试点和探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为继续改革打下了基础。对外开放使人们眼界大开，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的机遇和挑战，使经济体制改革显得更为迫切。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决定》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决定》围绕着这个根本立足点，系统地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决定》还强调，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 1985 年起全面展开，在 1987 年（即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那一年）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主要是：

第一，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

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有很大改变。1987 年同改革前的1978 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有相当的增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77.6%下降到59.7%，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54.6%下降到38.7%，集体商业由43.3%下降为35.7%，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2.1%上升到2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 万人增加到569 万人。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发展经济、方便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87 年同1978 年相比，国营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由3.7%上升到 40%以上（扣除各种税费，实际留利约占 20%），使企业增强了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到1987 年，全国已有 8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第三，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1987 年与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 种减少到 60 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40%下降到 17%，国家统配物资由259 种减少到26 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 种减少到23 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财政筹集的从76.6%下降到31.2%，由银行筹集的从23.4%上升到68.8%。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此外，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通过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虽然在着重强调放开搞活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管理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致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但总的说来，是向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的积极的转变。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1985 年3 月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使科学技术机构

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改变研究机构与企业相脱离及部门、地区相分割的状况，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等等。其基本精神，是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尔后的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

同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改革的目的，是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的需要。《决定》的贯彻，使教育事业得到加强。

十二大以后，在继续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在对外开放方面，也一连迈出几大步。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并于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全省作为经济特区。1984年4月，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1985年2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形成了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加快，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到1987年，全国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协议（合同）项目10350项，累计协议金额625.09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等达257.73亿美元。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引进技术改造项目5000项，成交额34.5亿美元，推动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结构的调整，并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发展了一批新产品，有的还填补了国内空白。

“六五”计划的完成与“七五”计划的制订

十二大以后的几年，特别是其前两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经济建设的

成就，集中地表现在“六五”计划（1981—198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的顺利完成上。由于计划切合实际，加之通过前几年的经济调整，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到 1985 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1985 年同 1980 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 7707 亿元增加到 13335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11%；国民生产总值由 4470 亿元增加到 8568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 4—5% 的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民经济活动的效益和效率有所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由“五五”末期的连年下降转为逐年上升，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进展，五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比“五五”期间增长 46%，完成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77%。“六五”期间，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五五”时期增长 1 倍，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明显提前。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明显提高。1985 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 1980 年的 227 元提高到 406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 8.7%，大大超过 1953—1980 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 2.6% 的幅度。

“六五”计划的完成，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提供了条件。由于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过去许多定量分配和凭票供应的商品，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六五”时期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十二大规定的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的部署，未能得到认真的贯彻。胡耀邦对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关于经济建设要扎扎实实、理顺关系、打好基础、稳步前进的方针，并不同意。他同地方领导人谈话，主要是讲高速度、高指标，要求提前翻番，争名次。他还强调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把消费放在生产前头。从 1984 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分配等现象。由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过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为以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但总的说来，“六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

由于“六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早在1983年，党中央就着手进行“七五”计划(1986—1990年)的拟定工作。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建议》提出了“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步骤。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对计划安排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综合平衡，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4月，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实施。

整党和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十二大的决定，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

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第一，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第二，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第三，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第四，纯洁组织，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关键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和纪律松弛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又处于空前活跃和深刻变动之中，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整党，党内外群众必然会深切关注并寄予很高期望，同时也必然会遇到许多事前难以完全估计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整党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时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对整党不重视。他擅自将整党中“统一思想”的任务改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并片面地提出“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这更使全面完成整党任务遇到很大的困难。

这次整党在全党分期分批进行，历时三年半，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

经过整党，总的说来，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状况有了改变，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这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据统计，通过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开除党籍的有33896人，不予登记的有90069人，缓期登记的有145456人，受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党内受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184071人。但是，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

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位置。一般地说，物质文明建设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殊地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客观环境，更迫切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事实上，在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确实存在着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这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党着重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出现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错误倾向。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他尖锐地揭露了思想战线上出现的混乱现象，指出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宣传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会把青年引入歧途；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能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①]。他说，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造成了严重后果。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2页。

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要求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头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思想保证，搞好这项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还指出，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的考验。《决议》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针对这次全会会议上那种不赞成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主张，邓小平明确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所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①。1987年3月，邓小平又说，不仅要讲十年二十年，还要“加上五十年”②。

这个决议所强调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1986年底，发生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邓小平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这个讲话和他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的传达，给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武器。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开除了少数鼓吹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3页。

②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第10页。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共产党员的党籍。由于及时有力的疏导，学潮很快平息。直接引发这一学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同意接受他的辞职请求，继续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赵紫阳在1980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绩，1980年9月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成绩，所以被推选为党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鉴于这次学潮的教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并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政策界限。

五、十三大、治理整顿的开始和1989年风波的平息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认识国情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三大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着4600多万名党员。赵紫阳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批准了这个报告，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便开始从认清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来分析以往发生失误的认识上的原因。早在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国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这已初步表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并且说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以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都重申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十三大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使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

大会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大会对当前我国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很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些科学论断，为理解建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大会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一贯坚持的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它，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大会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把十二大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邓小平在1985年经过反复考

虑后提出的。

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大会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此，大会要求：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大会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改变了中共中央在关于“七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的要求，指出：“现在看来，建立新体制框架所需的时间，会比原来的估计要长一些。”① 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十三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迫切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根据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党和国家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重要的改革措施，在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加强法制建设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十三大前后，这些改革在继续进行。

十三大指出，六十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11月2日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依林为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

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治理整顿的开始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五年间，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有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短时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有些则是这几年在前进过程中产生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是有失误的。在农业方面，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放松了对农业的指导和投入，以致粮食生产在1984年大丰收后连续几年徘徊不进。在工业方面，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改革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对国情仍然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十三大虽然对经济发展再度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但实际工作中的急于求成的倾向并未得到扭转。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同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也是分不开的。

对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了所谓“软着陆”的主张，结果不但没有“着陆”，经济过热的现象反而继续发展。1987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1984—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过快增长（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一度放松），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摊子越铺越大，又出现了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工业内部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关系也失调，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支撑不了过大的加工工业，大量工业生产能力长期闲置。资金、外汇、物资的分配权过度分散。1984—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致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生产、建设、流通领域普遍存在着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费、低效率的现象。1985—1988年，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18.5%，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

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1988年夏季曾经不适当地决定全面地推进价格改革。8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虽然会议指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仍强调目前是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有利时机。价格改革无疑是必要的，但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宣布大步进行价格改革，这在实际上成为触发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抢购风潮的一个诱因。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同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指出，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在这两方面都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进行治理整顿，是符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的正确决策。

1989 年的政治风波

1987年初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到5月中旬，赵紫阳武断地宣称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需要同等地加以反对，

这样，斗争就被扭转了方向。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赵紫阳还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他对党的风气、社会风气趋于恶化的情况和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滋长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一时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党的战斗力削弱。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群众的不满，治理整顿中的暂时困难也使人们发生了某些误解和忧虑。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这些情况，对党的领导进行攻击。他们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时，国外敌对势力正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反社会主义势力活动猖獗，这一切更使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1988年末到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一场动乱在酝酿之中。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动和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受到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显示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倾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赵紫阳于前一天赴朝鲜访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4月25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使绝大多数干部明确了动乱的性质，也使许多学生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5月4日以后，80%的罢课学生复课，全国各地的局势迅速趋向平稳。

这时，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根据政治局常委决定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月4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5月6日，赵紫阳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

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为赵紫阳鼓吹的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从而表明了他同党的公开分裂。根据国务院令：自5月20日10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动乱的策划者则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终于使动乱在北京地区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整个学潮和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6月3日，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于6月3日晚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部队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蛮袭击，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被戒严部队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

清场任务全部完成。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①。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度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科技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也大为加快，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决策上发生了不少严重失误，致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以至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动摇和夺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的一些人所产生的严重影响，是决不可以低估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1979 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他又严肃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赵紫阳接替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

---

①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 年 6 月 9 日，《人民日报》1989 年 6 月 28 日。

阳也就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六、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继续前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在平息北京地区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党于1989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并作出相应的组织处理。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在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此，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随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又撤销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长期在工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曾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六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免去在动乱期间积极支持赵紫阳的错误立场的胡启立等三人

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即指出，经历了春夏之交的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我们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以便“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①。全会本着这个精神，初步总结了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还要不要继续坚持？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是动乱过后，全党、全国人民在冷静思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密切关注的问题。对此，四中全会旗帜鲜明地作出答复：“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② 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错误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因此，党的任务就是，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③。这也正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

针对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鼓吹“全盘西化”即鼓吹资本主义化的严峻现实，汲取以往赵紫阳所犯的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的教训，江泽民在全会上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

---

①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人民日报》1989年6月28日。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1989年6月24日通过。

③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人民日报》1989年6月28日。

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①] 这个讲话，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原则界限，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和干部全面理解、自觉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保证我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全会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要求全党特别注意抓好以下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四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②]。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地、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认真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

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曾多次表示：等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他就要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他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他反复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几个月以后，1989 年11 月党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以前，鉴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邓小平再次正式向中央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表示要带头建立退休制度，结束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据此，五中全会于1989 年11 月9 日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并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全会高度评

① 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1989 年6 月24 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 年8 月28 日。

价邓小平的革命历史和卓著功勋，强调指出："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①。

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代是自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的交接，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

抓紧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首先聚精会神地抓紧了党的自身建设。

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证明，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坚强的，绝大多数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好的，它是任何敌对势力所摧不垮的；同时，这场斗争也集中暴露了党内问题的严重性。一部分党员程度不同地卷入了动乱，极少数党员甚至成为动乱、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一些党的组织软弱涣散，放弃领导责任，个别的甚至支持动乱。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腐败现象，成了动乱中有那么多人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邓小平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② 为了提醒全党认清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强调指出，分析党内状况时，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们党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不可低估赵紫阳的错误在党内造成的混乱和对实际工作造成的损失③。正因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

① 《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0日。

② 邓小平1989年6月16日谈话要点。

③ 《人民日报》1989年8月22日。

必须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下决心解决好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①]，以便使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以及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

针对一部分党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1989 年秋、冬和1990 年，在中央的领导下，党组织对动乱、暴乱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清查、清理。在清查、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后，又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并在部分单位进行了党员的重新登记。开展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动乱和暴乱中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党内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清查、清理工作是同干部考察工作结合进行的。主要是考察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是否同中央保持一致，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否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根据考察的结果，对一些组织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目的是为了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核心。考虑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一代的状况，中央要求全党，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江泽民并告诫全党，如果不提出并解决这个任务，我们党就不可能有坚强的后备队，就不可能胜利地走向未来。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长久地坚持和发展下去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②]。

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中央提出，为了帮助县(处)级以上的党政干部在复杂的环境中明辨是非，把握正确的方向，要着重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今后，凡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经过相应的党校学习；其他领导成员也要定期到党校接受轮训。同时，中央还十分注意对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尤其注意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 年8 月28 日。

② 《人民日报》1989 年10 月29 日。

的建设，并对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表彰。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开展廉政建设，坚决同腐败现象、腐败分子进行斗争，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198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党和政府着重抓了以下七件事，即：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人员少数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这些工作，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1990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全会认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全会指出，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总的说是好的，但是这些年来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腐败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对此，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并坚持不懈地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尽一切努力恢复和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会提出，今后应从七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各级党政机关也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并贯彻落实。这都对加强党风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同年11月，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严肃执行党的纪律，认真查处违纪案件，并进一步提出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认真清理党政干部违纪违法建私房和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两个问题。中央强调，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必须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决定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

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并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各民主党派自恢复活动以来，在参政议政、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开展智力支边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指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抓紧党的建设同时，思想战线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加强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宣传工作在批评“两个凡是”、促进思想解放方面，在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在后来的几年中，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纷至沓来，暴露出的问题相当严重。社会上“一切向钱看”、鄙薄远大理想、崇洋媚外等思想滋长了，浅薄、庸俗甚至腐化、堕落的不良风气发生了，建国初期就已绝迹的种种丑恶现象重新出现了。这些社会情况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赵紫阳打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同志，一部分舆论阵地和思想文化阵地已经不在党和人民手里，为此，中央强调指出，有关部门必须采取坚决措施进行整顿。

1989 年 7 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正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政治、思想渗透，极力宣扬虚伪的“民主”、“自由”、“人权”，煽动和支持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须旗帜鲜明地同这种“和平演变”的图谋和行动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各级党组织都要十分重视和大力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得到明显扭转。其主要表现是：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重新受到重视。从 1990 年到 1991 年上半年，在全国党政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开展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发表了一批有说服力的宣传社会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论

著。一度发生过的那种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和腐朽思想的作品在思想文化领域泛滥的现象，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一些以往长时期内行之有效但一时被弃置的思想教育制度和工作方法得到了恢复和改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以及遵纪守法的教育得到了加强。通过大力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事迹，开展学雷锋、学焦裕禄、学赖宁、学英雄人物的活动，社会主义的正气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重新放出光彩。

由于认真进行“扫黄”斗争（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整顿和清理图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的行动，着重清除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图书报刊及音像制品），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传播和社会丑恶现象的蔓延受到了遏制。

加强和调整了意识形态领域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对发生政治方向错误的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学艺术团体，有领导地切实进行了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

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产生了一批比较好的作品。

总之，思想宣传战线确实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党的自身建设的抓紧，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不仅对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

治理整顿和“七五”计划的完成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虽然作出关于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但因时届年底，当年来不及采取更多的实际措施，已经采取的措施一时也难以见到明显成效。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在1988年并未减退，社会需求继续膨胀。同上年相比，198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5%，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分别增长22.2%和17.7%，远高于国民收入11.1%的增长幅度；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20.7%，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过高，超过了能源、原材料工业的承受能力，工业内部的结构

性矛盾更加突出，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进一步加剧；农业因为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和政策上的原因，粮食、棉花、油料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在社会需求膨胀的压力下，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增加，导致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多年未曾有过的18.5%的上涨幅度。这种情况，给1989年的经济发展带来困难。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很大的干扰，给我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借口北京戒严部队收复天安门广场事件（这个正义行动被西方传播媒介作了大量的歪曲宣传），对我国实行的所谓“经济制裁”，更加重了我国经济的困难。这说明，1989年6月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仍然是严峻的。

面对着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下大力气抓政治稳定的同时，认真抓治理整顿，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1989年11月上旬，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从1989年算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为此，全会要求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和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的秩序，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并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会还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

五中全会的决定统一了全党对于经济形势的认识。由于认真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纠正赵紫阳在经济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失误，我国经济在很困难的条件下逐步而又迅速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89年下半年治理整顿就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1990年则已见到十分明显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压缩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势头的抑制，使导致通货膨胀的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趋于缓和。从1989年10月起，物价涨幅降到10%以下，1990年全国零售物价仅比上年上涨2.1%。市场商品供应丰富，物价稳定，同1988年的抢购风潮形成鲜明对照。

——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起步。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投资比重上升；生产性投资比重上升，楼堂馆所及

其他非生产性建设得到控制。重点建设加快，一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

——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整顿。据统计，到1990年底，全国已撤并公司十万多个，占原有各类各级公司总数的35.2%；党政机关办的各种公司绝大多数已经撤销或者同机关脱钩，机关干部在公司兼职或任职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流通领域内公司盲目发展的状况得到控制，市场秩序进行了整顿。

——国民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国民生产总值1989年增长3.9%，1990年增长5%，粮食生产1989、1990年连续两年获得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业生产在经历了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的市场疲软和生产低速增长（这是执行反通货膨胀政策、经济过热“降温”条件下难以避免的）之后，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1989、1990两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8.1%。

——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继续发展。出口贸易总额1989年增长10.5%，1990年增长18.1%，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比重显著上升，高档消费品进口得到控制，进出口商品结构改善。利用外国资金继续保持适当规模，国际旅游业逐步恢复。由于进口的压缩和出口的增长，以及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加，外汇收支由前几年的逆差转变为顺差，国家现汇结存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对周边国家的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新开辟了上海浦东开发区。

——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新技术成果的普及和推广有新的进展。重点科技攻关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亚洲一号通讯卫星和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发射成功、五兆瓦低温核供热试验堆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行、大秦线万吨级组合列车运行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又一批科学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继续发展。我国成功地承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起了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中国在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控制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是出乎国内外许多人意料之外的。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经济的稳定无疑对于社会的稳定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统一的。治理整顿需要体制改革的配合，同时也

为改革的深入和健康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集中力量进行治理整顿期间，经济体制改革是围绕着并且服务于治理整顿继续进行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开始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断完善，企业集团的组织有明显进展。以逐步实现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为主要内容的外贸体制改革，以调整煤炭、运输、粮食、食油等若干种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为主要内容的价格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成功。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继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继续有所上升，这对于维持治理整顿期间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实现，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七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8%，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5%，均超过“七五”计划的要求。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7%，超过4%的计划指标，农、林、牧、副、渔全面增长，物质装备水平有所提高。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1%，超过7.5%的计划指标，是继“一五”和“六五”之后的第三个高速增长时期。工业生产能力扩大，技术水平提高，主要工业产品平均年产量，都比“六五”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五年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2.4%。即使在后两年治理整顿期间，也保证了全国城乡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不降低，甚至继续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90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74倍(1980至199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9%，是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工业总产值增长2.89倍，其中钢产量增长1.1倍，原油产量增长32.7%，发电量增长1.4倍，工业的现代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农业总产值增长1.03倍；科技、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国防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城乡人民的生活普遍改善。1990年，全国农民存款总数达到1841亿元，农村面貌发生明显改变。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1980年增长68.1%，现代化市政设施不断增加，居民的菜篮子日益丰富。我国人民取得的这些历史性的成就，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过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十年规划、“八五”计划的开始执行

当“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八五”计划即将开始执行的时候，1990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建议》的产生，经过比较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早在1990年初，国务院即着手研究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这次制定计划的方法，较过去有明显的改进。一是把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结合起来。这是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是有连续性的，需要有比较长时间的考虑；一些重大建设项目、科技攻关课题，以及人才培养等，也往往不是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完成的，根据十年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和奋斗目标来确定五年计划，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二是先研究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思路，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从大的方面把建设和改革的方向、方针、政策确定下来，然后再具体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三是在《建议》起草过程中，反复广泛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队各大单位、各人民团体，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征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由于充分发扬民主和走群众路线，《建议》比较好地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得到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建议》规定，今后十年，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更重要的发展阶段。其基本要求是：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左右，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全国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全。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这些基本要求，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迫切愿望和雄心壮志。其主要精神是：第一，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发

展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不仅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且更加注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二，强调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这将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和下世纪初叶的持续发展提供经济体制、政治、思想和其他方面的保证。

十三届七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制定与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方针。这就是：

——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精辟地作了概括，提出了十二条主要原则。这十二条原则，有些是我们几十年来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充实了新的内容；有些则是十多年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总结。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凝结了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卓越贡献。这十二条原则的提出，标志着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和指导上的进一步成熟。实现九十年代的奋斗目标，最根本的保证，就是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在总结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使改革不断深化，开放进一步扩大，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更加强大的推动力。

——坚定不移地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必须坚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排上认真执行量力而行的原则，稳扎稳打，注意防止和克服急于求成的倾向。既要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又要防止国民收入超分配，重新诱发通货膨胀。

——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要把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同发展我国经济、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结合起来，以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几代

人的艰苦奋斗。必须长期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全面厉行节约，努力克服各个领域严重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勤俭办一切事业。

——坚定不移地执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面对九十年代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改革和建设任务，更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改善社会风气，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全会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本世纪最后十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这是当前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我们一定要在九十年代巩固和发展八十年代取得的成就，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使我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跨入二十一世纪。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生气勃勃，兴旺发达。

根据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建议》，国务院制定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经1991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后付诸实施。

“七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从1989年以来的困难境遇中走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七、对外关系的调整和统一大业的推进

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在对外关系的政策方针方面也进行了必要的和重要的调整，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如同在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样，其总设计师是邓小平。

新时期对外关系的方针

邓小平在1980年初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八十年代国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

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①。这就为党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新的思路。

以后，邓小平在同外国客人的谈话和其他场合，反复说明，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危险的观点，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点变化。因为事实上，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7年5月他在一次同西欧客人的谈话中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②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量的变化，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对外事务方针的一个出发点。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估量是正确的。

说战争可以避免，这是说世界战争；说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这是说需要一切和平的力量去努力争取。实际上在世界上局部的战争每年都在发生，甚至在1991年发生了美国和许多国家卷进去的海湾战争。为了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在1980年初的上述讲话中说，在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中的一件，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③。就反对霸权主义这一点来说，党在新时期的国际政策和在这以前是一贯的。邓小平在1985年3月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④

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政策上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顺从任何外国的指挥棒。在新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05页。

②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第29页。

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03—204页。

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4—95页。

时期，独立自主的政策具体地表现为不结盟政策。邓小平在1984年5月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的首脑谈话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① 中国实行这种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既符合于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贡献。

新时期的中国继承五十年代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这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中国特别重视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在1984年5月的上述谈话中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我们讲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就是说，现在中国穷，理所当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② 对第三世界各国说来，如何发展本国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把当代世界的问题归结为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当前世界的发展问题，就是要建立世界各国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以逐渐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日益扩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日趋剧化的状况。因此，中国既要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也要为改善南北关系，加强南南之间的关系，一起为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经济繁荣而努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外关系方面的调整是与此相适应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底子薄的大国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完成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世界和平能够继续保持，对于中国的建设是最有利的。邓小平在上述与拉丁美洲客人的谈话中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说，"我们现在是一心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43页。

一意搞四化建设，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以自力更生为主是不行的，但同时不对外开放也是不行的。邓小平1984年6月和一些日本客人谈话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并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总之，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在这次谈话中，他还说：“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② 既然是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那么就必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

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党继承了以前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由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同时又适应国际的新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加以充实。

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

新时期的对外事务的方针政策既体现在国家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外事工作中，也体现在党自身的对外工作中。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同外国党的关系。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要遵循四条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范围内，不仅改善和加强了同一些党已有的友好关系，而且恢复了同一些党已经中断了的关系，并同一些党建立了新的关系。早在1977年，中国共产党就恢复了同南斯拉夫党的关系。1980年，恢复了同意大利、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此后，希腊、法国、荷兰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相继派代表团访华，中国共产党也派团回访，参加它们的代表大会。1989年5月，随着中苏两国国家的正常关系的恢复，中苏两党的关系也得到恢复。在此以前，已恢复了同东欧一些国家曾中断过的

---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4—45页。

② 同上书，第54—55页。

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还同日本、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了关系，还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接触。到199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二百七十多个各类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最近两年来，就有三十多个外国政党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接触和来往。邓小平和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说的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同各国、各种性质的党的关系，都不受意识形态有所不同或相异的影响。

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的序言中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这就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原则用国家基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在七十年代，中国和美国间进行了多年的谈判，终于在1978年12月16日双方发表两国间《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关系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经过谈判，美国政府终于表示承认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且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因此，中美间才达成建交协议。但是，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又立即制订了一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实质上是蓄意把台湾当作国家，把台湾当局当作政府，它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中国政府向美国方面严正地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达成的协议，仍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中美建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而美国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这又为中美关系投下

了阴影。

在中美建交以后，由于中国在坚持改革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同美国和所有的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各方面的来往和合作都有了发展。

中国和日本在1972年建交以后，在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到1983年间两国政府首脑互访中，又确认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四项原则，这就为中日两国间的长期的平等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中日关系各方面得到扩大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日本国内一部分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一贯地从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的立场出发表示严重的关注。

中国和苏联之间在八十年代后期解决或初步解决妨碍两国关系的几个问题以后，终于实现了符合两国人民意愿的关系正常化。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了二十多年的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开始正常化。1990年中国总理李鹏和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使中苏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苏两国间恢复起来的正常关系既根本改变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对抗关系，也不是恢复到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间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世界也是一件大事。

东欧各国的政局1989年发生了剧变。在这以后，除了民主德国已和联邦德国合并外，中国对其他国家仍然根据既定的外交方针，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持着正常的关系。

在中国和西方各国保持和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中总有一股政治势力，企图通过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并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是企图使中国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对此，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保持着警惕。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就有西方国家的一些黑手很深地插人。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它们通过“制裁”，多方施加压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企图扭转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使中国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曲折和倒退，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在这种无理的“制

裁”面前屈服，正如它过去从来没有在外来压力下屈服一样。孤立中国、“制裁”中国的政策，实际上不仅对中国不利，也对实行“制裁”的国家自己不利。一些西方国家认识到同我国恢复和保持正常关系的重要性，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同我国的关系逐步有所好转。西方国家那些企图“制裁”中国、压服中国的政治势力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反而使中国又一次受到锻炼，中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改革和开放的道路。

中国和第三世界各国向来保持着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在西方大国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以后出现了明显的进展，这也是一些西方大国不得不停止“制裁”的一个原因。中国在八十年代又同拉丁美洲、非洲、西亚、南太平洋的一些尚未建交的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90年到1991年，中国领导人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为促进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互相访问极为频繁。在1990年这一年，中国同纳米比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马绍尔群岛四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断绝近二十三年的外交关系，同蒙古、老挝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由于越南当局多年间实行反华、排华政策和对民主柬埔寨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曾经使中越关系极端恶化。到1990年和1991年，越南党和政府表示希望恢复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两国关系也有好转的趋势。柬埔寨局势由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通过了和平解决的框架文件和东盟国家的多次努力，也由于中越双方都表示希望柬埔寨问题早日解决，柬埔寨人民多年来关于建立一个和平、独立、不结盟的柬埔寨的希望有了逐步实现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根据一切大小国家都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根据一切国家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的原则，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提出了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和政治新秩序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世界各国受到广泛的注意，特别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

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成员之一，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在联合国中一贯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在联合国，中国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定地

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不懈努力。中国在联合国除关心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问题外，还积极参加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在1990年，中国在联合国中为解决海湾危机问题起了特殊的作用。

在八十年代，中国还解决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英两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进行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1984年12月19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中葡两国政府也派出代表团进行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1987年4月13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和澳门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为英国和葡萄牙所占领，这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旧时代的政府所不能解决也不敢设想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富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为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的时候，邓小平在和英国外交大臣的谈话中说：“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映，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①

一国两制的方案和祖国统一大业

恢复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是需要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谈判的，这是一个外交问题。在香港和澳门回到祖国怀抱后，国家对这两个地区实行什么政策，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在中国政府分别同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签订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申明了中国对香港和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这就是在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时，在这两个地区设立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两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8页。

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和澳门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对这种基本方针政策，中国政府还作出具体说明，作为附件附在中英、中葡联合声明之后。具体说明中规定，这两个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和澳门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90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方案更加具体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正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指定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也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为什么在香港、澳门恢复国家主权后，要在那里实行特殊的政策呢？这是从具体的历史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香港、澳门一向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利于保证这两个地区的继续繁荣稳定；保持这两个地区的繁荣稳定，不但对于这两个地区人民有利，而且对于全国也有利。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容许个别的小的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并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而是从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谈话中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即九条声明），虽然没有使用“一国两制”的提法，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消除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统一？除非海峡彼岸准备实行“台湾独立”，或者帝国主义武力侵略台湾，就不应当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而应当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怎样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邓小平在1984年2月22日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①] 这种导致祖国大统一的唯一合情合理的方式已经逐步地形成了具体的方案。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在1991年6月7日发表的谈话中说：“‘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8页。

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谁也不吃掉谁，相互尊重，共同繁荣。按照这个方针，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可保留军队；台湾当局和有关各方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都将得到切实保障。这绝不是权宜之谋，而是根本大计，是一个长期的方针”。这个谈话中还正式提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派出代表进行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还可以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讨论台湾当局关心的其它问题。在商谈中，可以邀请两岸其他政党、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①

一国两制方针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有创造性的方针。作为中国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已经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国家并不企图从实现祖国统一后的台湾和香港、澳门取得一分钱（已经规定，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向特别行政区征税，这个原则同样也将适用于和平统一后的台湾）；也不怕在几个个别的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确信在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大统一后，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繁荣昌盛起来。

台湾问题虽然是国内政治问题，但也涉及中美关系，而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世界也是有利的。邓小平在1984年10月31日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②。

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祖国大统一是必然要实现的趋势。香港、澳

① 新华社北京1991年6月7日电，《人民日报》1991年6月8日。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5页。

门已经确定要在九十年代归回到祖国的怀抱，实行一国两制的方案。台湾问题，由于大陆人民、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的长期努力，随着两岸同胞交往和相互理解的日益扩大加深，随着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也必将克服种种障碍，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得到解决，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结　束　语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以后，继承以往几代先进的中国人的努力，为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坚定不移地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终于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由此进入了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以后三个月，就是共和国建国的四十二周年。这就是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已经有四十二年，这个历史时期尚在继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些目标是否已经做到了呢？

第一，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违反了长期压迫、剥削、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的意愿而成立起来的；成立以后，面对外来的各种形式的压力，一贯成功地维护自己的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挫败了外国侵略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足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屹立于东方，平等地和世界各国交往，并且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

第二，统一。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互相争夺，由于各个军阀、官僚集团的互相争夺，由于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由于落后的封建经济而产生的四分五裂的状态。新中国的法律和政令普遍实施于全国各地区。国内人民间的团结、各民族间的团结日益加强。这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局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甚至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还将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完成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

第三，民主。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结束了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阶级的统治，结束了广大人民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都受到侵害的状况。人民当家做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在旧社会被压在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彻底翻了身。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专政只施加于极少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敌人。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阶级阶层的人民，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民主权利，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

第四，富强。旧中国的那种近代工业极端落后，农业生产也不能满足本国的最低需要，对外几乎完全丧失自卫能力的贫弱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繁荣昌盛。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没有经济上的这样的发展是不能保障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不能保障人民民主的。中国现在正在为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努力。要达到人民所期待的富强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但是，经过四十二年的奋斗确实已经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展现了必然能够实现的宽广的前景。

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是过去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代人所渴望达到而没有能达到的目的。在中国大地上终于能实现这一切，就因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上述的一切。

历史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他早在三十年代末就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全部过程。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部革命运动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所以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

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然导向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就是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即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党。

曲　折　的　经　历

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经历过的四十二年并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道路，正如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历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用七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为实现这个过渡，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以后，党面对着如何继续前进，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全、成熟起来的问题。一般地说，在这方面，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重复，各国党和人民都必须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特殊地说，中国由于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而又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且对于照抄苏联经验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这就更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中国曾经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许多方面学习（但也没有完全照抄）苏联的经验，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苏联的不成功的方面中国必须引以为戒。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革命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找出来。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如同在民主革命中一样，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要实现这种结合，并结合得很好是特别艰难的。这里面有如何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即中国国情的问题，也有如何正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原理的问题。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一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二年间党的历史，总起来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九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十三年。

这十三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各方面取得了远远超过前二十九年的成就。在这期间固然也有些小的曲折，但是党总是能够及时地纠正偏向，解决问题，取得新的经验。实践证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历史不能割断。近十三年是和前二十九年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前二十九年的成就为基础，就不可能有近十三年的更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前二十九年的经验，就不可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正确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吸取了前二十九年的好的经验，也取鉴于前二十九年的反面经验，然后才能得到的。

在前二十九年中，除开始七年比较顺利以外，可以说，走过的道路十分坎坷。我们党甚至犯过两次大的错误，因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两次大的挫折。一次发生在以"大跃进"为标志的1958年到1960年，另一次发生在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1966年到1976年。这两次大错误、大挫折都是由于我们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严重偏差而造成的。

怎样对待这些错误呢？如果因为我们党犯过错误就把我们党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正视这些错误，认真地研究这些错误，从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也是完全错误的。

二十九年中的两次大错误、大挫折都是"左"的指导思想的表现。在那二十九年中，党曾几次不适当地进行反右的斗争。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右的错误就不要防止和纠正。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右的错误，有过纠正右的错误的经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也多次及时地纠正确实存

在的右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也会有极大危害。许多外国党的经验也使我们看到右的倾向的严重危害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右的倾向足以导致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所以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左”的倾向，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往往表现为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往往表现为不对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作客观的全面的调查分析，任意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实际上，“左”的倾向不能达到发展和进步，而只能造成混乱和倒退。“左”的倾向会无中生有地制造“阶级斗争”，搞乱自己的队伍，也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倾向同样足以导致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因此也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

没有一个党是不犯错误的，重要的问题是能否从错误中学习，取得教训。既要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也要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自己所犯的错误往往是更好的教科书。犯大错误当然是很坏的事情，但是由于在大错误中反映的问题往往特别深刻，这个教科书也就特别值得认真学习。错误能够成为正确的先导，但不是无条件地成为正确的先导。关键在于要善于总结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从来能够总结错误的经验，从错误中学习，通过错误的教训更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纠正错误，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犯过两次大错误，导致了1927年、1934年两次大失败。我们党从这两次大错误、大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因而能够在三十年代后期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四十年代末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总结以往的好的经验、好的思想，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又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总结了以往犯错误的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学习和研究党史时，不仅要看正面的经验，也要十

分重视反面经验的缘故。

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这固然因为党已经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因为党已经犯过严重的错误，并且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学到了许多在没有犯错误以前所不懂得或者不真正懂得的事情。

江泽民在庆祝党成立七十周年的讲话中说："七十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做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我们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四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

回顾四十二年，人们常说，如果没有那些曲折，我们的成就会更大。虽然可以作这种假设，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从来不是笔直向前的，从旧中国遗留下的那样极端落后的经济与文化的基础出发，寻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道路，发生工作上的错误和发展中的曲折是难以避免的。曲折有多大决定于种种因素，但是不能设想，不发生任何曲折。

应该看到，尽管有这些曲折和挫折，中国的四十二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成就仍然是极为辉煌的。以下举一些数字和事实。

1990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 17686 亿元，国民收入已达到 14429 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国民收入是 1949 年的20.23倍。

从 1950 年到 1988 年累计，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 21538 亿元，有 4393 个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新增固定资产 15619 亿元，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根据资料计算，主要工业产品现在一天的生产能顶上1949 年两个多月的生产，1949 年全年的生产现在不到六天就可以完成。1990 年，钢产量达到6635 万吨，原煤10.8亿吨，原油 13831 万吨，发电量 6212 亿千瓦小时，分别是 1949 年的419.9倍、33.8倍、1152.6倍、144.5倍。

在农业生产上，1990 年粮食产量达到 44624 万吨，棉花达到 451 万吨，油料达到 1613 万吨，猪牛羊肉达到 2514 万吨，水产品达到 1237 万吨，分别是 1949 年的3.9倍、10.2倍、6.3倍、11.4倍、27.5倍。我国以世界上 7% 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 22% 的人口，被公认为是一个奇迹。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90 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技人员达到1080.8万人，是 1952 年的25.4倍。四十二年间，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原子能技术、生物科学、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等方面，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1990 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9%，普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小学的在校学生数，分别是1949 年的17.63倍、36.17倍、5.02倍。到1988 年，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的本科、专科毕业生和研究生，已等于新中国成立前三十七年间毕业生总数的 30 倍。

在卫生医疗方面，1990 年全国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389.8万人，病床 262.4万张，分别是1949 年的7.72倍、30.87倍。文化、体育等事业，也都获得飞速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90 年全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由 1952 年的每人每年 76 元提高到 714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3.5%，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一部分居民生活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全国人口的死亡率降低到6.67‰（在旧中国，抗日战争以前，高达 25‰），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0 岁（在旧中国，抗日战争以前，只有 35 岁）。

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完善，有缺点，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发生过大的曲折，但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我国这四十二年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同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是较快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从1949 年到1989 年，中国为7.37%，美国为3.17%，日本为6.98%，印度为4.01%。同一时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中国为5.44%（这是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美国为1.87%，日本为5.95%，印度为1.73%。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953 年到1988 年间，中国为11.5%；而在1951 年到1986 年间，发达国家为4.2%，发展中国家为5.9%，世界为4.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更远远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979年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美国为2.6%，日本为4.3%，联邦德国为2.1%，中国则为9.1%。1979年到1990年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美国为2.2%，日本为4.1%，联邦德国为1.9%，中国则为12.0%。

当然，这种比较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这中间包含着若干不可比的因素。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社会主义中国属于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列，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所占位次的明显提前，也说明了这一点。以1989年与1949年相比，钢产量从第26位上升到第4位，原煤从第9位上升到第1位，原油从第27位上升到第6位，发电量从第25位上升到第4位；粮食从1957年的第3位上升到1987年的第1位，棉花、猪牛羊肉从1949年的第4位、第3位上升到1987年的第1位。其他重要产品，有的也已跃居世界前列，如水泥、布匹、电视机上升到第1位，硫酸、化肥上升到第3位，化学纤维上升到第4位。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上升到了世界第8位。

当然，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总的来看在世界上还比较落后。按照“世界银行图表集”计算法，即按当年汇率以美元计算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八十年代虽然增长一倍，但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几次下调，至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00多美元，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只能反映对外贸易中的比价关系，据此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经济增长和人民消费水平。

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由于各国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不同，国内价格水平不同，加上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上述的计算比较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收入水平。我国学者采用世界银行在几十个国家试行的购买力平价法进行估算，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500到700美元。

正确地全面地衡量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程度，不能单纯用经济指标。早在六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就建立了新的社会指标体系，对社会发展趋势和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评估、监测。我国研究工作者结合我国国情，参考国外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根据由16个有代表性的指标组成的

社会指标体系进行分析，1987 年，120 个国家和地区平均为 76 分，我国为 68 分，居世界第70 位。这个水平，高于39 个低收入国家平均51 分的33%，低于48 个中等收入国家平均78 分的13%，我国社会发展总水平大致相当于中等偏下水平。这个估计和外国学者的估计大致相同。又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在1990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构筑在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础之上的人类发展指标衡量，中国在被衡量比较的130 个国家中处于第65 位[①]。

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成就，又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在中国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形成的差距还很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在迅速发展，它们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发展将设置种种障碍，如果我们不急起直追，正在逐步缩小的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由于我国的人口多，相对说来，可耕地少，水和其他自然资源也不富裕。这都是我们将长期面临的困难。我们必须加紧用适合情况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瞻望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世界，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努力同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外交关系和经贸、文化关系，将坚持努力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努力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将坚持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南北关系、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相信，这一切努力都将取得相当的成果，因为这是和整个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的利益相一致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就是西方列强称霸世界和力图用各种手段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中国人民无论何时都必须清醒地认识面临的严峻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充分发扬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激烈的竞争和斗争中发展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当前的世界正处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虽然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已有很大进步，但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必须努力掌握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否则就会落后。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民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奋发前进，中国才能作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上。如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会落后、混乱以至分崩

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0》。

离析；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有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后，如果满足于已有的胜利，缺乏清醒的头脑，不以极大的紧迫感朝乾夕惕，发愤图强，也还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受欺侮，甚至重新沦入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地位。在当前的世界上，这方面的反面榜样可说层出不穷，令人触目惊心。七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是不甘心于落后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并且已经领导中国人民摆脱落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今后，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继续以卧薪尝胆、愚公移山的精神，万众一心，排除万难，艰苦奋斗，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富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过去我们既然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中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今后，只要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继续改善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就是“改革”），充分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这就是“开放”），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前进的道路和目标

江泽民在庆祝党成立七十周年的讲话中说：“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了共同认识。关于这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作了如下概括：

1、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

2、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3、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4、采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形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5、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它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

6、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7、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8、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9、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

10、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

11、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

12、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江泽民在庆祝党成立七十周年的讲话中说：“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

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十二条基本原则，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具体化了，清楚地勾划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轮廓。如果说在十多年以前，我们对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那么现在就比较清楚了。

回顾过去，我们感到自豪；展望未来，我们更充满信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现在，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已经在八十年代末基本实现。在九十年代要努力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我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大幅度增加。到2000年，预计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左右，钢8000万吨以上，煤14亿吨左右，发电量11000亿千瓦小时左右。生产门类将更加齐全，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将有较大提高，国防力量将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到那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

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将有较大改善，达到小康水平，即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这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

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后，我们将努力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便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在八十年代已经开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提供了根本保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九十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完全可以相信，到2000年的第二步奋斗目标，以及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或稍早的第三步奋斗目标，一定能够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而实现。

早在一百四十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奋斗的目标是要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初成立时也已明确

提出，党的目的是要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以后，我们还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只要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达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一定能最终实现！